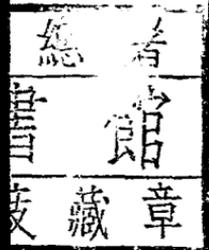


陳伯達著

人民公敵蔣介石

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MG
D693.09
440



3 1799 4859 5

25305

目錄



一	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後一個大狗牙，中國人民的第一號公敵	一
二	從假革命到反革命	六
	(一) 假革命的兩面派	六
	(二) 對於人民的第一次大謀叛——「中山艦」是烟幕	一三
	(三) 繼續玩弄兩面派的戲法	一六
	(四) 竊取北伐軍的總司令職權	一九
	(五) 在北伐中的兩大掃興與總司令部的反革命陰風	二二
	(六) 歷史的大背叛——歷史的大血日	二四
三	代替北洋軍閥而起的封建買辦新王朝	三四
	(一) 大洋行買辦與大封建奴隸主的法西斯統治	三四
	(二) 天字第一號的內戰禍首	三七
	(三) 特務哲學的圖發與法西斯主義的制禮作樂	四四
	(四) 賣國史上的大創作——不抵抗主義	五〇
	(五) 蔣介石繼續向內殺進去，日寇繼續從外打進來	五三

(六) 法西斯主義的新狂熱	五七
(七) 發揮亡國論，甘當日寇的臣妾	六〇
(八) 受了人民愛國運動的處罰——西安事變	六五
抗戰失敗主義和繼續與人民為敵	七一

(一) 多邊的買賣政策	七一
(二) 從英美帝國主義及四大家族的利益出發與抗戰失敗主義	七三
(三) 擺出投降的價格	七六
(四) 熱衷於遠東慕尼黑	八〇
(五) 武漢失守之後日寇與蔣介石的作戰重心同時指向共產黨	八四
(六) 舉行三次反共高潮	八九
(七) 在國際市場上的新拋賣	九八
(八) 不打日本人，遇到日寇則一觸即潰，但仍然是中國人民的囚籠	一〇二
(九) 以法西斯主義的政令和失敗主義的軍令作擋箭牌，拒絕任何改革，準備大規模的內戰	一〇六

五 窮兇極惡，日暮途窮，即將被人民活捉審判	一一一
-----------------------	-----

(一) 從峨嵋山走下來，搶奪人民勝利的果實，日寇變成了恩人，美帝代替了日帝	一一一
(二) 一面談判，一面進兵，美軍也趕上來	一一七

- (三) 集中人民的仇恨……………一二一
- (四) 公開的『停戰令』，祕密的作戰令……………一二三
- (五) 有開口供給諾言的自由，但重要的，是他隨時有開槍供給子彈的自由……………一二四
- (六) 最後地撕碎了停戰協定與政協決議，發動了冒險的戰爭……………一三一
- (七) 『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一三七
- (八) 盜賣中國的新二十一條……………一四三
- (九) 蔣介石匪軍落入毛澤東所佈置的天羅地網，
在蔣管區也遭受人民的圍攻……………一五一
- (十) 『在睡夢中跑到大街上狂呼救命』……………一五五
- (十一) 奴顏婢膝，繼續大廉價拍賣……………一五八
- (十二) 人民解放軍叱咤風雲大進攻，四大家族置身在全國人民的革命大海裏，
人民的完全勝利已成定局……………一六三
- (十三) 很想穿上『總統』的壽衣，好到棺材中抖點威風……………一六九
- 六 消滅蔣介石，打碎蔣家小朝廷的全部統治機構……………一七二——一七七

一 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後一個大狗牙，中國人民的第—號公敵

毛澤東最近發出的文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是一篇劃時代的中國大革命的文告，這個文告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由防禦轉到進攻，「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蔣介石的四大家族王朝二十年來以殘酷血腥的手段盜竊政權，從事反人民的內戰，厲行反革命的恐怖，把中國革命人民——工人、農民、覺悟的智識分子——的鮮血，灑遍全中國的東西南北，以求得在帝國主義者面前稱「巨稱孫子稱孫，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家門的「光籠」，盜賣我們中華祖國簡直像拋棄敝屣一樣，對於人民，橫征暴斂，巧劫豪奪，取之盡蠶蝕，集中了二百萬萬美元左右的大財富，單在美存款也達數十萬萬美元（註），無恥與荒淫，享盡中國歷代帝王所沒有過的豪華，而惡毒他們由帝國主義所武裝和訓練起來的反革命軍隊、憲兵、警察和黨棍特務，任意吞噬中國人民的生命，覺得「天下莫予毒」，但現在這個中國歷史上空前的血腥王朝，在毛澤東指揮的人民解放軍的轟擊之下，在全體中國人民的緊密包圍之下，即將全部顛覆了。美帝國主義者給蔣介石輸送各種武器、戰爭物資、金錢，派遣人員監軍監戰，用了一切可用的手段，企圖維持或苟延蔣介石反革命王朝的生命，而蔣介石及其匪幫也對美帝國竭忠盡誠，賣盡氣力，企圖不使美帝失望，現在美帝的這一切企圖都一一在化為泡影了。看到中國人民的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的壓倒一切的力量前進，蔣介石匪幫的內部現在已在狂戰心驚，並紛紛在尋覓

退路了。

人民公敵蔣介石，這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後一個大狗牙。近代中國人民已打掉了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許多狗牙，其中被打掉的幾個著名的較大狗牙，就是：慈禧太后、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汪精衛。現在剩下的這一個最大的帝國主義狗牙，就是蔣介石，也就快被中國人民打落下來了。

這個罪惡滔天的殺人犯與賣國賊，集中了近代中國封建奴隸主與大洋行買辦這一批人民吸血鬼的全部罪惡。他從小起便逐步受了封建奴隸主與大洋行買辦多方面的訓練。他自稱得力於『家庭教養』，而他本來的家庭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人民吸血鬼——鹽商的家庭。陰險狠毒，和官廳合夥打劫，這就是中國鹽商堆積金銀財寶的著名的本領。蔣介石所謂從小起所受的『家庭教養』，正是這種用陰險狠毒的手段勾結官廳、打劫人民的本領。蔣介石經過這種教養，便從小時起，一方面造就了他的寄生蟲的『德性』，即他自己所謂『本一貪逸惡勞之人，亦一嬌養成性之人』；一方面又造就了他的流氓的『德性』，即他自己所謂『本愚蠢無知、恣睢滅裂之徒』，『狂妄』，『頑劣』，『輕浮暴戾』，最好與人鬥狠，『凡水火刀槍之傷，遭害非一』。（所引均見蔣介石給胡漢民、汪精衛的信和蔣介石所寫的他的母親事略）。蔣介石由他的吸血鬼的家庭所訓練出來的這一切寄生蟲的與流氓的『德性』，到了長大時就更受到了人民吸血鬼的『社會訓練』。大家知道：蔣介石加入了上海的流氓隊伍。這種流氓隊伍的頭子，並且都是上海財閥圈內的重要分子，就是所謂上海『三聞人』：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這『三聞人』或者被蔣介石拜為老師，或者與蔣介石做了最知心的朋友。這種流氓組織平日的事業，就是：綁票、暗殺、包運鴉片、販賣人口、私運軍火，總之，殺人越貨，無惡不作，而『三聞人』的所以擁有很大的財富，成爲江浙財閥的人物，就是由這樣發源的。這種流氓組織和上海的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統治

勢力的一切黑暗事業，都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和各省的統治勢力都有勾結，因為各省的軍閥政客有什麼事情（比如買辦軍火等）要走上海這條路，需要取得他們的幫助。這種流氓組織是各帝國主義者在上海的經濟統治的支柱，又是它們在上海的政治統治的支柱。各國租界的包探、巡捕之類，就是由這類流氓組織的成份所組成的。蔣介石在這類流氓組織內，經過他的師父和知心朋友的傳授，領略了各種冒險的祕訣，而所有這種流氓組織及其活動的各種特點，後來都由蔣介石所代表的大封建奴隸主與大洋行買辦的政治事業集中表現出來。

蔣介石的政治師父，並不是孫中山，而是陳其美，即現在國民黨CC系陳立夫兄弟的叔父。據蔣介石給胡漢民、汪精衛的一封信，自己這末說過：『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英士（即陳其美號）之誘掖不可』。又說：『以弟之愚拙而有今日者，未始非其誘掖之功也』。這個陳其美本是『浙江財閥之首腦』（見日本人長野朗『中國資本主義發達史』中譯本三四六頁），又是上海流氓組織的一個重要人物。辛亥革命時，蔣介石不過是陳其美手下的一名小嘍囉。陳其美所結合的政治集團，實際是代表浙江財閥的一批政治流氓集團，目的是利用時機打劫政治地位。這個政治流氓集團的頭子陳其美很有一套手段，照蔣介石給胡漢民、汪精衛的信，叫做『好倚權術』，照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上的用語，就叫做『殘忍陰謀』。當時浙江有個陶成章，是同盟會和光復會的著名革命黨員，對於辛亥革命有過一些功勞，因此，也就成爲陳其美集團在浙江爭權奪利的眼中釘，在民國初元，竟被暗殺了，這個暗殺的兇手，就是在陳其美『誘掖』下的蔣介石。有個蔣介石的小嘍囉給蔣介石寫的一本傳記，對於這個政治暗殺，作了極重要的評價，說是：『這樣超脫的忠勇行爲，正是領袖革命史、也是辛亥革命史的重要一頁』。這就是蔣介石在辛亥革命時特出的『功績』。這個暗殺犯初試身手，便把他的政治師父陳其美和他的流氓師父黃金榮等所傳授的功夫都結合起來了，證明他是黃金榮和陳其美的入門弟子。這是蔣介石在封建奴

隸主與大洋行買辦的社會裏面所受的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訓練。

但是，暗殺了陶成章，並沒有就使蔣介石在政治上一步登天，只是使陳其美和他在浙江活動少一個對手而已。辛亥革命之後，蔣介石就有時在上海的流氓隊伍中混混，騙取錢財，花天酒地，有時在南方的軍閥和土匪的隊伍中混混，所帶的隊伍到一地方便焚燒擄殺，姦淫擄掠，完全顯出一套軍閥的本事。蔣介石把自己叫做「醫醫醫醫」，實際是一個極端狡猾的無賴漢。因為陳其美已死，他對於孫中山則保持了若即若離、又即又離的關係，以便保持政治投機的門路。隨後寫的謀獲橫財，就走進了上海交易所，重新在經濟上受大洋行買辦的進一步訓練。

蔣介石和戴季陶、陳果夫之流，都是上海買辦交易所的活動人物。寶空買空是交易所的特點。在那裏，買賣不是真實的買賣，供求不是真實的供求，純然是錢財的賭博。投機、造謠、欺騙、暗算、誘惑、耍流氓、冒險、殘酷……總之，一切目的，都是爲自己發財，不惜多少萬人破家蕩產。在「冒險家樂園」的上海，在這個殖民地化的國際買辦市場上，這類交易所冒險家的手段，就發揮了盡致。蔣介石當過交易所經紀人，浸沉在那裏，受了充分的訓練，並且學通了那交易所全部發財的鬼計，據一個傳記所載，他「周旋商場，無不中的，經營不半載，迭獲巨利」，就「儼然富商」了。就是說，他在交易所中所受過的上述各種手段的訓練已很到家，並顯出了「成績」了。顯然，這一場交易所的訓練，對於蔣介石的政治生活是很重要的，因爲他從此知道的吸血鬼的手段是更多也更狠了。

封建奴隸主的階級品格，交易所經紀人的階級品格，上海流氓的社會品格，暗殺犯的政治品格，這就是蔣介石早年所受過的各種訓練，並使蔣介石在政治活動中把封建奴隸主與大洋行買辦的一切陰險狠毒的吸血手段集中起來。這個與封建奴隸主大洋行買辦血統相關的政治賭棍，在一九二四——二七年的大革命中，以大資產階級——特別是江浙大資產階級的代表，進行頑固派的

控機，利用革命的弱點，因緣時會，篡竊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以便和帝國主義者進行政治的買賣，並從而篡竊革命，背叛革命，成爲大買辦大封建地主赤裸裸的血腥統治代表，代替了北洋軍閥的地位，得到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反革命援助，建立了中國買辦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最恐怖最殘暴的反革命王朝，「恣睢滅裂」，把無量數革命人民投入曠古未有的血海，而他對於賣國的無恥與勇敢，竟打破中國一切歷史的紀錄。這是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後一個大狗牙。這是中國人民的第一號公敵。從前判定爲罪大惡極的竊國大盜袁世凱，不論在竊國事業上，不論在賣國事業上，比起後來的蔣介石，都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這個中國人民的第一號公敵，對於他所有的滔天罪惡，却一直寫着是：「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一念至誠不爲私而爲公」、「不爲己而爲人」……這一切字典上好聽的字句。這一個第一號的人民公敵，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後一個大狗牙，二十年來罪惡貫盈，現在已再找不到逃脫人民捕捉的命運了。

註：報載：美帝國主義屠夫魏德邁參加蔣家「國務會議」時稱：「在美國之中國私人資產總額達十五億美元」。合衆社稱：這個數字比經常所報導者少兩三倍。照合衆社三倍的說法，就是四十五萬萬美元。這個存款絕大部份是四大家族的。

二 從假革命到反革命

(一) 假革命的兩面派

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基本的弱點，就是：第一，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雖然做了些事情，但是資產階級的軟弱無能與妥協性，不能與國內外的反動力量作堅決的鬥爭；第二，這個革命主要是依靠以會黨為組織形式的農民羣衆而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是資產階級不能也不願意發動農民羣衆到底，它只把發動農民限制在一定的程度和格式內，並且隨時準備加以結束，因此也就不能使農民獲得真實的利益。所謂資產階級的軟弱無能與妥協性，基本上正是從農民的問題表現出來。辛亥革命這類的弱點，就使革命半途而廢，它雖然推翻了已經腐朽透頂的滿清朝廷、並建立了一個名不實實的中華民國，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主義，却一點也沒有解決，並因而出現了以袁世凱為第一號的北洋軍閥統治。領導人民起來解決這兩個問題，而使中華民族獲得真正的獨立自由與富強，由辛亥革命所證明，顯然已不是資產階級所能夠勝任，而是需要等待新起的階級，新起的力量。這個新起的階級，就是中國無產階級；這個新起的力量，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為主、但同時包括其他革命階級和革命分子在內的人民大眾的力量。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這個新歷史的起點，就是五四運動。

從辛亥革命之後，中國資本主義曾經利用辛亥革命和帝國主義大戰的空隙，有了某種程度的發展，中國無產階級逐步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資產階級因為自己的利益，也企圖重新參加民族運動。成爲世界歷史最新紀元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正急驟地影響到東方，鼓舞了各民族的自我覺醒。以五四運動爲起點，中國各階級關係形成了新的結合。中國無產階級在政治舞台上出現，便特別表現了鬥爭的偉大英雄主義，不久就建立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偉大中國共產黨，這個黨在中國破天荒第一次明確地指出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規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綱領，認定解放農民乃是使我們民族與國家走向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基礎。毫無疑問，只有這個中國共產黨能夠對於反帝反封建的事業，採取勇敢、明確而堅定的政策，只有這個中國共產黨敢於放手發動農民羣衆及其他社會羣衆起來，進行翻天覆地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國產業無產階級在全國人口中雖然數量還不算大，但在全國政治生活的作用却偉大得無可比擬，佔了全國頭等的政治地位。中國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但革命的領導階級却由資產階級轉移到無產階級了。中國共產黨成爲全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領，它號召建立各階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任何農革命的階級、政派或個人，便需要與共產黨合作，才能有所作爲。聯共或反共乃是一切階級、一切政派以至任何個人的革命或反革命最尖銳的基本標誌和基本分水嶺。孫中山作爲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政派的革命代表，這時候便找到了革命的新道路，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改組了國民黨，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解釋爲新三民主義，規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綱，並決定辦一個軍事學校，即黃埔軍官學校。這樣，就形成了國共兩黨的合作，形成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民族統一戰線。

由於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使當時改組後的國民黨一度變更過去的特性

實。但是，原來國民黨這個組織，是包含有很多反對派在裏面的。中國既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買辦階級的政治活動，根據各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矛盾，有過很多錯綜的變化，代表某一個或某一派帝國主義的買辦勢力時常起來反對代表另一個或另一派帝國主義的買辦勢力，而每一派買辦勢力都想利用與鑽進各種政治機遇或政治場合，以便於自己取得政治地位。孫中山原來的國民黨就是參雜有這類不同的買辦勢力，並時常利用他們的財力直接影響以及操縱國民黨的政策。在政組時，這幫買辦勢力有的公開反對或公開脫黨了，但有的還埋伏在裏面，以便找尋時機，重振旗鼓，特別利用他們過去在金錢上對孫中山的幫助所留下的影響，他們是很能够利用各種歷史的聯繫，在國民黨內興風作浪的。另一方面，原來各省份裏面，特別是西南各省份裏面，一部份或為北洋軍閥反對派的地主勢力，他們在歷史上成爲國民黨的一部份，在國民黨改組之後，也仍然留在國民黨裏面。這樣，國民黨中的買辦勢力與封建勢力就還有其傳統的基礎，而資產階級中那個特別帶買辦性與封建性的部份——即大資產階級，則懷着兩面派的陰謀，從事政治的假設，一方面經過各種形式與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保留聯繫，互相勾結，一方面則在「革命」的假面具下，取得重要的職位。在上海國際買辦市場上鬼混並替那些買辦市場的黑幕中主人充當走卒的蔣介石，便成爲這種大資產階級兩面派的主要代表人。

這個蔣介石，進入上海交易所之後，雖然像前面所寫，一度發了橫財，「儼然富商」，但是據一個外國記者寫的「出賣黃浦灘」，他還是「會受過金錢的失敗」。他既然在經濟投機事業上「受過金錢的失敗」，民國十一年後上海交易所恰發生了不景氣的風潮，此路沒有交上好運，他就又想從政治投機上去重新找尋發財的捷徑，而蔣介石這種行動又恰是合乎交易所大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需要。由於陳其美已死，蔣介石的政治投機，就與特別靠近孫中山。他看到了十月革命影響的勢力之偉大，知道了孫中山對於十月革命的嚮慕以及孫中山和蘇聯發生了關係，覺得這是

一個可投的新機。於是就一度到了蘇聯。由於他做過這樣的一次投機旅行，以及他原來和國民黨有歷史的關係，而且先時又在日本學過「軍事」，所以，孫中山和廖仲凱就叫他去當黃埔軍校的校長。歷史說明了當時對於他擔任這個校長位置的決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當時共產黨人因為太老實，只是一片熱心，沒有注意幫助孫中山和廖仲凱去改變這個決定，當然也是犯了錯誤。這個流氓竊取這個重要的職位，是他後來能夠變成竊國大盜——賣國大盜的決定的契機。袁世凱小站練兵，形成了所謂「新建陸軍」，因而得到了帝國主義者和一切反動派的特別垂青，這是袁世凱能夠變成竊國大盜的資本。蔣介石因利乘便，當起黃埔軍官學校校長，因而使他得以盜竊革命的武裝，為帝國主義者和一切反動派所特別垂青，這也就是蔣介石能夠變成竊國大盜——賣國大盜的資本。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獨夫賣國賊的特點。

當然，在開始，蔣介石也還沒有完全懂得這個學校對於大資產階級和他本人確是可居的「奇貨」，而且害怕共產黨人的革命威嚴，所以，這個校長的職位，他原來沒有興趣去幹。他給孫中山和廖仲凱的信件也說明了這個事實。這個交易所經紀人來了又去，繼續在上海過他那「貫花天」的生活。當他一度去職的時候，他既沒有問過孫中山，也沒有問過廖仲凱，自己就給教職員發遣散費，聲明學校不辦。很明白：如果不是孫中山廖仲凱與共產黨人的堅持，這個學校也沒有了。事實是廖仲凱羅致了蔣介石，但蔣介石的一些奴才給他寫的傳記，却寫得好像是蔣介石羅致了廖仲凱。經過交易所的政客們的慫恿，這個交易所經紀人去了又來。由於革命運動的開展以及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用心用力，這個學校那時的確出色起來了。這時他的流氓哲學叫作「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就生效了。他真的認出這個學校是大資產階級可居的奇貨，他心意大動了。他就和那些在軍閥隊伍中找不到門路進身的一些軍事流氓像何應欽之類互相勾結，在黃埔中準備反革命的力量。

十三年五月間蔣介石給廖仲愷的一封信，本來是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的，他污辱蘇聯爲「亂撒之帝國主義」，還把廖仲愷也譏諷在「俄奴」裏面。這是大資產階級的內心態度。但是，當他以爲黃埔軍校是他可居的奇貨之後，他口裏就變了腔調。蔣介石深深知道沒有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幫助與蘇聯在政治上及物質上的幫助，這個學校是一定辦不起來的，軍隊也是一定組織不起來的。就說軍械吧：照一個蔣黨的回憶：在黃埔開校時，孫中山批發了三百支粵造毛瑟槍，但却只交涉到了三十支，勉強給衛兵守衛。有一天，孫中山告訴他們，蘇聯幫助的船隻要到，於是「全校自官長以至學生，無不興高彩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學生，喜得無地自容，拍手鼓掌，說今後革命有傢伙了，不愁了，眼望遠航船之到來，日如望歲」。當那批軍械到達之後，就「無不歡天喜地」。（王柏齡『黃埔創始之回憶』，黃埔季刊一卷三期）。這個故事，說明了蘇聯對於中國革命援助的重大，同時也說明了按機轉的蔣介石口裏爲什麼變更腔調的重大原因之一。

曹吳倒了之後，孫中山北上。那時全國革命的新潮正在向上發展。就在那時，黃埔的革命學生第一次東征陳炯明，在以共產黨人彭湃爲首的東江農民的援助之下，得到了大勝利。接着回師廣州，平定盤踞廣州的滇桂軍閥。五卅運動在全國引起了反帝的狂風暴雨，而廣東的省港大罷工更搖撼了英帝國主義在華南年代久遠的統治基礎，成爲廣東革命局面的偉大支柱，當時國共合作的革命軍隊就又在這省港革命的工人與東江革命的農民的協力之下，舉行了第二次東征。這幾次革命軍隊的行動，都很迅速地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革命軍中的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在這一切戰役中都表現了最英勇的無敵的先鋒作用，蘇聯顧問對於戰略計劃則起了決定的作用。這樣，蔣介石更特別看滿了這種武裝的革命力量是不可能從外部反革命來打敗的，他所代表的階級任務就是要從這武裝的革命力量內部把革命轉化爲反革命，而爲要達到這目的，他就要來一個偽裝，即由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裝成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而且好像是積極的擁護者。

那一個例子來說。民國十四年，即一九二五年，十月革命節，那是在第二次東征之後，蔣介石在汕頭是這麼演說的：

「今天我們所以能在汕頭與各位同志們開這樣的聯歡盛會，原因在什麼地方？爲什麼去年和前年不來，恰恰今年才成立了國民革命軍，就能完全克服潮梅，來到汕頭？這種迅速的進步，可以說完全是從我們總理實行中俄聯合的一點成效。時代變遷的影響，中華民族的覺悟，本黨同志的決心，和羣衆的力量，雖然對於革命進步的地方很多，但是本黨不改組，蘇俄同志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我們今天能够消滅叛逆，達到這個目的，大半可說是蘇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國際的實力，與其革命的使命，起來以至誠與本黨合作，幫助我們中國的效力。」

「帝國主義者所造的謠言，最有力最動人聽的一句話，就是說『中國人不應受俄國人的指揮』。我們且不講我們是否已受了俄國人的指揮，但我敢老實說，叫革命先進國的蘇俄來指導我們中國的革命，我們世界革命中的中國革命黨員，實是願意接受的，而且是應該接受的。去年總理將要北上的時候，對我不但是有面論，而且是有手論，總理的面論，說是：『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容納他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個樣子才好』。現在總理死了，各位蘇俄顧問對本黨的努力，仍然與總理在日一樣，以親愛的精神，以同志的資格，有事大家互相討論，求得真理，誰的主張有道理，就是實行誰的主張，並沒有一些勉強或遷就的事情。事實上蘇俄同志，並非居在指揮的地位……。」

「試問各位：蘇俄同志這兩年來的事實，還是幫助我們做賣國殃民的亡國奴？還是幫助我們做保國保種的革命黨？這樣一想，我們大家就可以明白總理聯合蘇俄的意義。並且應該

明白，如果蘇俄同志，願意指揮我們革命。我們亦願受他的指揮，不但不足爲恥，而且同列於世界革命黨員的地位，是一件人生最大的意義。」

這時候蔣介石所說的，就完全駁斥了他自己原來給廖仲愷信上所說的「凱撒之帝國主義」，而且也沒有認爲孫中山廖仲愷是「俄奴」了。照他的話，第一，孫中山的聯俄政策，極大地幫助了中國革命，如果沒有蘇聯的幫助，「國民革命軍就還不能發生」。第二，「蘇俄同志是幫助我們做保國保種的革命黨」，而不是「幫助我們做賣國殃民的亡國奴」。第三，「事實上蘇俄同志並非居在指揮的地位」，但是蔣介石把同樣的話重複地說了好幾遍，他是極願意接受「蘇俄同志指揮」的，並且以爲這「是一件人生最大的意義。」

蔣介石當時還陸續發表了許多駁斥反對蘇聯的言論，並且說，若以反蘇態度「紀念總理，繼理地下有知。當作九泉十日哭」。同時，他不斷的告誡黃埔的學生：「國民黨員反對共產黨，就是違反了總理定下來的方針和主張」。「總理決定下來的主張，我們是不可違背的。如果不然，就無論你如何信仰三民主義，也是假的了」。「反共產」這句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着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者的毒計嗎？」當時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反共「理論家」戴季陶，原來是他的知心朋友，是他辦交易所的同志，蔣介石對於他的反共「理論」也假惺惺地提出批駁，說他是「尊總理適以侮總理」，是「總理之不肖徒」，「吾儕當鳴鼓而攻之」。

可是，要明白：五卅之後全國風起雲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浪潮，偉大的省港大罷工，東江農民運動，業已開始聯省大資產階級和蔣介石的腦袋，特別是革命軍中和黃埔軍校中草著革命功勞的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更被蔣介石看成是他最直接的眼中釘，而那個「總理不肖徒」反賊封建與買辦的思想——戴季陶主義，在當時實際上已經成爲指導蔣介石的靈魂。當時戴

介石所縱容扶植的那個以反共爲目的、而與革命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對抗的孫文主義學會，就是以戴季陶主義爲它的思想基礎的。

(二) 對於人民的第一次大謀叛——「中山艦」是烟幕

據王柏齡稱：二次東征將結束時（即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間），這個反共的封建買辦軍事法西斯團體——孫文主義學會在廣州正式成立，並擬作示威遊行，向共產黨挑釁，經蔣介石下令制止，王柏齡和賀衷寒這批嘍囉即召集孫文主義學會幹事秘密指示：「我們的領袖，高瞻全局，恐怕這時不宜於開火」。這批軍事法西斯棍徒的遊行臨時作罷，這就是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所說的「機巧權術」。蔣介石所謂「恐怕這時不宜於開火」，就是因爲當時大資產階級還想繼續利用革命以鞏固它在廣東所剛得到的政治地位，並準備掠奪全國的政治地位，特別是取得江浙大資產階級經濟陣地的上海與政治陣地的南京，以便取得帝國主義的承認，而代替北洋軍閥及革命的領袖地位。因此，這個大資產階級——特別是江浙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就覺得還要「慎重」一下。

然而，在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軍統一廣東之後，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蔣介石既獲得了一定的地位，尋找機會打擊共產黨，以便削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就已成爲蔣介石堅決的企圖。工農學生大衆反帝反封建運動引起了大資產階級的畏懼和仇恨心，並把這種畏懼和仇恨心集中在全國已處在革命的武裝與反革命的武裝展開大的劇烈鬥爭的前夜，北伐的潮流已形成了新的局面，即全國已處在革命的武裝與反革命的武裝展開大的劇烈鬥爭的前夜，北伐的潮夜。蔣介石要在這個反帝反封建的大鬥爭中控制革命的發展，並準備在一定時機實行擁帝擁封擁

的反革命，於是蔣介石就更需要在事先盤算如何打擊共產黨，如何限制共產黨。武裝鬥爭既然是中國革命的特點，所以蔣介石在東征之後，就費盡心機，把排擠國民革命軍中爲革命建立了大功勞的共產黨人，當做他一切工作的先決條件。

結果，蔣介石的『殘忍陰謀』在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二十日出現了。這就是蔣介石和他的一批軍事法西斯羽翼——孫文主義學會人物所共同策劃的『中山艦事件』。三月十八日蔣介石下令要中山艦長李之龍（當時是共產黨員）開艦到黃埔，又放謠言說該艦艦長李之龍不服調遣擅入黃埔，係有『異動』等等，當夜廣州戒嚴，二十日蔣介石即藉口中山艦升火，說是『共產黨陰謀暴動』。蔣介石調動武裝，包圍了那廣東革命局面偉大支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包圍了東山俄顧問住處，扣押了黃埔軍校中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以周恩來（第一軍的政治部主任）爲首的全體共產黨員。請看當時得寵的蔣家黨徒王柏齡對於這一幕罪惡的敘述：

「……當中詳細，惟鄙人與蔣先生知之，未待蔣先生許可，我固不敢披露，而蔣先生對學生訓話亦謂如果要知道此回事變真相，等我死後看我的日記。於此可以判斷這次事件性質之重大，決不是宣傳爲中山艦者可比。中山艦云者烟幕也，非真歷史也，而收效之總樞，我敢說是孫文主義學會。」

看！當時參預這個罪大惡極的機密的蔣家黨徒就是這末供認的：「中山艦云者烟幕也，非真歷史也」。是誰放的烟幕呢？照王柏齡的文章看來，不就是蔣介石嗎？是誰經過孫文主義學會這個『總樞』去『收效』呢？照王柏齡的文章看來，不就是蔣介石嗎？真歷史是什麼呢？就是蔣介石陰謀絞殺中國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這是大資產階級代表蔣介石對於中國革命的第一次大謀叛。

在黃埔軍校與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共產黨員被扣押時，蔣介石強迫共產黨退出第一軍。這第一

軍的創建和戰績，原來是與共產黨人的努力與流血不可分開的，在東征一度危急時，共產黨員還救過蔣介石的一條性命。在統一廣東之後，謀殺革命的蔣介石就採用了這樣的手段當做報答。但蔣介石的說法是這樣：「今共產份子，為免除本軍內部之糾紛，均願以一律自動的退出，並期於他種工作上，共同奮鬥」（『蔣校長演講集』二二六頁）。以這個軍事上的「殘忍陰謀」為主要契機，蔣介石開始宣傳他那一個人主義一個黨（實際也包含一個領袖，但當時還不方便明白說）的法西斯專制。隨後在國民黨中限制共產黨的所謂「整理黨務案」也出來了。蔣介石把他一批浙江同鄉反人民的右派，也即當時江浙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陳果夫、張靜江、葉楚傖、邵元沖等招納到國民黨中央黨部，以便篡奪黨權。這樣，蔣介石就開始在各方面破壞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也即開始破壞蔣介石自己所說的「總理深知必能容納共產黨始為真正之國民黨」。蔣介石給反共的老傢伙張繼的信還說：「不能懷疑及於總理所定與共產黨合作之政策」。但同時，就蔣介石看來，「懷疑」這件事已太「腐朽」了，他正在暗笑張繼的「書生」，他不是懷疑，而是要實際上加以有步驟的破壞。三月二十日的陰謀，直至五月間蔣介石所自吹自唱的「整理黨務案」，這一連串的事件，就是蔣介石開始反叛孫中山三大政策、經過篡奪第一軍而達到篡黨、篡政的初步工作。

到所謂「整理黨務案」的時候，蔣介石已經一手集中了國民黨中央的許多權力。經過他自己封，他是中常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組織部長，軍人部長，而張靜江的「中政會主席」不過是蔣介石的一個傀儡。就是說：蔣介石已在開始嘗試獨裁制度的建立。

蔣介石這一切行為，是利用過中國無產階級當時的弱點。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力量，在大革命初期已完全證明出來了；但是，那時中國共產黨還是幼年。中國共產黨人對於人民事業抱着衝天的熱情，並善於向公開的敵人作戰，但是，還缺乏很多的政治經驗，只是

樸素，老實，特別是對於陰險狠毒的一時同盟者，總是採取天真爛漫的好心善意的態度，沒有提防他們背後的一切「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君子可欺以其方』。這個交易所經紀人、青幫流氓、暗殺家、假革命的兩面派——蔣介石，早已看出了這點。傑出的毛澤東在三月二十日事件時候，曾提出過對蔣介石反叛行為必須加以反擊的意見，但機會主義的陳獨秀是不能夠採取這樣的意見的。事實上，自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來，陳獨秀的各種機會主義護步，助長了蔣介石掠奪革命軍領導權的野心，給蔣介石開了許多反共活動的便利路子。而這番仔令蔣介石順利地獨佔了原來是共產黨人的熱血所灌溉起來的第一軍，更是表現了陳獨秀機會主義的大罪惡。

蔣介石也利用了國民黨內那些真正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的弱點。當時國民黨內有一批小資產階級份子，他們衷心覺悟孫中山三大政策是救中國的道路，但是，他們缺乏政治的決心以抵抗蔣介石的謀叛，結果蔣介石也就壓倒了他們。

(三) 繼續玩弄兩面派的戲法

但這裏的話又說回來：蔣介石原來所考慮的『不宜過早開火』，這時候也還是保持這樣的考慮。這時候蔣介石的反共活動，所採取的形式，主要的還是『限共』的形式。蔣介石還沒有決定和共產黨作最後的公開的決裂。他只做到前述的程度。在三月二十日事件之後，蔣介石除了以極大的惡意詆毀共產黨外，還會繼續極陰謀極毒害地軍校及軍隊中的共產黨人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退出自己的黨和團，不過蔣介石這類企圖都遇到了可憐的、無恥的失敗。蔣介石既然想在北伐中做一筆大生意，而北伐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力量，如果沒有工農羣衆的力量，如果沒有加上蘇聯的幫助，那就不能夠走進一步。因此，蔣介石的臉還是不便一下翻到底的。當時汪精衛說：『土耳

其革命成功，乃殺共產黨，中國革命未成，又欲殺共產黨乎？」（見蔣介石的信所述）汪精衛的意見顯然是說：殺是要殺的，但不要太早了。事實上，蔣介石很了解汪精衛這個「道理」。五六月間，這個交易所經紀人於是又逐漸改變了腔調。他聲明了：「中山艦案是與中國共產黨本部沒有關係的」。「我絕不承認三月十八日那天的事件，共產黨有什麼陰謀在內」（見蔣介石的「蔣紀念週訓詞」，「蔣委員長演講集」一四三頁）。

蔣介石並且說：

「我對於共產同志，親愛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對於我的學生，旁的不敢說，但是一般學生都知道革命分子是要團結的，如果殺共產黨，無異他自殺，這點理性是統統能理解」（十五年五月蔣介石對全體黨代表講演）。

蔣介石假惺惺地表白得好像是「共產黨的好朋友」，而且簡直好像「精通了」中國革命的道理，並且還是一個「大預言家」，因為他說：「如果殺共產黨，無異他自殺」。

這個極端狡猾、極端狠心的狐狸又在向共產黨人獻媚。他說：「當C.P.分子退出了軍隊，如果永久不加進去，終會使軍隊減少力量」（蔣介石的「高級政治訓練班訓詞」）。你看！三月二十日蔣介石是那樣的，沒有多少時候，蔣介石又是這樣說了。

在這時候，蔣介石又公開說出「中國革命必須受第三國際的指導」了。

蔣介石在各方面繼續吐出不少「左」的辭句。蔣介石這一切姿態是反映了一個最真實的事實，就是：如果沒有繼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便不可能有北伐的事業。不過這一切姿態，又都是蔣介石包含毒藥的糖菓。蔣介石的手段是：笑裏藏刀，但拿出刀來，還有所等待。以「限共」的形式反共，繼續聯共，準備在新的一定場合殺共——這就是這個交易所經紀人、青幫大流氓的步

一方面限制共產黨，一方面又還聯合共產黨，一方面聯合共產黨，一方面又準備大舉屠殺共產黨，形成了當時大資產階級的兩面政策。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是以聯合共產黨為中心環節，大資產階級對共的兩面政策，就決定它對孫中山整個三大政策的態度。蔣介石執行這兩面政策的方法，是以全力扶植那和封建買辦相結合的右派力量，孫文主義學會，當然是他注意的中心。陳其美的任子、蔣介石的交易所知交之一——陳果夫在國民黨中央代理他做組織部長，也就便利於利用各種名義去組織各種黑色的力量。這時蔣介石又把他在三月二十日事件前一個星期所批駁為「總理不肖徒」的戴季陶找去當廣州中山大學校長，以便佈置反對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教育。當然，戴季陶——這個蔣介石的另一個交易所知交——也有他的一套，他這時到廣州之後，便稱起鮑羅廷做「尙父」了。蔣介石採取了這類的組織的和人物的佈置，同時對於若干不是他的親信和同系的右派人物，對於若干在江浙大資產階級的派系之外、代表廣東大資產階級派系的右派人物，如伍朝樞、古應芬、吳鐵城等，則採取某種疎遠或打擊的態度，一方面，這些人物反共色彩過濃，要馬上最後分裂國共合作，這在蔣介石看來，當時是「不策略」的，不合乎他的「機巧權術」；另一方面，這些反共人物雖然是他的同行，但對他的關係說來，却是異己的派系；因此，採取某種疎遠或打擊的態度，可以迷惑人們的視聽，故意想使人以為他在左右之間的態度好像「不可捉摸」，又可以便利蔣介石自己派系在各種政治位置上與組織上的獨佔，免得別人來插手插足。

蔣介石對於他所開始的各種反革命的獨裁陰謀，在這時候，還極力表明「此地無銀三十兩」，以抵擋羣衆及當時黃埔革命學生所開始的感覺和攻擊。請聽當時蔣介石對黃埔學生是怎樣說的：

「我們中國的軍人還有一種最大的毛病，就是只知盲從官長，不知國家是什麼？主纔是

什麼？……比方我們自己的父親做錯了事，同我們主義違反，我們也應該反對他，革他的命。……你們在這個學校就學，你們校長固然是蔣中正，但是你們切不可想，我就是蔣中正的學生，蔣中正就是我的先生；更不可想，我們做學生的，就要聽先生的命令。如果你要這樣存心，完全用私人感情來作革命，那你們的革命一定不能成功，而且你們的人格亦掃地了。」

簡直說得很不錯。簡直沒有人能够想像得出蔣介石在二十幾年前是說過這麼漂亮的話。他說自從要不得。他說兒子可以革父親的命，學生可以革先生的命，部下可以革官長的命。可是，你對於蔣介石這一類的漂亮話，果然信以為真嗎？這全是蔣介石當時進行篡軍、篡黨、篡政、造成以他個人反革命的獨裁為中心的活動的「潤滑」之一。蔣介石口裏所說的這些東西，全是蔣介石本心和實際行為的反面。

事實上，在三月二十日事件之後，蔣介石在黃埔第四期學生面前，已經吐露他不可避免與人民為敵。他說：「如果要我帶兵，將來環境一變，或是思想隨到變更，不期然而然的變成了一個軍閥，亦未可知」（見蔣介石的「蔣校長演講集」六十頁）。不是「亦未可知」，而是他已經內心有數，準備在「將來環境一變，思想隨到變更」，就變成一個完全公開的背面獠牙的殺人不要臉的軍閥，而事實上，他是變成了中國有史以來殺人最多的最大軍閥。

（四）竊取北伐軍的總司令職權

有名的北伐戰爭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掃除封建勢力！」的口號下開始了。像東征一樣，這是國共合作進行的戰爭，這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民族統一戰線的

戰爭。第一個率師北伐並且戰功最大的名將，是著名的共產黨員——葉挺將軍。先打進湖南，擊潰敵人、而穩定湖南戰局、鞏固北伐軍事基礎的，是葉挺帶領的獨立團；在汀泗橋、賀勝橋等激烈戰役中，打败吳佩孚主力，完全開拓北伐勝利的局面的，是這個著名的革命獨立團；直搗武昌城下的先鋒隊，並最後攻下武昌的，又是這個著名的革命獨立團。當時這個獨立團是歸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名義下，這第四軍當時被叫做「鐵軍」，這個「鐵軍」名義的主要來源，就是這個英勇無雙的革命獨立團。雖然這是一個獨立團，但他的無限戰鬥力，却突破了北伐以前中國軍隊史的紀錄。原因是什麼呢？就部隊本身來說，這個先鋒隊的骨幹，主要是由共產黨員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所組成的；就整個革命的社會基礎來說，這個先鋒隊是和那以毛澤東為旗幟的偉大湖南農民運動相結合的。不但這個獨立團，當時所有北伐的部隊，都首先在湖南得到革命的農民的援助，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戰功。

在這北伐的運動中，蔣介石就在廣州後方利用了他在三月二十日事件以後所竊取的黨權，而竊取了總司令的名義。蔣介石歷史的過程是：經過總軍（第一軍）以黨黨執政，現在又再經過黨黨以進一步地黨軍執政。蔣介石企圖在這個「總司令」的名義下，形成一套完整的軍事獨裁。根據蔣介石自己規定，凡國民政府下之陸海航空各軍，都歸他統轄；政治部、參謀部、軍需部、海軍局、航空局以及兵工廠等機關，都直屬於總司令部；而且，凡是國民政府下各省的民政財政，都受總司令指揮；各省各軍的首長，都歸總司令任免。也即是：由總司令「統一軍令政令」，總司令部即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即總司令部。這一切軍事獨裁的規模，實際上乃是大資產階級及其代表蔣介石準備最後背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專業的一種佈置。

但是，正如大家所知，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的工農乃是北伐最大的原動力。北伐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光鋒隊是上述的那個為共產黨員所組織的革命獨立團，北伐各軍的政治工作是由共產黨

人負主要的責任，而蠢人皆知，這種政治工作，對於戰爭的勝利是極重大的因素。至於戰略計劃，則是蘇聯顧問主持的。像在湖南所遇見的一樣，中國共產黨人在各省各地鼓動民衆、組織民衆、組織便衣隊，與北伐軍響應外合，更促進了軍事的迅速的與偉大的勝利。因此，蔣介石在還沒有達到自己一定目標、一定地位的時候，他也還是儘量裝着『革命』的姿態。那時北方軍閥和一切反動派在帝國主義鼓譟之下，反革命的名義就是『反赤』或『討赤』。蔣介石在『出師宣言』中，作了以下的回答：

『吳賊（指吳佩孚）所資爲號召者，厥爲『討赤』。夫討赤，乃帝國主義者用以對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破壞世界革命聯合戰線之口號也。『赤』爲何義？蘇俄之赤黨與赤軍。以赤職表示其革命羣衆之赤血，換得其國家獨立自由之代價也。解放人類之痛苦，保障人民之利益，以民衆爲基礎，而推翻其帝制之白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實行廢除不平等條約，而爲全世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類謀解放者也。帝國主義口中之赤化者，實則革命之民衆化耳。政府爲民衆化之政府，軍隊爲民衆化之軍隊，以民衆化之國民革命軍，擁護多數被壓迫之人類，即使云赤，何嫌何疑？充吳賊之意，舉凡愛國者皆赤之，爲求中國自由平等者皆赤之，反對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皆赤之；充蔣至盡，則舉吾四萬萬愛國之同胞皆赤之。吳賊甘爲帝國主義之走狗，願與吾民衆爲仇讎，其口吻固應如是。然吾愛國同胞，則非揭破吳賊之陰謀，聲討吳賊之罪惡，不足廓其煽惑人民之工具也。』

通篇都是『慷慨激昂』的文字，這裏還只是摘引一個部份。這是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在長沙發的。從這時起到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流血的清黨，還不到八個月的時間，但蔣介石這篇文告裏面所有的『吳賊』的『吳』字就都該換成『蔣』字了，即『吳賊』換成了『蔣賊』，不過蔣賊比起吳賊來，是無數倍的『後來居上』罷了。

(五) 在北伐中的兩大掃興與總司令部的反革命陰風

蔣介石——這個交易所經紀人，在北伐中，有兩件事感到極端掃興。第一件是：北伐的運動是眞的使革命大大「民衆化」起來了。民衆援助了北伐戰爭的勝利，同時工人、農民、和學生的羣衆運動也隨着北伐戰爭的勝利而風起雲湧，在東亞大陸上到處燃燒了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衆革命火燄，而以毛澤東爲首領的湖南農民運動更闢出了大革命的高潮。與封建及買辦血脈相聯的大資產階級對這個情況，極度痛心疾首。不久之前聲稱「以民衆化之國民革命軍擁護多數被壓迫之人類，即使云赤，何嫌何疑」的蔣介石，這時極度顫抖起來了。他認爲：這種反帝反封建的羣衆運動是「赤化」，是要不得的。毛澤東的大革命名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敘述農民所做的各項完全是中國有史以來的最大好事之後，說過以下的话：

「……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很奇怪，南昌方面傳來消息，說蔣介石、張靜江諸位先生之意，頗不以湖南農民的舉動爲然，湖南的右派領袖劉嶽峙輩，與蔣、張諸公一個意見，都說「這簡直是赤化了。」我想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麼國民革命？嚙裏天天說喚起民衆，民衆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與葉公好龍有什麼兩樣？」葉公說是「好龍」，可是一見了龍，就「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蔣介石也一樣，他說是「好民衆」，可是一見了民衆，也就「棄而還走，失了魂魄，五色無主」了。

蔣介石掃興的第二件事，是：他的嫡系部隊在北伐中毫無作戰能力，遇戰就敗。北伐戰爭反覆證明：凡是那個軍隊有共產黨員在內的，便能打敗革命的敵人，得了顯赫的戰功；反之，那個軍隊就打敗仗，疲無聲色。第一軍在兩次東征時候，那是以共產黨員爲主幹的國共合作的軍隊，

就戰無不勝，威名赫赫，可是，自從三月二十日事件，該軍共產黨員被蔣介石追退之後，成了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這個部隊的主要部份由他的黨徒副軍長王敬德帶領北上，就到處被打敗，而在南昌遇到孫傳芳更敗得狼狽不堪。蔣介石原來依靠這個部隊以竊取總司令的職位，並想依靠這個部隊在北伐中助長他的「威風」，可是事實却使蔣介石大掃其興。

全國民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高潮與蔣介石嫡系部隊的北伐無能，使得蔣介石原來控制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佈置，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十五年九月間，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在廣州開聯席會議，議決提高黨內民主反對獨裁，發展工農運動，實行二五減租等等反帝反封建的綱領，這些都不合蔣介石的意想。十一月間，北伐各軍攻克南昌之後，蔣介石因利乘便，就在那裏放下總司令部，接着遷都地點的問題就爭論起來了。國民黨中央決定遷都武漢，那時兩湖和武漢的民眾運動既有很大發展，北伐的光鋒隊葉挺隊伍在武漢擔任衛戍的工作，遷都武漢是對革命有利的。但是，這對於大資產階級代表的蔣介石却是不利。蔣介石爭着要遷到南昌，以便受他的控制。蔣介石爭論失敗，國民黨中央在十六年一月一日便在武漢執行職權。那時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間，以孫夫人宋慶齡鄧演達等為中心骨幹結合了一批國民黨左派，堅決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加上在國民黨中担任中央委員的共產黨員（他們對於國民黨改組和改組後國民黨在各地的建設，都有最大功勞），在國民黨中央便形成了多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因此就更着急起來。有一本書這樣寫道：

「十五年多湖鄂贛相繼攻下，革命軍聲勢日大，外間時有蔣介石將解決共產黨之論。其時蔣派代表戴季陶赴日本，而對北方妥協之呼聲亦甚高，說者皆以此為解決共產黨脫離蘇俄之準備」（『中華民國政治史』，文化學社印行）。

蔣介石的代表就是蔣介石不久之前所一度指為「總理不肖徒」的反共論客，蔣介石所要求

救的主子，就是與中華民族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自從蔣介石駐在南昌之後，帝國主義者與中國反動派便舉行「政治南伐」：親日派並精通中國封建統治權術而和北洋軍閥有密切關係的政學系政客——黃郛、張肇，以及和各國帝國主義者都有相當姻緣的王正廷等類人，都兼負有江浙財閥的使命，相繼出入於蔣介石的幕府，作為他秘密的上賓，以進行謀叛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業。而和各帝國主義者接洽有素的大買辦虞洽卿並親到南昌，答應他到上海南京後借給六千萬元，而「以反共減共為條件」。反革命的陰風從蔣介石的總司令部裏面吹動起來了。

十六年一月三日，漢口工人階級在共產黨優秀的領導人物劉少奇指導之下，舉行了英勇示威，驅逐英帝國主義在租界的巡捕，把英租界收回。這是百年來中國人民反帝第一次的大成果。帝國主義者因此更積極進行分化國民黨內部的工作。英帝國主義增兵上海，同時上海英帝國主義的報紙開始大獎勵國民黨內的「溫和派」，並採取恐嚇的筆調。蔣介石既派了戴季陶往日本，這時日本帝國主義「禮尚往來」，也派人到中國進行大活動。據二十五年夏間，日文報「京津日日新聞」所載日本在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永見俊德發表的「生平最大難忘事件」一篇談話，大意說：「此時國共如不分家，則全國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將遭覆滅，而日本尤甚。因此，當時日本軍部焦急萬狀，就派永見和松室孝良兩大佐，作破壞中國革命的全圖」（原文一時沒有找到，此段文字引自一個作者在「世界知識」發表的文章）。帝國主義者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逐步合拍，而蔣介石因為已取得了帝國主義者的寵幸，就日益壯大謀叛的胆量。

（六）歷史的大背叛——歷史的大血日

三月十二日，蔣介石即唆使他的走狗慘殺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十六日，蔣介石的走狗

段錫朋受蔣介石命令解散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國民黨市黨部。反革命的A B團就在蔣介石的策動之下，敢在南昌街上拿着旗子，作反革命的喊叫。十七日，蔣介石叫九江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即蔣介石青紅幫的密友楊虎，副處長溫健剛；集合青紅幫呼「新軍閥萬歲」「蔣總司令萬歲」「打倒赤化分子」等口號，手持長矛大刀圍攻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九江國民黨市黨部與總工會，工會多人受傷，工人組織糾察隊準備解除暴徒武裝，蔣介石即派衛士大隊彈壓工人，掩護暴徒出市，並以保護為名，調兵佔領市黨部與總工會，當晚，蔣介石即派戒嚴司令，以壓迫工人的反抗。二十三日在安慶又叫楊虎溫健剛等特務流氓利用偽團體如所謂「安徽總工會」的名義，發起大會歡迎蔣介石，並用每名四元的身價，收買流氓，成立一百人的敢死隊，約定敢死隊賞格，輕傷者賞一百元，重傷者五百元，喪命者一千五百元，要他們在大會中殺害革命分子。這個月底，蔣介石的法西斯暴徒匪類，並在福建四川即開始屠殺的恐怖。

當然，蔣介石的發後大行動，還有所等待。北伐中原來有戰功的部隊對於蔣介石都不是可靠的。第一軍還有一部份由蔣家黨何應欽帶領，這部份在贛楚方面利用孫傳芳主力在江西和周蔭人內部的分化，幾乎沒有打什麼仗，就直入贛楚，遂又在那裏擴充兵力，蔣介石要等待接上這個部隊，又要等待搜集一些從北方軍閥投奔過來的部隊，以便作為反革命的先鋒。同時，蔣介石原來處心積慮，既然是要取得南京上海，以取得反革命的全國政治地位，特別是在那裏便於和帝國主義作直接的政治交易，便於直接取得帝國主義的援助，蔣介石就需要他所等待的那些部隊到達這些地點以後，他才能放肆發動反革命的大政變。蔣介石從去年底在南昌用全力佈置反革命活動以後，也還有時裝得「假仁假義」，比如，蔣介石二月二十五日所發的「對黨務宣傳大綱宣言」，那裏字裏行間，都流露了他對革命的仇恨，可是却又寫着「對於中央黨部之決議（即武漢國民黨中央關於實行民主反對獨裁的決議）；一時一刻，毋或少忘」，這些都是為的麻醉革命者的警

覺，事實上，他「一時一刻，毋或少忘」的，乃是佈置如何反革命。

南京上海都不是蔣介石的部隊打下的。南京是當時有共產黨人（以林祖涵爲主要代表）參加領導和參加作戰的部隊（即第六軍與第二軍，當時這兩軍是受武漢的命令）打下的，上海是第三次起義的上海工人階級打下的。當北伐軍攻下南京的時候，美英軍艦向南京開炮轟擊，連日不絕，中國人死了兩千多個，財產的損失不計其數，但美英帝國主義這個炮擊，正合了蔣介石的心願，因爲這使得蔣介石得以馬上利用機會插足到南京來。

在三月間，蔣介石望着反帝反封建的偉大先鋒隊——上海革命工人的力量與北洋軍閥進行流血的苦戰，而按兵不進。蔣介石計劃：先讓上海工人去獨力和北洋軍閥作戰，然後蔣介石的足就踏在那因作戰受傷、並且沒有馬上準備提防蔣介石反水的上海工人的背上，這樣，蔣介石就既可坐受克復上海的果實，又可便於進行流血的反革命。在上海工人驅逐北洋軍閥之後，蔣介石反革命的脚步也跟着來了。

蔣介石——這個交易所經紀人，青幫大流氓，回到上海來了。

上海——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最大的國際貿易市場，中國販賣人口、販賣鴉片、販賣軍火的主要入口。但同時，上海佔有當時中國近代工業的一半以上，爲中國無產階級最集中的地帶，五卅運動的偉大火燄就是從這裏的工人與學生先點燃起來，而燒到全中國的。蔣介石對於上海這地方並不生疎。上海的黑暗面，是他原來的職業所密切聯繫的一面。上海的光明面，又是他原來望而生畏的一面。蔣介石在交易所當中，有過勝利，也有過失敗，現在他帶着武器回來了，他要經過武器去取得交易所的勝利。交易所的老闆們和一切集中在上海的大封建奴隸主（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指出過：那時「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這時候正需要他，需要他去打擊上海革命的工人階級，需要他去公開反對土地革命，

因此也就都「尊重」他，不會讓他再有「金錢的失敗」。蔣介石想得很清楚：他這回儘可以在交易場所的場合中稱王稱霸了，並且馬上就會有人賄賂他很多錢財。但蔣介石想得更清楚：他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需先進行流血的反革命，以保衛交易所老闆們——這批吸血的大洋行買辦和封建奴隸主的財產，同時又以保衛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陣地。

蔣介石一到上海，便住龍華交涉員公署。蔣介石還來不及先去視察他原來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的交易所，就馬上先開起這個政治交易所。他到「外國人」那裏去，「外國人」也在他這裏忙進忙出。蔣介石經過黃郛、戴季陶、王正廷等人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來往，經過虞洽卿、宋子文等人和英帝國主義者、美帝國主義者來往，經過吳稚暉、李石曾、鈕永建等人和法帝國主義者來往。這是一宗歷史上空前的血腥大買賣。原來上海黑暗市場所進行的關於人口、鴉片、軍火這類的買賣，比起蔣介石這宗以中華全民族的命運為賭注的血腥大買賣，都簡直小得無法比擬，也不便比擬。在這宗與帝國主義者血腥的交易當中，蔣介石的老上司和老朋友，就有的出錢，有的出打手。出錢的就是他的交易所老闆虞洽卿之類，出打手的就是他的青紅幫老師父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之類。

這個歷史上最大的創子手在與帝國主義者佈置這個歷史上最大的「殘忍陰謀」的時候，繼續使用他的另一套「機巧權術」，在「四一二」的前幾天，還派遣了普樂隊給革命的海總工會掛紅送旗，以表示他對於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蔣介石繼續利用共產黨人的誠實可欺，以便向着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進行突然的襲擊，而陳獨秀機會主義對於反革命的各種讓步又讓步，沒有去準備提防，因此就實際地幫助了蔣介石這一突然的襲擊。

四月十二日，愛國的同胞們！勞苦的同胞們！永遠地記着民國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這一個日子！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血日！先是，蔣介石一方面集合了那些供他指使的部隊，準備大

屠殺，一方面拿五萬元供給黃金榮社月笙張嘯林等青紅幫頭子所組織的「中華共進會」，召集一批流氓，排成隊伍，袖纏「工」字符號，開始襲擊工人糾察隊，糾察隊加以抵抗。在這一個人子，愛國的同胞們！勞苦的同胞們！記着，就是四月十二日，蔣介石，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開始舉行大屠殺！蔣介石派遣軍隊，藉口什麼「工人內訌」，利用革命方面沒有防備，把原來與北洋軍閥血戰的工人糾察隊繳械了！這時候，工人們對於這個昨天的同盟者還仍然是太老實了，全上海工人到鬧北開羣衆大會，並往司令部「請願」，但蔣介石在那裏早佈置下了，對「請願」的羣衆來一個迎面開槍。正當工人們越來越多的時候，愛國的同胞們，勞苦的同胞們，記着，就是蔣介石，他命令機關槍掃射了！工人們的屍首一個一個地倒滿街路上！從蔣介石提起屠刀這一天開始，在上海，在一切蔣家黨徒力量所到的地方，都繼續不斷地充滿了公開的與秘密的殺人的恐怖。上海變成了蔣介石嘍囉的「虎羣」世界（按：「虎」指楊虎——即蔣介石青紅幫知交之一；「羣」指陳羣——即親日大漢奸；這兩人當時與劊子手白崇禧共同担任上海軍政大權，以殺人多少向蔣介石請賞，人們叫做「虎羣」），東南各省到處流着革命人民的赤血。四一二之後，蔣介石聯合各帝國主義，對於武漢實行威脅、封鎖、利誘、分化的各項殘暴與惡毒的政策，利用武漢內部的矛盾（其中有很大的部份投機分子，還有大地主與大資產階級的不同勢力），勾結叛徒作亂，屠殺農民革命，以瓦解武漢的革命局面，同時，陳獨秀機會主義拒絕毛澤東農民革命與武漢人民的堅決政策，並且接受汪精衛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的反革命政策，恰恰又是在實際上幫助了蔣介石與正在計劃叛變的汪精衛。果然，逗留武漢的汪精衛很快也趕上蔣介石來了。「甯可錯殺千百，不可放走一人」，成了蔣汪向帝國主義獻媚的殺人競賽的標語。五四以來所結集的民族精華，優秀的革命人物，或是工人，或是農民，或是智識分子，如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蕭楚女、張太雷、羅亦農……等等，這一切無價的民族珍寶，在蔣介石汪精衛的刀下，被割

斷了頭顱，蔣介石汗精衛看得完全像割草一樣，把這無量數的革命屍首爲取信於帝國主義的贊見禮。不論世界上那次大瘟疫，都比不上這次蔣介石刀下死亡之慘，同時，中國人民爲自由流血的英勇壯烈，前仆後繼，則爲偉大中華民族放大光明，並說明了中華民族必將得到解放而永生，而劊子手蔣介石和他的一批狗奴才必不能逃免人民正義的最後裁判。

毛澤東稱蔣介石這個歷史的大背叛爲「叛賣」，爲「背信棄義」（見論聯合政府）。大家看！蔣介石原來是那末信誓旦旦，宣稱他如何忠實於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而且完全是依靠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依靠蘇聯的幫助，才獲得了軍事的勝利與政治地位。但是，轉瞬之間，他竟然那末忘恩負義，翻臉無情，「昨天的同盟者——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被看成了仇敵，昨天的敵人——帝國主義者與封建主義者，被看成了同盟者」。並且採用的手段，是這樣大規模與極殘酷的突然襲擊。這真叫做「人之無良，一至於此」，是道德的完全毀滅。

有一個原來參加過「清黨」而後來自己曾經反省過的國民黨員，對於這次大流血，作過以下的斷語：

「整個國家政治就從此顛倒矛盾，一切災禍亦接踵而至。……嗚呼，不知多少萬熱血青年，就在這「清黨」明文的「停止活動」四字之下，斷送了最寶貴的生命！國民黨爲「救黨」（按：應該說是：蔣介石爲篡奪孫中山所改組的國民黨）而屠殺了中國數百萬有志有識的青年，這個損失是中國空前絕後的損失，即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亦必不至於此。」

「國民黨之最大犯罪爲清黨，剿滅民族生命力之「清黨」爲此後國民黨一切犯罪之總根源」。

這類斷語是不錯的。但是，蔣介石的狼心，一直刺一九四三年所出版的臭名昭著的「中國之命運」字裏行間，還在悵悵沒有把共產黨殺盡。蔣介石用的名義，依然是曹錕、吳佩孚、孫傳

芳、張作霖、張宗昌所用的名義，叫做「反共」「反赤」。就像蔣介石不久之前聲討吳佩孚所說的：「充蔣賊之意，舉凡愛國者皆赤之，為求中國自由平等者皆赤之，反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者皆赤之；充義至盡，則舉吾四萬萬愛國之同胞皆赤之。蔣賊甘為帝國主義之走狗，願與吾民衆為仇讎，其口吻固應如是」。因此，蔣賊殺人的慾望也絕對沒有鑿足的時候。

蔣介石以前說過：「假如我蔣中正有違反我們黨主義的地方，你們學生可以反對我，可以革我校長的生命……如果我做校長的，有違反紀律背叛主義的時候，至少亦要就地槍斃。倘若不是這樣做，官長的權限一大，便可賣黨賣國，胡作亂為」。但蔣介石自從走出南昌，一路便即公開喊出「誰反對我就是反革命」，蔣介石對於自己的預言很正確：「官長的權限一大，便可賣黨賣國，胡作亂為」。他從來所佈置的自己獨裁權力，實在就是為的達到他這個「賣黨」（按：賣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賣國，胡作亂為」的目的。他的「權限一大」，他便是「紀律」，「紀律」便是他，而他的紀律，就是「賣黨賣國、胡作亂為」，誰敢主張孫中山三大政策的紀律，而違背蔣介石的紀律，革蔣介石的命的，就都「至少亦要就地槍斃」了。蔣介石的「紀律」結果也使得在武漢的汪精衛趕上去「就範」，於是，蔣介石篡奪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篡奪國民革命軍、篡奪國民政府這一切罪惡事業，就集了大成。人民公敵的蔣介石成了比袁世凱更大的竊國大盜，而從此也就成了比袁世凱更大的賣國大盜。

一九二四——二七年這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個革命的規模是辛亥革命所不可比擬的。經過共產黨的領導，工人組織起來，農民組織起來，學生組織起來，而且經過共產黨的領導，創造了新式的軍隊，因此革命就形成了強大的戰鬥力。革命的行程證明了中國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創造力是無限的。革命的所以失敗，所以被蔣介

石納入反革命的血泊裏面，毛澤東在最近偉大的文告中會這末概括到：「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戰爭達到高潮的時期，我黨領導機關的投降主義分子，自願放棄對於農民羣衆、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敗」。毛澤東所說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對於農民羣衆、小資產階級羣衆及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所說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指的根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這次大革命中各種弱點所集中表現出來的根本的弱點，就是還沒有在一切革命力量到達的地方，完全徹底地破壞古老的腐敗的封建奴隸主與洋行買辦的軍閥的與官僚的制度，由革命的各階級經過完全嶄新的人民革命的制度去直接掌握軍事的與行政的權力，即完全實現一個真正的革命人民的民主專政。當時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方針所歌頌的，所追求的，正是這樣的人民民主權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以最高度的熱情敘述了當時革命農民的專政：「農民有了組織，便行動起來。他們主要攻擊的目標，爲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思想制度，城裏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種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毛澤東認爲：在革命時期，「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大權力，必須不准入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打倒」。毛澤東提的是革命農民的「絕大權力」，這就是說，需要根本打碎過去反革命階級的全部統治機器。但當時共產黨內的陳獨秀投降主義拒絕毛澤東這樣的方針。毛澤東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特別加重地說「尤其是」，就是說，這是政權這個根本問題中的根本問題。大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是武裝鬥爭，共產黨人在革命軍隊中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政治制度，並且東征與北伐的各軍政兩部的負責人與上下工作人員絕大部份都是由共產黨員擔任，這是中國舊軍隊制度的一大破產，一大革命，正是軍隊制度有這一方面的革命，就使得東征與北伐的軍隊與人民結合起來，把北洋軍閥的軍隊打得像摧枯拉朽。但是，當時對於軍隊的舊軍閥制度的破壞是極不徹底的。

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在北伐前，既放任蔣介石在第一軍中逐出共產黨，在北伐中又更遷就了蔣介石，他祇想保留共產黨員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軍官成份則保留舊軍官或交給蔣介石指派的人去作軍官，而不是經過羣衆的革命的考驗由下而上地選拔出來，他不願意許多共產黨員去担任軍官的職位；另一方面，陳獨秀投降主義害怕以人民志願兵制度去根本改造舊軍閥軍隊的僱傭制度，特別是在革命高潮的時候，拒絕大刀闖斧地組織人民的武力，這樣，就使得蔣介石黨徒得以在一定的時候經過上層的反動軍官和利用僱傭制度，屠殺與驅逐革命的政治工作人員，把革命軍隊變爲反革命軍隊，用以絞殺人民的革命，而在蔣介石與汪精衛相繼叛變之後，從北伐軍中分化出來繼續爲革命戰鬥的革命隊伍，只有賀龍、葉挺的兩個部隊。其次，革命對於舊官僚制度，特別是對於下層官僚機構，沒有進行澈底的破壞，幾乎普遍還是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度」。但當時有真正羣衆運動的地方，差不多都有打破官僚制度的民主政權新組織形式的創造。毛澤東會說到湖南一些縣的政治狀況：「凡事取決於縣長與革命民衆團體的聯合會議。……有些縣名之曰「公法團聯席會」，有些縣名之曰「縣務會議」，列席的人，縣長以外，爲縣農民協會、縣總工會、縣商民協會、縣女界聯合會、縣教職員聯合會、及縣學生聯合會、國民黨縣黨部（按：指當時左派國民黨）的代表。在這樣的會議裏，各民衆團體的意見影響縣長，縣長總是「唯命是聽」。所以在湖南採用民主的委員制縣政治組織，是絲毫沒有問題的」。可是陳獨秀機會主義同樣地害怕把官僚制度打碎到底，拒絕普遍推進這種人民的民主權力，因而也就便利於蔣介石與汪精衛的反革命。帝國主義者與中國反動派當時是看出了革命這種根本的弱點的，並利用了這種革命的根本弱點，就是說，利用了革命內部還存在了的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作爲它們佈置「政治南伐」的政治地板，而革命也恰是因爲有這種根本弱點，就來不及大規模地去組織抵抗這種反革命的襲擊。蔣介石就踏在軍閥制度與官僚制度的政治地板上轉入反革命，並從事新的修補，在這個地板上，造

起蔣記的國民黨，造起蔣記的國民政府，從帝國主義那裏取得全國反革命的領袖地位，而繼續和人民作不斷的戰爭。

歷史轉入了十年的國內戰爭。

三 代替北洋軍閥而起的封建買辦新王朝

(一) 大洋行買辦與大封建奴隸主的法西斯統治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由於蔣介石汪精衛背信棄義地對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突然襲擊，「生氣勃勃的中國大革命就被葬送了。從此以後，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在十七年即一九二八年十月間，毛澤東對於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各階級間的情勢，作過以下明確的分析：

「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與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經濟的剝削與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從廣東出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買辦豪紳階級領導了去，立即跑向反革命路上，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

這裏是說：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所代表的政權，乃是買辦豪紳的政權，也即是大洋行買辦與大封建奴隸主的政權。蔣介石的反革命，乃是大資產階級的買辦性與封建性的必然走到的結果，而在他叛變之後，他就直接表現為公開的大買辦與大地主的代表人。大資產階級叛變以後的政權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政權，而是必然成爲大買辦與大封建地主反革命聯盟的政權。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右翼分子）附和了和參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但這既然是以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

爲基礎的反革命政變，把革命鎮壓之後，政權便落在大買辦與大地主的手裏，而不會落在自由資產階級的手裏。自由資產階級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權力，而在經濟上的發展却受到新的打擊。依時局的發展，自由資產階級，就逐步變成蔣介石政權的在野反對派，也有些自由資產階級分子在九一八後即轉到同情革命方面。

帝國主義者和中國一切黑暗的力量，需要蔣介石這個新統治。北洋軍閥的政權也是大買辦大地主反革命聯盟的政權，但是，這個原來代替那朽腐和被革命所瓦解的滿清朝廷而由袁世凱開山的北洋軍閥統治，自身也早已經表現得極端朽腐。經過人民革命的衝擊，北洋軍閥的統治力量已被瓦解了。帝國主義者與封建奴隸主需要建立另一個新朝代，另一個壓迫中國人民新的集中統治，以代替北洋軍閥的統治，而叛變革命的蔣介石和他的一羣，恰好是帝國主義者所認爲最適當的新統治人物，由蔣介石和他的走狗陳立夫果夫所控制的反革命的國民黨，也恰好被帝國主義者與封建奴隸主認爲最適當的新統治形式。

買辦、封建奴隸主、大銀行家、流氓匪徒、軍閥、黨棍、左右賣國的政客，……等等這類社會的寄生蟲與民族的罪人在蔣介石新統治下，都彼此彈冠相慶，雞犬升天，他們彼此混爲一體，並互爲轉變。生活在上海租界中那批無惡不作的流氓頭子，在北洋軍閥時代只依租界爲背景作幕後的政治活動，現在已公開登上蔣介石的政治舞台，成了蔣介石的「國家政治」與「國家財政」的「黨國要人」。這類社會的寄生蟲與民族的罪人，成爲蔣介石統治的社會基礎與社會支柱，並經蔣介石一雙血腥的手，在經濟上，用剝掠欺騙的方法，巧取豪奪，造成了以蔣介石和蔣介石的姻親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果夫四大家族爲代表的最集中的買辦的封建的財政家頭的財產制度，正如毛澤東所指出：他們的壟斷資本和他們的買辦封建的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爲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以蔣介石爲首的這四大家族成爲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富翁。在政治

上，則利用反革命的武裝與秘密特務，造成了以蔣介石為始人的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即赤裸裸的、最殘暴的、賣國反革命的恐怖主義，簡單的說，就是：蔣介石主義。

孫中山主義是在革命的活動中形成起來的，雖則他那裏有反映資產階級的反動方面，並且被蔣介石所充分利用，還加以發揮，但孫中山主義與蔣介石主義是兩種不同並且是相反的東西。蔣介石主義是在反革命的活動中形成起來的。蔣介石主義的先導和引線，是一九二五年戴季陶的兩本反革命小冊子（叫做『孫文主義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但戴季陶主義還只是蔣介石主義的先導和引線，而不就是代表全部蔣介石主義。蔣介石主義這一名稱，是與那四一二開始的赤裸裸的反革命的殘暴，與那赤裸裸的勾結帝國主義、保護封建土地制度、進行反革命的恐怖，結合為一的東西。蔣介石主義在中國出現，首先就是赤裸裸的勾結帝國主義、保護封建土地制度、進行流血反革命的恐怖主義。蔣介石主義是中國大洋行買辦與大封建奴隸主拿中國數百萬革命人民的屍首去堆疊而成的。孫中山主義是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而相反，蔣介石主義則是封建的與買辦的法西斯主義。

蔣介石主義和袁世凱主義有區別。袁世凱主義也是封建的買辦的反革命獨裁主義，但袁世凱的反革命是在以資產階級為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像前面所說，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軟弱無能與妥協性，以及農人大眾沒有得到廣大的發動，所以，袁世凱的反革命雖然狠毒和殘暴，但他運用了反革命的武裝、秘密特務以及『殘忍陰謀或機巧權術』，就很輕易地把辛亥革命鎮壓下去。袁世凱那時並沒有形成法西斯主義（在世界上也還沒有形成），沒有形成法西斯黨，他所建立的反人民的獨裁制度還是比較舊式的。蔣介石的反革命是在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在這個反革命面前，所遇到的，乃是一個堅強無比的人民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是一片浩浩蕩蕩的農民革命，因此，蔣介石的反革命獨裁主義就形成為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並

把所篡奪的國民黨變成由蔣介石與陳立夫果夫所控制的法西斯黨。這樣，蔣介石的統治，就已經不是滿清式的、而且也不是袁世凱式的大洋行買辦與大封建地主的舊式反革命獨裁統治，而是一種法西斯式的新式反革命獨裁統治。這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洋行買辦與封建奴隸主的新朝代的特點。

這個反革命新王朝所建築的統治機構，繼承了滿清皇朝與北洋軍閥的遺產，但除了軍閥的官僚的統治機構，還加上一種新的特務機構，這一切機構都由蔣介石的法西斯黨所控制，特務機構則由蔣介石法西斯黨特選的人員所組織，而這種特務組織則滲透在蔣家王朝上下的各種軍事的、行政的與教育的機構中，形成一個恐怖的監視網。大革命時代共產黨在軍隊中所建立的革命政治制度，蔣介石在反革命後就把它改變為反革命的特務制度。蔣介石從此經過了這一切統治機構，特別是經過了那帝國主義所逐步訓練起來的反革命武裝和特務組織，對人民進行了最野蠻的、幾乎為人類所不可設想的恐怖。

這個蔣介石主義的統治就使中國人民經歷了曠古未有的大災難。

(二) 天字第一號的內戰禍首

但是，帝國主義者和一切反動派的盤算，以為經過蔣介石之手，便可以消滅中國的革命，而任他們為所欲為，這種盤算是愚蠢的，是完全錯誤了。中國究竟是英雄主義的偉大民族。中國人民能夠打倒歷史上一切暴君，能够在歷史上亡而復興，能够打倒袁世凱和後來的北洋軍閥，便相信自已一定能够打倒蔣介石，推翻蔣介石主義，打敗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使中國獲得獨立自由與富強。偉大的毛澤東寫過這一段生氣勃勃的歷史：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他們高舉起革命的大旗，舉行了武裝的反抗，在中國廣大的區域內，組織了人民的政府，實行了土地的改革，創造了人民的軍隊——中國紅軍，保存了與發展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國民黨反動分子所拋棄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由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分子繼承下來了！」（「論聯合政府」）。

誰是這人民的英雄鬥爭的領袖呢？不是別人，正是寫出這些英雄辭句的毛澤東。

這個偉大的中國英雄，從來堅決認定農民革命乃是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壓迫的基礎。如上所述，在大革命中，毛澤東堅持這一個農民革命的方向；正當蔣介石與汪精衛謀叛而使革命處在危急關頭的時候，毛澤東便大聲號召必須放手發動農民革命，繼續革命的進攻，以挽救革命的危急。而因為陳獨秀機會主義沒有接受他的政策，結果使中國人民遭受了蔣介石與汪精衛這個反革命的痛苦。大革命失敗的時候，毛澤東領導了井崗山的進軍，以抵抗蔣介石的屠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打起土地革命的大旗，以建立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更深厚的社會基礎。毛澤東在大革命失敗時期，經過農民土地革命，把正確的革命退却與正確的革命進攻結合起來，大革命的失敗，固然使革命從大城市退却下來，但革命失掉了城市，却舉行了向農村的進攻，却進行了武裝的農村革命，從農村包圍了城市。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進攻的直接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以蔣介石為首的販賣革命的國民黨，反對封建地主階級，進攻的道路（是其內容，又是其形式）是土地革命，武裝鬥爭與建立革命根據地。所以，這個進攻，是比北伐戰爭時期進一步了。當蔣介石反革命的黑暗恐怖橫掃全國的時候，毛澤東和朱德引導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和革命工農兵，繼續了大革命時代的革命成果，向反革命下了這樣的攻擊令，鼓

奪了全民族的希望。這是極大膽的攻擊，又是極清醒的攻擊。這個攻擊，開始還是「星星之火」，但後來就發展為「燎原之火」了。

在四一二流血日，蔣介石既打起了長期內戰的旗子，並選擇了反人民的內戰為他的終身職業。但在革命營壘中一度混過一些日子的蔣介石，是曉得革命的厲害的。他受帝國主義的策動，而充當內戰的禍首，但要準備長期打下去，就必須從帝國主義那裏取得長期的支援。毛澤東時常說過：「中國軟弱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們沒有後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所以，反革命的蔣介石就急求鞏固他在帝國主義那裏的地位。在甯漢實行反革命合作之後，蔣介石一度下野，其中原因，當然也有反革命內部的矛盾，但那並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蔣介石對於革命的畏懼，想借這個機會親自到日本去，去和日本帝國主義結合聯盟，以便取得日本帝國主義更大的幫助，維持反革命。蔣介石以前派戴季陶到日本去，就是為的打開這條路，而在流血的反革命政變當中，也就得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別助力。現在蔣介石便親自出馬了，這個親自出馬求救的計劃，是代表蔣介石一種長遠的反革命內戰的計劃。在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月間，蔣介石到東京，宣稱中日聯合之必要。蔣介石住在日本侵略中國的大陰謀家——日本特務組織的大頭子——頭山滿家裏，這個中國的敵人——頭山滿很懂得蔣介石，他稱：「蔣氏無論如何是與日本一致的」。蔣介石還在那裏題了「親如一家」四個字，表示他對於日本的忠心。蔣介石在日本逗留了一些時日，回到上海，蔣家黨徒開會歡迎他，他宣稱是：返國與汪精衛合作。那時蔣介石為着政治的目的，和一個出色淫蕩與無恥的女人宋美齡結婚，同時又進了基督教，以便拉攏英美帝國主義的關係。這樣，蔣介石一方面進一步地勾結了日本帝國主義，又進一步地勾結了英美帝國主義，他又重新走馬回到南京上任，部署對人民的作戰。

但為着取得帝國主義對於他的反革命內戰的長期計劃的新信任，蔣介石上任之後，就在外交

上特地先給帝國主義辦兩件大事：第一，是關於前面所說的北伐軍攻下南京時的英美炮擊事件，帝國主義這次炮擊會使中國兩千多人命受了毀滅，財產所受的破壞則不計其數，但是，蔣家朝廷「外交」的結果，就是：接受帝國主義的意旨，叫做「懲辦兇首」，下令通緝領導北伐第六軍進攻南京的共產黨員林祖涵；向帝國主義賠款數十萬元（要知道，那時候的數十萬元便是大數目）；還竟然向帝國主義作了這樣的明文道歉：「茲因對於貴國國旗、政府代表等有不敬之處，不得不以極誠懇之態度，向貴國政府深示敬意」。不消說，這是很得帝國主義的歡心了。第二，是關於濟南慘案。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軍隊在濟南大肆殺戮我們的同胞，隨又開到大批軍隊，實行佔領。那時蔣家軍在濟南，蔣介石「向部下發出訓令，其訓令，要旨如下：（一）不與日軍搏爭，保護僑民，保為國家之故。在個人無論有如何事，亦須忍受。（二）對於日本人，絕對不開槍。（三）為救一日人，雖殺十人亦可。（四）若遇有事時，日本要求槍支，即以槍支與之，要求捕作俘虜時，即聽其捕作俘虜」（大家可以找當年五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查看一下蔣介石這一個訓令）。同時，蔣介石還打電報給上海的蔣家黨部：「切望民衆、持冷靜態度，勿作暴動及遊行等事，不可對日僑有虐待情事」。不消說，這更是很得日本帝國主義的歡心。蔣介石辦完這兩件事，望一望帝國主義所賜給他的顏色，他知道已從帝國主義那裏取得內戰的信任。蔣介石高興十足，得意忘形了。

蔣介石很想能够很快地向帝國主義報功，於是，這一條小蛇竟然妄想吞進大象，張了好大的口氣，叫做「三個月肅清」，「三個月」過去了，還是「三個月肅清」；「三個月」又過去了，仍然是「三個月肅清」。這時候反革命的蔣介石所遇到的直接革命敵手，已不是前些時候的機會主義的陳獨秀，而是智勇無雙的毛澤東了。蔣介石暴次所組織的反革命「會剿」或「圍剿」，一遇到毛澤東的鐵拳，便遭到粉碎的打擊。

當蔣介石舉次組織反革命的「會剿」或「圍剿」的時候，毛澤東所採取的人民戰爭的戰略，便放在蔣介石去像瘋狗亂竄一樣，他要竄到那裏就先讓他去竄，而後選擇一定的時間、地點以及各項條件，湧出革命大軍加以殲滅的打擊，而變成革命的新進攻。毛澤東把這個戰略叫做「誘敵深入」。毛澤東把一定時候所必需的戰略退却作爲反攻與進攻的一種形式。結果由毛澤東朱德領導下的中國紅軍，在蔣介石的不斷「圍剿」中，日益壯大起來了。蔣介石是帝國主義所批准的「剿共」總司令，但是實際作戰的過程中，蔣介石又成爲供給中國紅軍武器的輸送隊長。

蔣介石組織「剿共」戰爭之外，根據帝國主義的利益與蔣介石買辦封建寡頭獨裁的利益，還組織了反革命的統治階級相互間的反革命戰爭。十七年十月間，毛澤東作過以下預言：

「國民黨新軍閥蔣、桂、馮、閻四派在北京天津沒有打下以前，有一個對張作霖的臨時的團結。北京天津打下以後，這個團結立即解散，變爲四派內部激烈鬥爭的局面，蔣、桂兩派且在醞釀戰爭中，中國內部各派軍閥的矛盾鬥爭，反映着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與鬥爭，故無論如何不能妥協，所有的妥協都是暫時的。今天暫時的妥協即醞釀着明天更大的戰爭」。在這個科學預言後幾個月，即在十八年的二月間，蔣介石便發動了蔣桂的軍閥戰爭了。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昨日蔣介石還叫做「忠實同志」，今日蔣介石又叫做「黨國叛逆」，而實際上白崇禧之類的軍閥又都是化身的蔣介石。蔣介石作戰的名義叫做「統一」。在蔣、桂戰爭告一段落時候，五月一日，蔣介石聲明了：「和平統一爲「國民政府」惟一之政策」。按照蔣介石的看法，那漫山遍野屠殺人民的「剿共」戰爭，當然不叫做戰爭，那是叫做「和平」；至於國民黨的反革命內部呢？據蔣介石的字典，同樣地是：戰爭叫做「和平」，「和平」叫做戰爭。同月十三日，這個歷史上的大屠戶給馮玉祥的電報說：「弟雖無似，然自入黨以來，未曾賣友，亦未曾殺幾革命同志一人，平素行事俱在，可以覆按（按：這個吃人的野獸，在他自己口中，竟是美妙無

比的美人)。至若兄與弟，言公則兄爲革命元勳，言私則我輩誓共生死。且兄又居弟之長，弟若稍有不利於兄之舉，則人格破產，信用掃地」。這個電報的發出後十天（二十三日），什麼「開除黨籍」呀，「下令拿辦」呀，都接連地出來了。從此忽而蔣、馮的軍閥戰爭，忽而蔣、張（發奎）的軍閥戰爭，忽而蔣、唐（生智）的軍閥戰爭，忽而蔣、馮、閻的軍閥戰爭，忽而蔣、石（友三）的軍閥戰爭，蔣介石在一個地方打，就跟另一個地方的軍閥來個「同志」長「同志」短或者「你兄我弟」。官職的升沉，都看蔣介石的打或拉的需要，而「陸海空軍副司令」的名義就看看情況，忽而送給這個，忽而送給那個。各帝國主義則操縱在反革命戰爭各方面之間，供給財政、軍械和顧問。蔣介石爲着避免山東落入異己之手，還特別和日本帝國主義打交道，要求日本帝國主義暫緩撤兵。所有這些，都極盡波譎雲詭、「撲朔迷離」的大觀，而十九年蔣、閻、馮的中原戰爭，「經時七月，死壯丁三十萬，傷不計，財產損失稱是」。照蔣介石看來，這當然也還不算戰爭，而是「唯一的和平政策」。從蔣、桂戰爭到蔣、閻戰爭的兩年中，蔣介石本來是拉着胡漢民的，但蔣、閻戰爭剛完，胡漢民即被蔣介石監禁，這樣，在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春又形成兩個反革命的小朝廷，即南京的蔣家朝廷與廣東的以汪精衛、孫科爲首的反蔣家朝廷，而各向帝國主義爭寵。

曾經有人計算過：北洋軍閥從民元到民十七年共有十一次內戰，平均每年不到一次，時間總計爲八百八十五日。但蔣介石就不同了。蔣介石一方面進行反革命反人民的反共戰爭，一方面又在反革命內部進行排除異己的戰爭，直到西安事變爲止，首尾十年，不但是沒有間斷過一天，而且時常在同一時期內在幾個戰場舉行了幾個戰爭。這是歷史上最殘暴的好戰的軍閥，袁世凱及其他北洋軍閥是無論如何都比不上的。蔣家軍所到地方，特別是對於革命區域，焚掠殺戮，無惡不作，而全國人民因遭受蔣介石內戰的痛苦和各種摧殘，也完全超過了過去所有暴君的朝代。

北洋軍閥政府軍務費的支出佔軍務費與政務費的總支出中，最高的年份到百分之七十，而蔣家朝廷則通常是百分之九十左右。單拿壓在農民身上的田賦附加來說，在蔣家王朝直接統治的地方，例如江蘇許多地方的附加稅到民國二十二年已超過正稅十餘倍到二十六倍，湖南則超過十倍到三十倍。北洋軍閥統治十五年所發內債不過六萬萬元，而蔣介石統治的九年間（到民國二十五年）已達二十二萬萬餘元。而這種內債，主要的，在實際上又都壓在農民身上。由於蔣家反革命朝廷與蔣家軍的蹂躪與層層掠奪，中國農業日益萎縮。荒地面積在民國十一年為八萬萬九千餘畝，而在民十九年便已達到十一萬萬七千餘畝了。上述這些都還是十年內戰初期的材料，而人民的災難是與蔣家王朝的統治年月俱進的。另一方面，以蔣介石為首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却大發了內戰財，四大家族經過發內債，借外債，發鈔票，以及各種苛捐雜稅的橫征暴斂，就在內戰中，步步集中了全國的財富了。

至於在十年內戰中，蔣介石所殺的中國人民，是很難統計的了。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一年）美國出版一本關於中國反革命恐怖的小冊子有以下的敘述：

「近年中犧牲了的革命者的實數或將永遠不會查出的了吧。是互有出入的，但可以斷定說，直接的被害者最少在一百萬以上。其中包括農村中的屠村，城市中的大批正法，以及城市中的日常捕殺。從一本中文的小冊子「中國工人運動概況」的摘引中，可以得出些恐怖的範圍的一般概念來。其中說：

「單單從一九二八年一月到八月，就有最少十萬的工人和農民在恐怖下被殺了。其中的二萬七千六百九十九人是正式判決了死刑。現在有一萬七千一百工人在牢獄中」。

中國紅色救濟會，它的任務是蒐集關於逮捕、監禁及因此引起死亡的材料，並且援助死者之家屬。在一九三〇年會印行報告，其中說：

「在所謂軍事時期結束（一九二八）（按：此句意義不明）至一九二九年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時間內，約有四十五萬人被殺。其中包括工農羣衆及共產黨員（按：著名的彭湃就是在這時期被殺的）。一九三〇年過去的六個月中犧牲的革命戰士達到十四萬的數字。一個上海日報會說道：『若是像一九三〇年八月至十月的情形繼續下去的話，中國任何問題都可得到解決，因爲在這三個月中就殺了十四萬共產黨員，加上戰場上死了三十五萬士兵，同時災區中有四十五萬人餓斃』。

據紅色救濟會關於恐怖中監禁殺戮近四月的詳細統計：最高是湖南，其次是江西安徽湖北江蘇及廣東，共計九月份四六七二人；十月份六三四九人；十一月份六二四一人；十二月份三七六二八人。

一九三一年的大連日本雜誌『滿蒙事務』從中國各省的大城市給了一個很表面的統計，計有三八七七八人被殺，四六七〇人判決監禁。

同樣地，這裏列舉的，也都是十年內戰初期的材料。嗜殺成性的蔣介石並不以這些屠殺的數字爲滿足。蔣介石的方針是繼續擴大反革命的恐怖規模與反革命的內戰規模。

（三）特務哲學的闡發與法西斯主義的制禮作樂

爲着配合他繼續擴大反革命的恐怖規模與反革命的內戰規模，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民二十年）春天，對於蔣記的法西斯制度與法西斯『理論』，有了重要的發揮。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蔣介石發表了一個他畢生『學力』所集中的『哲學』，叫做『處世與作人的要道』，或者更按照蔣介石所說，是他『自己腦中所有的』『最基本最緊要的道理』，

而「不是書本上可以找得出的」。他發表這個「哲學」是在「南京軍校特別訓練班」，蔣介石和這個訓練班的關係，據蔣介石自己在另一個演講裏所說：「其實我從開辦黃埔直到現在，從沒有這樣組織過一次。我自己對宣傳員一個一個的點名，又在你們當中挑選一班分隊長出來，更是從來沒有的事」。既然這樣，所以蔣介石才拚出「自己腦中所有的東西」，傳授心法。那末，蔣介石這個具體的哲學精華是什麼呢？請聽蔣介石對他的黨徒所說：

「……你們此次出去要切實的記住我所講的話。如果你們都能冒險，自己去做偵探，偵察敵情，給「共匪」（按：滿清朝廷稱呼孫中山為「匪首」，袁世凱也稱呼孫中山為匪首，所有反革命的大盜，沒有不把革命叫做「匪」，蔣介石把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黨——共產黨，叫做「共匪」，其實不過撫拾滿清朝廷和袁世凱的唾餘，並不算什麼「發明」）拿去做俘虜，我們成功的好機會便到了！你就可以進到「共匪」區域內對「匪部」士兵做宣傳工作，你做了俘虜之後，更要想法子回來，設法去騙「共匪」，告訴他們說，回去探聽完畢，再來報告軍情，甚至還可以裝着說要替他們運動軍隊。只要你們能够隨機應變，到裏面一定可以有法子出來的。我們到裏面有機會還可以運動「共匪」的軍隊，或者想法子拿他們的手槍打他們的官長，謀殺他們的主要人物。我們要是精幹一些，他們高興或者相信我們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走到他們司令部裏去辦事情，不久總可收到很大的成效。當我們軍隊打到那邊，你們就可以出來報告一切情形，帶引道路，這樣工作，其效力比什麼都大些。有許多願意到敵裏去的人，苦於沒有法子，我們祇有讓敵人俘虜去。我們願意做俘虜，然後才可以想種種的方法；他們不會謀害我們，一定要我們在那邊當兵，或者做事。如果我們能在那裏當兵做事，這是多末好的一個機會！一待機會到來，便隨時可以給他們一個打擊，或者中途倒戈而致他們的死命！我希望你們到軍隊中去，一個人便要得一百人的效果，必須這樣，

你們才算有價值！如果你們有了決心，能够冒險，縱使你們給敵人俘虜了去，也有許多方法可以使得你們建功立業的。……我們爲達到消滅敵人的目的，不妨仿照這個辦法去做，續進「共匪」裏頭去！你們要鎮定進行黨所給予你們的使命和責任！你們只有盡自己的責任，盡革命的使命，才不愧爲這次派出去的學生，才不愧爲總理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蔣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蔣介石講「政訓與宣傳工作之精義」一三頁）

聽吧，蔣介石所說的「處世與做人的要道」，所說的「處世接物的學問是最要緊最基本的學問」，便是這個特務的學問。他說：這是他「自己口授的經驗之談和做人辦事的方法」。他在演講中從頭到尾這末反覆了好幾遍：「很希望你們記住」，「你們要格外記住」，「我願意把自己腦筋中所有的東西交給你們，希望你們切切實實的接受，熱心去做事」。按照蔣介石，所謂「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就是要化裝兩面派，打進到革命隊伍裏面去。蔣介石所謂「成功的好機會」，便是當特務偵探的越多越好，偷竊的本領越大越好，欺騙的本領越大越好，謀殺的本領越大越好。據他所說，所以能達到這類目的，就是必要利用共產黨的老實和仁慈（叫做「他們不會謀害我們」），而後用謀殺和「致他們的死命」去報答共產黨的老實和仁慈。這當然就是蔣介石平日所說的「誠」的哲學的真諦，又當然就是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所說的「國民黨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義，與責任義務，爲組織的精神，他絕對不像其他黨派，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而以利害自私爲結合的本能」一套話的真註解！蔣介石說這是他的「經驗之談」，這是不錯的。大家回憶一下上述蔣介石的歷史吧！他不就是要弄兩面派的特務手腕，「隨機應變」，鑽進革命的隊伍裏面，而且「走到司令部裏去辦事情」，結果就運動出革命的軍隊變爲反革命的軍隊，「拿他們的手槍打他們的官長，謀殺他們的主要人物」嗎？他不就是鑽進革命隊伍裏面，「一待機會到來，便給他們一個打擊（按：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或者中途倒

戈而致他們的死命（按：這就是四月十二日的清黨大流血）嗎？根據蔣介石現在這些話，再覆按大革命時代蔣介石的行動，他那一套「機巧權術和殘忍陰謀」，從開始時便是在「革命」的假面具之下有計劃的經營，那還不是明明白白的嗎？以前，蔣介石還獨自保守他這一套秘訣，在十八年十一月，蔣介石並且特別建立了陳立夫CC系的特務組織，但那時蔣介石在他的黨徒中間，也還不大公開講他這一套秘訣。到這時候，蔣介石的罪惡統治正不斷地遇到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的人民軍隊的打擊，蔣家軍被俘虜的很多，於是蔣介石急了，迫得出來特別對一批蔣家黨徒傳授這一套特務的心法。蔣介石說：「這不是書本上可以找得出的」，這也是不錯的，因為過去統治階級包括袁世凱在內，都還沒有蔣介石這一套「完全的學問」；但自從蔣介石對他的黨徒發表這篇演說之後，「書本」上（即在蔣記的法西斯主義書本上）就可以找到了。自從書本上出現了這個大特務頭子——蔣介石的特務哲學以後，就更有不少青年落入蔣介石及其法西斯匪幫的圈套，被強迫違背自己良心當了特務，鑽進共產黨及其他社會各界，以至鑽進自由資產階級的各種經濟與文化的事業內部，作出各種傷天害理、有害於中國人民、中國民族的罪惡。

在蔣介石發表這個特務哲學之前，即一月三十一日，蔣介石匪幫王明公布了所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這是蔣介石的法西斯主義「制禮作樂」的第一部曲。這個中華民國的大叛逆，發揮了袁世凱的筆法，把一切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運動和革命家，把一切為民主主義而奮鬥的戰士，都按上一個「罪名」，叫做「危害民國」。但袁世凱還沒有「緊急治罪」這一法，也還沒有連坐這一法，現在這些都由後來居上的蔣介石「創制」出來了。按照這個民國大叛逆所「創制」的這個「危害民國治罪法」主要條文的實際內容，如要翻譯為最明白的文字，就是：「凡從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運動者，處死刑；凡與反帝反封建運動有聯繫或以文字圖畫或演說作宣傳的，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凡接受上述文字圖畫或演說並告訴別人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緝

織自由文化團體或集會宣傳反法西斯主義的自由思想的，處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是蔣介石對於人民自由的瘋狂絞殺法，是把「四一二」以來蔣家黨徒一切罪大惡極的血腥事業，在「法律」形式上加以肯定，並進一步地發揮了。在這個血腥的恐怖法公布之後，蔣介石，恐怖的法西斯暴君，就繼續地吞噬了蔣管區無量數的自由戰士。革命的政論家與戰士譚代英、蔡和森、鄧中夏，以及偉大文豪魯迅所痛悼的柔石、白莽等青年文藝作家，就是在這「危害民國治罪法」發布的時候被蔣介石拿去供作犧牲的。

在蔣介石發表特務哲學之後，五月五日，蔣介石又召集了一個所謂「國民會議」，這是蔣介石法西斯主義「制禮作樂」的第二部曲。這個會議的所謂「國民代表」，都是蔣介石委派的「代表」。那裏不但沒有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的農民與工人的代表，而且也沒有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甚至連國民黨內的蔣介石反對派都沒有參加。所謂「國民會議」，即蔣介石代表的會議，因為這些「代表」者，除了能够代表蔣介石以外，並不代表任何國民。在蔣介石的字典中，「國民」即是蔣介石，蔣介石即是「國民」，而他所召集的「國民會議」，只是蔣介石和蔣介石的代表共同開一個會，由蔣介石和他自己的代表彼此唱和一番，別的就沒有什麼稀奇了。蔣介石對自己所委派而只代表蔣介石自己的代表，所唱的就是以下公開的法西斯政治「理論」的調子：

「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本超象主義之精神，依國家機體學說為根據，以工團組織為運用，認定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為民族生命之懸延，非以目前福利為準則，統治權乃與社會並存，而無後先，操之者即係進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

「……所以致民治之道，則必經過訓政之階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國家危難，領導素無經驗

之民族，是非藉經過較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使不可」（蔣介石：「國民會議開會詞」，「國民會議特刊」二集）。

蔣介石所謂「國家」是什麼？正如毛澤東所指出，那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封建法西斯獨裁國家」，而並不是中國人民的國家。按照蔣介石：法西斯獨裁叫做「進化」，並且是「進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蔣介石說得很妙：他說他的「致民治之道」，必須經過法西斯「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使」，而且蔣介石還鄭重地說，「是非經過不可」。就是說，他的「民治」就是從他的法西斯「最有效能的統治權」出發，就是以他的法西斯「最有效能的統治權」做基礎的。蔣介石所說的「民治」就是他的法西斯獨裁的註解。

蔣介石唱的調子既是「今日舉國所要求者為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使」，於是，蔣介石的代表們也「和」出來了，「和」出來的就是一部法西斯獨裁的「訓政時期約法」，也即蔣介石的法西斯「國家組織法」。從此，據說，蔣介石的統治也就有所謂「法統」的根據了。

蔣介石這一切法西斯主義的「制禮作樂」，配合了他的瘋狂內戰，八月二十二日，他在南昌對於他的願望和目的，做了一個簡單的概括：「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話的後半截，意思很明白，蔣介石甯願使中國亡於帝國主義，並且要中國人準備當亡國奴。話的後半截，應該加以分析：所謂「若亡於共產黨」，實際上就是說，如果共產黨領導了中國。如果共產黨領導了中國，情況是什麼？那就是：中國就得救了，中國人就能夠避免當亡國奴的命運；但的確有滅亡的，就制度來說，那就是殖民地的或半殖民地的、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奴隸制度，就階級來說，那就是封建地主階級與買辦官僚大資產階級，而國外的敵人便是帝國主義者。這些是蔣介石法西斯主義的基礎。所以，這個「亡」，就只有蔣介石、四大家族，和他的同階級的人，即在全民族中只是極少的一小撮人，是

會啼泣的；但歡呼的，却是中國全體人民。蔣介石所謂「縱肯爲奴隸亦不可得」的話也是不錯的，因爲中國既然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從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地主階級與買辦階級都消滅了，那裏會再有奴隸呢？封建的與買辦的奴隸制度既然沒有了，當然也就「縱肯爲奴隸亦不可得」了。但蔣介石却必須爲保護外國的與本國的奴隸制度而奮鬥。總之，蔣介石法西斯「統治權」的「效能」，第一是求得當亡國奴，第二是對着那實行消滅外國的與本國的奴隸制度的中國共產黨，繼續進行殘酷的血腥的鬥爭，而這兩件事，實際上就是一件事。

(四) 賣國史上的大創作——不抵抗主義

蔣介石甯願當亡國奴的話，還說出不過十天工夫，蔣介石「最有效果的統治權」真正出現「效能」了。九月六日，日寇在東北藉口所謂「中村失蹤事件」，搦搦備戰，但十一日，蔣家朝廷的「效能」，是通令東北軍：「遇有日軍尋覓，務須慎重避免衝突」。十八日（即「九一八」），日軍炮轟北大營，蔣家朝廷的「效能」，是同電東北軍：「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覓性質，爲免事件擴大，絕對不抵抗」。二十三日，蔣家朝廷的「效能」，就是發表「告全國軍民書」，說：東北事件，已「訴諸國際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語誠，務須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蔣介石統治權確實比袁世凱和滿清朝廷都更有效能，而且簡直完全不可比擬；沒有五天工夫，就失掉遼寧吉林兩省，又不久，黑龍江也失掉了。這是袁世凱所望塵莫及的，滿清朝廷也望塵莫及。當日寇進攻錦州的時候，蔣家朝廷外交部的「效能」竟無恥地向國聯提議對錦州爲「中立區」。

但是，中國人民並不理會蔣介石關於「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尙可有延續



喘」的教條，中國人民衝破了蔣介石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和蔣介石的法西斯「訓政約法」的羅網，中國人民怒吼了。和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勇敢完全相反，中國人民表現了抵抗的偉大勇敢，九一八之後，全國各地民衆就相繼起來舉行反日的大示威，上海工人並舉行了反日的大罷工，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紅軍號召全國武裝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並組織東北游擊戰爭，直接予日帝國主義以打擊」（見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宣言）。十月間，各地學生集合到了南京。有一天，蔣介石被迫出見學生。蔣介石的機關槍步槍並不在日寇面前保衛中國的國土，但却在愛國學生面前保衛蔣介石——保衛這個反民族反人民的獨夫。蔣介石就在這重重的保衛之下開了口：「現在政府正在積極準備抵抗日本，如果三年以後，失地不能恢復，當殺我蔣中正的頭，以謝天下」。在十七年多天，蔣介石對反日會說過：「三年之後，若外兵尚未撤退，不平等條約尚未廢除，請殺我以謝國人」。話到九一八，恰恰近三年，日本兵來得更更多了，可是蔣介石並不肯把他的頭交出，而是在這三年中間，有無數的革命人民，繼續在蔣介石「最有效能的統治權」之下，被蔣介石砍去了腦袋。問題就在這裏：一方面是蔣介石的頭繼續存在，另一方面是蔣介石繼續砍伐革命人民的頭，所以日寇才有狗胆子竄進中國來。現在蔣介石又在反日的人民面前，把他三年前的話重複一遍，這是說什麼呢？這是說，他準備失掉更多的國土，準備殺更多的中國革命人民的頭，去保衛他那蔣中正的頭。在他說這話的第二天，他又被迫地出來見學生，學生們堅決表示：「不答應出兵抗日，誓死不離開國民政府」。蔣介石眼看着了不了台，一口氣就答應說：「三天之內，我就下令出兵」。學生們要他把這個諾言寫親筆字以便帶到上海，他就藉口回辦公室寫信，趁機溜掉，接着蔣介石的「效能」就又公開出來了，蔣介石的武裝憲兵拿着槍和刺刀驅逐請願的學生了。

過兩個月的光景，就是說，不但過了「三天」，而且過了兩個三十天，祖國的危險情勢更

急，各地學生們還沒有看見蔣介石「下令出兵」，於是，在南京又出現了三萬多人的請願與示威，這時蔣介石的「效能」——全副武裝的憲兵就又出現在學生羣衆的面前，憲兵隊後面傳來一陣殺氣騰騰的衝鋒鎗的響聲，接着槍響了，刺刀衝過來了，前排的學生許多便倒在血泊裏面了！十幾分鐘時間，死的愛國學生有三十多人，受傷的百餘人，還有幾個被活活地捉去拋到河裏淹死了！學生們愛國的熱血灑紅了珍珠橋，染紅了珍珠橋下的流水！愛國的同胞們記着！這又一個血日！這血日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在這一日，蔣介石下令在南京珍珠橋畔槍殺要求抗日的學生！

九一八之後，蔣介石曾經在南京一次集會上，以「岳武穆」自居，宣稱即北上到最前線去和敵人作殊死戰，當時在座全體起立，向他致敬，還有許多民衆準備歡送這個所謂「岳武穆」者到東北去「殺敵救國」。可是，蔣介石的「最前線」是在那裏呢？蔣介石的「最前線」，依然是四一二大流血以來蔣介石的最前線，他所指的，乃是南昌，廬山，漢口，岳陽，或者是奉化，而絕不是東北，蔣介石所要殺的人，並不是日寇，而是抗日的人民，而是爲解放而鬥爭的被壓迫勞苦羣衆。

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上海的一二八戰爭爆發。當天，蔣介石會下令要十九路軍從淞滬撤退，但是，日寇的進攻，迫得十九路軍起而抗戰，全國人民熱烈援助。可是蔣介石不但不派兵增援，而將記海軍且與日寇海軍「維持友誼」。據高友唐所說：

「當滬事發生之始，該部長陳紹寬密令各艦隊，略謂：准日軍海軍司令來函：「此次行動，並非交戰，如中國海軍不攻擊日艦，日艦也不攻擊中國軍艦，以維持友誼」等情，凡我艦隊，應守鎮靜云云。厥後日海軍在下關開炮，該艦隊司令公然秉承部長意旨，下緊急命令各艦隊云：日海軍炮擊獅子山炮台及京市，與我海軍無干。非日軍艦擊我艦，不准還擊

語。同時上海高昌廟艦隊，亦奉到上項命令。……十九路軍會同海部借大炮，借鐵板，均被拒絕。日軍運輸艦擱淺於白龍港三日之久，我海軍如當時前往轟擊，必可捕獲多數軍火。陳紹寬接得報告，置之不理。所謂維持友誼者如此！以上各節皆極駭人聽聞，由該部次長李世甲事先與薩澤祕密斡旋接洽。當十九路軍血戰時，李世甲竟與日軍司令野村，同坐汽車參觀各處戰壕，萬目睽睽，毫無忌憚」（見『監察公報』第十五期）。

爲什麼陳紹寬李世甲胆敢這樣『毫無忌憚』呢？因爲有上司的命令。陳李的上司是誰？不是別人，正是蔣介石！

日寇陸續增援上海，達數萬人。正當十九路軍抵抗到最緊急關頭的時候，上海報上載出宋子文的談話：『政府會議時，蔣介石何應欽同云：目前戰線甚短，僅以一團兵力足矣，十九路軍有三師共十六團，無須援兵，盡可支持，並決定無須援助。各軍將士未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動作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在蔣介石這個『戰略』方針之下，很快地達到了日寇的目的，日寇佔領了淞滬。於是，蔣介石和汪精衛就共同創作了出賣淞滬的『上海停戰協定』。

（五）蔣介石繼續向內殺進去，日寇繼續從外打進來

蔣介石在人民的抗日運動面前，更加害怕人民革他的命。這時社會階級關係已顯出很大的新變化，不但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更加積極地起來反對蔣介石的統治，而且自由資產階級和他的矛盾也更加肯定與表面化起來。有些自由資產階級的報紙和刊物已公開主張變更『剿共』的政策。日、英、美、法各帝國主義間在中國的新矛盾，又更加影響到蔣介石和國民黨內其他派別的分裂。蔣介石更加孤立了。但正是因爲他更加孤立，又要向日寇報效，這個血腥劊子手就更加強

他的屠殺人民的瘋狂。

蔣介石與汪精衛「同謀」，簽訂上海停戰協定之後，於五月底即匆忙到漢口，就任由他自己所委派的鄂豫皖剿共總司令，去進行「圍剿」那與日寇不共戴天的中國人民紅軍，屠殺那造成抗日最廣大基礎的土地革命。蔣汪的口號叫做「攘外必先安內」。按照魯迅的分析，這個口號的實際內容，就是「安內而不必攘外」，「意外以安內」，「外就是內，本無可攘」這三種。這個罪惡滔天的內戰劊子手，孫中山的大叛徒，發表「告將士書」，說：「中正行將出發鄂贛，督率各軍圍剿『赤匪』（按：讀爲愛國愛民、絕頂革命的人民武力）……必能於最短期間，清除『匪』禍，奠安民族，幸而完成此素願，當決解甲歸田，表我心跡。試把蔣介石這個『剿共』文告比一比那民國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袁世凱討伐孫中山的『討伐令』吧，袁世凱那裏是這樣寫的：『……斷不忍五千年神明古國，顛覆自我，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許謀覆國家之凶徒以自恣，冀與邦人謀友，含辛茹苦，冒險犯難，奠此國基，他日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觀治化，庶遂初志』。蔣介石的口氣和袁世凱簡直一樣。但那時袁世凱究竟比較有些信心，而這時蔣介石却不同了，他遇到的是如日方升的真正強大的人民力量，他帶着悲號的調子，接着又說：『不能成功，誓當成仁』。他覺得他也可能『因此捨命疆場』，死在這內戰之中，可是他『預留之遺囑』，並不以爲他『死就夠了』，還要他的『袍澤』有始終認定『他所指的這個反革命內戰的黑暗道路是惟一的』「光明大路」，要他的『袍澤』一致跟着他去送死。遵從日本人的意旨，十九路軍也由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在五月二十三日下令調到內戰的前線了。

蔣介石降漢口總司令部，按照蔣介石的「素願」，並集合了反共內戰以來蔣介石做過的「經驗」，於同年（即一九三二年）九月間下了一道命令：

「匪」共爲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按：讀爲人民革命

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區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運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燬。須用快刀斬亂麻手段，否則剿滅難期，徒勞佈置」。

蔣介石除了招納親日反動的政學系政客楊永泰之類參預反共的機密之外，德國反動派軍官在蔣介石的幕府，實際上直接主持這反革命的「剿共」戰爭的事宜。一個住華的德國人關於當時蔣軍的情形寫道：

「每個人都嚴格的依照德國軍官、那軍官「顧問」的訓練，馴順的受了訓諭。有三十個德國神聖共和國軍官，他們和保爾上校一同過來，而且取得了蔣介石的信賴。最初，協約國害怕德國人給他們同國的實業家訂立過多的軍事合同。但這個到底有沒有發生，目前在列強看來，並不怎樣的重要，因為德國人指揮中國軍隊的裝備和訓練，是不能夠失掉國際帝國主義的歡心的」(基希：「祕密的中國」)。

蔣賊的所以敢那樣的窮兇極惡，當然就是因為不但有外國反動派的援助，並且還有外國反動派在他那裏直接指揮。否則，蔣介石的統治早就經不起人民拳頭的幾回打擊了。蔣介石對人民的殘酷，就是東方中世紀的野蠻加上西方近代法西斯的野蠻，而自四一二以來，蔣介石依賴外國反動派的指揮，差不多就在每一時期都有野蠻加上野蠻的「新發明」出來。

蔣介石這末繼續向內殺進去，日寇也就又從外打進來。正當蔣介石對於人民革命的區域實行殺光、燒光、吃光的三光政策而與高朵烈的時候，日寇特別感謝蔣介石的努力，也「不甘寂寞」，於二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攻陷了我們的「天下第一關」——山海關。毛澤東和朱德於同月十七日發出宣言，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軍隊共同抗日：一、立即停止進攻；二、立即保證民衆的民主權利；三、立即武裝民衆，創立武裝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可是，蔣介石不但在一年前甯願日寇佔領東三省，而且現在又甯願日寇佔領熱

河，侵入神聖的長城，而以繼續「圍剿」回答毛澤東朱德的宣言。正當日寇兵臨北京城下的時候，四月七日，蔣介石在江西撫州講話：

「國家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讀爲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所以我降然是到北方去了，却一刻也不會忘記江西的「匪」患，更不會忘記五十二、五十九兩師失敗的慘痛」。

「我們革命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東三省熱河失掉了，自然在魏稱統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們應該要負責任，不過我們站在「革命」（讀爲反革命）的立場說，却沒有多大關係。這回日本佔領東三省熱河，「革命黨」（讀爲反革命黨）是不能負責的，失掉了對於「革命」（讀爲反革命）是無所損失的。如果在這個時候，只有好高騖遠來言抗日，而不能實事求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是失了我們「革命軍人」（讀爲反革命軍人）之本色了」。

蔣介石把自己的賣國賊兇相，說的赤裸裸，完全不須要解釋。蔣介石最後的警告，就接着來了，叫做「侈言抗日者殺無赦」。這就是他在上面那篇講話後三天，四月十日，在南昌國民黨黨部對蔣家軍各將領的又一個講話：

「中正來贛督剿，實本有「匪」無我，有我無「匪」（按：即有人民的解放便沒有蔣介石，有蔣介石便沒有人民的解放）之決心，凡我剿「匪」將領嗣後若再以北上抗日請命，而無決心剿「匪」者，當視爲貪生怕死之輩，立斬無赦」。

蔣介石這一大套「理論」，很快地，變成「塘沽協定」的實際。這個蔣汪同謀的「協定」事實上承認了日寇佔領東三省熱河（因爲蔣介石已說過了，這對於他的「革命」無所損失的），並承認冀東爲「非武裝區」，使華北放置在日軍監視控制之下。蔣家將何應欽公然下令解散義勇

軍了。張家口的抗日同盟軍被蔣汪共稱爲「妨害中央統一政令」，並受了「圍剿」的處分。接着不久，本來在上海抗日有功的十九路軍，在福建也遭受了蔣介石的殲滅。

接着塘沽協定，蔣介石去年所頒佈的「剿共」三光政策中所提出的「快刀斬亂麻」，又發揮起來了。這個大劊子手最有興味的事，本來就是拿帝國主義所供給的「快刀」，繼續斬殺民族的有生力量。他說：

「大家要拿快刀斬亂麻的辦法，用快刀斬亂麻的人才來做事！……大家要曉得：我們當前「革命」（讀爲反革命）的事業，就是要勇敢進取（按：蔣介石屠殺人民是很勇敢的，大家早就知道了），快刀斬亂麻！所以你們既是我的部下，要做「革命」（讀爲反革命）軍人，就要有快刀斬亂麻的精神和能力！我們做上官的人一定要做快刀斬亂麻的上官，做部下的一定要快刀斬亂麻的部下！我就是一個快刀斬亂麻的統帥，現在要找的將領，就是要找一般快刀斬亂麻的將領！」（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在「高級將領會議」講話）

看這個殺人如麻的大劊子手，很熟練地一口氣就噙了這末多的「快刀斬亂麻」！蔣介石屠殺人民總是這末絕頂「勇敢」的。

（六）法西斯主義的新狂熱

九一八以後，蔣介石一方面更加緊進行反共的戰爭，一方面又更加緊進行法西斯恐怖的组织。除了原來陳家CC系法西斯特務組織之外，這時候他以原來孫文主義學會的一些重要嘍囉爲基幹，重新成立又一個新的法西斯組織——復興社。這兩個恐怖的法西斯特務組織包括有在社會上最墮落的狠心與無恥的各種分子：漢奸、敵探、托洛茨基派、無賴痞子，「文化」流氓，總

之，各種下流的民族毒蟲，社會垃圾，都盡量搜羅在裏面。他們的口號，叫做「借法西斯之魂，還國民黨之屍」，在蔣管區各種角落，建立秘密的悲慘地獄，以求鎮壓抗日的愛國運動。這時候，蔣介石經過他的駐意公使劉文島（現在國民黨的中央監察委員）做交通，那個日本軍閥的助手——法西斯的老祖宗墨沙里尼便更加成爲他的密友，來來往往，沒有間斷，蔣介石並派了很多黨徒到意大利去留學。

當希特勒在德國登台的時候，蔣介石和他的黨徒一時興高彩烈，完全像發瘋一樣，妄想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必將從此完結，妄想蘇聯也將因此不能存在，妄想世界將全是法西斯的天下。他們加緊販賣法西斯的貨品到蔣管區，關於法西斯主義的翻譯和寫作，一本又一本。蔣介石黨徒把蔣介石和希特勒、墨沙里尼並列爲三。現任蔣介石匪幫的「國防」部新聞局長鄧文儀所寫的「領袖言行」中，曾這末寫道：「或曰領袖（即蔣介石）與墨沙里尼、希特勒相埒，同爲世界之偉大人物，然希氏統治下的德國，……自然易於統治，慕氏統治下的意大利，亦和德國相似，……我領袖……豐功偉烈，實非希慕二氏所可比擬者」。就一方面說，蔣介石的這個死狗所說的話，是有一定根據的：希特勒和墨沙里尼固然同是殺人的混世魔王，但講起在國內殺人的數目，與其殺人方法的兇酷殘暴，這一切法西斯的「豐功偉烈」，墨沙里尼是在蔣介石之前，希特勒是在蔣介石之後，都是比不上蔣介石的。可是從另一方面說來，希慕的法西斯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法西斯主義，以侵略別的國家滅亡別的民族作爲出路，而蔣介石的法西斯主義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買辦封建的法西斯主義，以出賣國家民族作爲出路，因此，蔣介石却只是當了希特勒和墨沙里尼的走狗。

蔣介石是把希特勒當成「天神」看待的，他過去派了許多黨徒到墨沙里尼那裏留學還不夠，現在又繼續派遣大批黨徒到希特勒那裏留學，把他的兒子蔣緯國也送去了，比起對墨沙里尼還更

爲孝順。這時候，蔣賊的幕府，除了著名的塞克特等反動軍官之外，還來了德國的警察所長給蔣介石匪幫傳授特務方法。因爲蔣介石對希特勒是那末服順，難怪當蔣介石五十生日的時候，第一個打電報傳令嘉獎的，就是希特勒。但同這時候，慕沙里尼當然也這一樣關照蔣介石，他甚至連蔣介石的生活都關心上了，特別送了一架大飛機，供給蔣介石乘坐。

在德意的法西斯黨徒指揮下，蔣賊竭力加強他們在蔣管區的恐怖統治機器，一方面是上述的CC與復興兩大秘密特務組織，另一方面又在這兩大秘密特務組織的控制之下，建立了蔣家王朝的新的保甲長制度（湖北各地對於蔣賊的新保甲制度，流行了一個歌謠：「保甲，保甲，人人披鎖又帶枷；保長去拿鎖，縣長去掌杷（印柄也）」），而對於蔣管區人民和抗日愛國運動，進行嚴密的監管與獵殺。這是蔣介石把法西斯主義深入到社會下層去的重要步調。在那時候，蔣介石又頒佈了「剿匪區由各路總司令處理地方黨政事務暫行條例」，更加明文規定把一切權力集中到軍事的法西斯獨裁。在蔣介石的全部統治機器中，一個監視一個，一層監視一層，一個組織監視一個組織，一個部門監視一個部門，活像一條大毒蛇，如果那二個人被這毒蛇的口沫或血汗所沾染，那個人就會有致命的危險。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也即塘沽協定之後二十天，上海一家外文報記載有以下消息：

「法西斯暴力國的橫行，——襲擊共產黨，逮捕左翼作家……這種暴力國的尖刀不但向着共產黨員，而且向着反蔣派的政敵……爲了達到這種目的，派往以上海爲中心的滬甯、滬杭甬沿線去的偵探隊、鐵血團、團警班（法西斯的政治警察），總計十組……法西斯暴力國的兇鋒上升，演出許多流血的慘案，使得中國人方面，抱着極端恐怖情緒。現在上了暴力團黑色名單的人……左聯重鎮的魯迅，身邊危險，茅盾也遭法西斯下了逮捕令，這是確實的消息」。

該項新聞關於蔣介石黨徒在「學界」中的活動，寫道：

「向來以秘密工作為主，努力於養成基本幹部的藍衣社運動已經半公開的在學界中進行，這一傾向已由長江一帶波及平津地方……」。

該項新聞同樣證實蔣介石這個法西斯運動，是由希特勒黨徒在那裏指揮。

「蔣介石的藍衣社，聘請二三十個德國人，做法西斯運動的指導者和組織員。在南京用德國留學生大事翻譯有關係的文獻，以分配各黨員」。

要說塘沽協定後這時期內蔣管區法西斯恐怖的血案，同樣是說不完的。北平學生因公葬革命先烈李大釗，被蔣介石的憲兵第三團追究，幾個月內，成千青年先後被捕，在北平獄內被殺的，就有四五百人，文學家洪靈菲就是在這次血案內死的。上海革命青年和一切抗日分子的生命，都朝不保夕，被捕被殺的，簡直無量數。孫夫人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因組織人權保障大同盟，屢接暗殺的警告，而楊杏佛竟然就在光天化日的上海馬路上被殺死了。愛國志士史燮棠因為反抗與偽滿通車，被何應欽大索數日，結果捕殺了。抗日將軍吉鴻昌在天津被暗殺沒有死，蔣介石何應欽竟以數萬元通賄法租界當局引渡，處以死刑。自由資產階級的人物史量才也因爲不滿蔣介石黑暗的專制，受到暗殺。而偉大的革命戰士瞿秋白、方志敏則是這時期內最著名的英勇殉難者。

(七) 發揮亡國論，甘當日寇的臣妾

蔣介石所有反共的三光政策及其在蔣管區的新恐怖，是和他的亡國政策及不抵抗政策相結合的。塘沽協定後，蔣介石與汪精衛同謀的政策，就是更明確決定：中國的命運聽憑日本帝國主義

的支配。同年十月二日蔣介石對他的「高級將領會議」是這樣說的：

「國家的生死存亡，完全操在日本人手裏！他要我們那一天死，我們就不得不那一天死！正如俗傳人的壽命操之於閻王，他那一天一刻，勾簿要我們死，那一天就可以差使一般小鬼來拿去我們的命！」

第二年，即一九三四年，七月間，蔣介石在「廬山軍官訓練團」講了「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請看他對於外侮究竟是如何「抵禦」的？「民族」是如何「復興」的？

首先看一看蔣介石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情形的估計：

「……到現在他一切的軍事準備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充足，所以大膽的來侵略我們中國，要想獨霸東亞」。

這些話全是充當日寇宣傳家的派頭。既然如此，中國怎麼辦呢？據蔣介石說：

「不僅是十天之內，三天之內，他就可以把我們中國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佔領起來，無論那一個地方，西邊不僅是到重慶，而且可以到成都，南邊不僅是到廣東，而且可以到梧州南甯，他的潛勢力，早已準備充足，而且他的兵艦早遍佈各地，不僅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隨時可以佔領，無論那一個地方，都可佔領，也不僅東四省已正式被佔領，就是我們的華北，事實也早已在他控制之下（按：東北的被佔領與華北的被控制都是蔣介石對日寇的貢獻），凡我們華北所有的鐵路和所有交通便利形勢險要的地方，他都有軍事的佈置，隨時都可佔領的……所以依現在的情形看，他只要發一個號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內，就完全可以把我們中國要害之區都佔領下來，滅亡我們中國」。

「今天他要派兵到什麼地方，馬上就可到什麼地方；他要派兵艦到什麼地方，馬上就可以到什麼地方，如其海陸軍所不能達到的地方，就用他的飛機隨時派來轟炸擲彈，制我們的

死命！」

蔣介石在九一八之後對學生們所作的第二番許諾，叫做「三年」之後失地如果不收復，就可
以殺他的頭，到他這個演講的時候，又快到三年了，可是他仍然又不準備交出他的頭來，並且語
調一變，變成三天亡國論了，變成隨時亡國論了。上海「一二八」抗日戰爭抵抗過一個月，沒有
亡國；長城抗日戰爭抵抗也有些時間，也沒有亡國；但據蔣介石看來，這些都不算是歷史。不但
這樣，蔣介石還有更進一步的看法：不但三天可以亡國，而且事實上中國早已經亡國了。聽蔣介
石說：

「不僅是北平、天津、濟南、青島、廣州、漢口、上海，有租界的地方，或通商口岸，
公然爲他軍事侵略策源地，完全給他沒有穿軍服的軍隊無形佔領，須知凡是他兵艦所到的，
領事館所在的地方，也統統被他無形的佔領了，無論什麼地方，統統有隨時可以正式佔領的
準備」。

蔣介石又加進一步地發揮了上面所說的「中國人生命完全操在日本人手裏」的「理論」。

「現在我們整個國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說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沒有方法可
以自由活動一點」。

「我們的生命，沒有一時一刻不在日本掌握之中」。

照這樣說，蔣介石的統治早已自認是亡國的小朝廷了。

蔣介石自吹：他是「準備抗日」的。但從九一八到他這演講已快要三年之久，他「準備」了
什麼？蔣介石說：

「現在日本……所恃的是什麼？唯一可恃的就是有準備齊全的武力，而我們却一點沒有
準備，不僅沒有國防，就是連營防也沒有，所以他們的坦克車、汽車、飛機，隨時隨地可以

橫行一切，他欺侮我們就在這一點。如果我們稍微有點準備，他的坦克車進來，至少不讓他有路走，飛機飛來，至少有一個簡單的防空設備，他就不敢橫行無忌。昨天我和一個朋友談起，我們不必說有一年半載的準備，如果真有一兩個月的準備，日本人也就不敢耀武揚威橫行一切了。」

蔣介石有飛機坦克來進攻人民的武力，但是對於日寇，不但沒有國防，而且就連營防都沒有！一個簡單的防空設備也沒有！三年了，從濟南慘案起，六年了，可是不必說沒有一年半載的準備，就是一兩個月的準備都沒有！這是蔣介石親自的口供！是否還可以準備呢？據蔣介石的說法，那是沒有用的。他說：

「不但我們現在臨時添置武器，整頓國防，已來不及，不能和他抵抗，就是從現在起，大家同心一致，專在這一方面來努力三十年，還是不夠，到那時候說想靠物質的力量可以戰勝日本，那還是等於做夢，何況現在日本人決不許我們有一個機會，可以準備國防，更不許我們有一個時間來製造武器呢？」

蔣介石不是說「如果真有一兩月的準備，日本人也就不敢耀武揚威橫行一切」嗎？可是他又說就使努力三十年也不行了。所以不準備就是天經地義。但如果日本人「允許」你「準備國防」，是否還有若干希望呢？蔣介石說：

「退一步說：就是日本人讓我們儘量來準備國防，我們的人力和財力，那裏能够趕得上呢？」

那末，要到什麼時候才可能「準備國防」呢？蔣介石答案是：

「現在這時候各位將領要明白，如果日本人一天不失敗，我們中國的國防一天建立不起來。所以你們大家要有這覺悟，如果他有一天的武力，他決不許我們有整頓國防的一天，亦

不許我們中國有統一的一天！如此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來整頓國防？可以來和他真正作戰？沒有這個時候！沒有這個可能！我們不要夢想！」

這就是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所謂「國民政府（即蔣家朝廷）在此時期（即九一八後），亦不願用口舌求諒解於各方，以自白戰備於帝國主義者之前」的全部實際內容。真是無恥！無恥！又無恥！

毛澤東「論持久戰」說：「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毛澤東所刻劃的這個亡國論者，就是蔣介石。

那末，蔣介石的出路在那裏呢？實際上，蔣介石所歌功頌德的老祖宗會國藩有一篇批牘和一書上滿清皇帝的奏文，早就給他排定了，叫做：「洋人之患，此天所為，實非一手一足所能補救」。而任務就在於：「借洋人之力，開說布公，與敦和好，共保人財」。蔣介石所說的「戰備」，在另一方面說來，這是真的，這就是對人民作戰。他是天天在內戰中，又天天作繼續內戰的準備。而這正是他不必「自白於帝國主義之前」的，因為這是他接受帝國主義所給的命令。

日本侵略者很喜，悉蔣介石在這時候替他所作的一切新準備。他已很有經驗，知道他要什麼，蔣介石就會讓他拿什麼去。日本要求與偽國通車、通郵、設關，蔣介石接受了。日本外務省發表所謂「天羽聲明」，毛澤東認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獨佔全中國最明顯的表示」，但蔣介石朝廷發表的聲明，則說：「中國……從無欲中傷他國之意，更無擾亂東亞和平之念」，表示在天羽聲明面前完全屈服。日使有吉跟着天羽聲明，攜帶所謂「中日提攜」的新具體方案來華了。隨後，蔣介石授意的一篇無恥論文叫做「敵乎？友乎？」也出來了，叫做「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我國同胞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與理智道義之指示，制裁一時衝動及反日行爲，以示信誼」。二

月十三日，蔣家朝廷下令取締排日了。同月二十日，蔣家朝廷派王寵惠到日本去，交換「親善」意見。蔣家朝廷果然得到日本侵略者的寵幸，五月十七日中日公使同時晉升叫做「大使」，蔣家朝廷被日本侵略者看得有和「滿洲國」並列的價格了。蔣家外交部認為這是「誠意改善中日國交」之「一種劃時期的事業」。剛過十幾天工夫，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的要求提出來了。結果是又一個協定，叫做「何梅協定」（即何應欽與梅津的協定），由日寇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控制華北。日寇一張文書，就叫那平日在華北人民面前耀武揚威、橫行蹂躪的蔣家軍憲馬上滾得無影無蹤。六月十日，蔣家小朝廷頒布了遺臭萬年的「陸鄰」令。上海的「新生」刊物閒話皇帝，被認為犯了「大不敬」，蔣家臣子連忙向日皇調罪。七月七日，蔣家朝廷和蔣家黨部對於這個新生事件聯名發布了另一個遺臭萬年的命令，稱：「此次新生記事，確有不敬之處，殊屬妨礙邦交，以後國民務須尊重日本皇室之尊嚴，嚴禁同類之記事，違者嚴懲不貸」。可見蔣介石不但自願做日本天皇的臣妾，並且要強迫全國同胞去做日本天皇的「臣民」。十月間，蔣介石還叫陳儀到台灣去慶祝日寇佔領台灣的「四十年大典」，以表示蔣介石誠心準備讓全中國變成台灣的第二。

（八）受了人民愛國運動的處罰——西安事變

人民，又是人民，破壞了日寇侵華的夢與蔣介石亡國的計劃。

第一，是紅軍的北上抗日。中國紅軍在毛澤東指揮下的這次大進軍，打碎了塞克特的「圍剿」計劃，所經過的危險和苦難，其指揮者的天才智力，全體共產黨員和全體戰士所表現的團結力量、犧牲精神和英雄氣概，都史無前例，遠出了人類本來的想像之外。紅軍突破了蔣介石的「

團剿」，到達了對於抗日佔有極大戰略作用的地點——陝甘甯邊區。中國人民歡呼這個大進軍的勝利，世界人類把這個大進軍看成奇蹟。人們承認這種大進軍正是中華民族自信心最高最大的表現。

第二，和紅軍的進軍陝甘甯邊區同一個時候，可歌可泣的一二九運動爆發了。這運動不但表現了中國青年的新覺醒，同時是表現了全國階級關係的新變化。「反日民族革命浪潮，不但推醒了全國工人階級與農民中更落後的階層，使他們積極參加革命鬥爭，而且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與知識分子，現在也轉入革命。……在反革命營壘中，是新的動搖分裂與衝突，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許多的鄉村富農與小地主，以至一部份軍閥，對於目前開始的新的民族運動，是有採取同情中立以至參加的可能，民族革命陣線是擴大了」。蔣介石仍然以爲他的法西斯統治權，鎮壓人民愛國的運動是「最有效能的」，但人民覺醒的內在力量，終究是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鎮壓得了的。北平的青年們一聲疾呼，全國人民的抗日運動，馬上像風雲雷雨一樣，澄清了蔣介石注釋衛這類卑鄙虫豸所散佈的投降主義的污穢。當漢奸白蘭客坐汽車向蔣家將何應欽請願所謂「華北自治」的時候，何應欽就禮接有加，那時蔣介石並不宜布戒嚴，也不頒布「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可是當全國各地學生舉行愛國請願的時候，蔣介石就馬上宣布戒嚴，「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就馬上出來了。蔣介石以全副武裝對付手無寸鐵的愛國青年。蔣介石把學生的抗日愛國運動叫做「危害國家」，「得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制止」；「遇有文字、圖畫、演說或其他方法而爲前項犯罪（按：即愛國有罪）之宣傳者，得當場逮捕，並得於必要時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排除其抗拒」；「軍警遇有妨害秩序煽惑民衆之集會遊行，應立予解散，並得逮捕首謀者及抗拒解散之人」；「明知爲違犯本辦法之人犯而藏匿留容或使之隔避者，得逮捕之」；「其所逮捕之人犯，應立即解送……依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或其他刑事法規辦理」。就使是日寇親手「辦理」，也

恐怕比不上蔣介石這樣的遇到。但是蔣介石這一切喪盡天良與窮兇極惡的辦法，仍然不能夠鎮壓民族的偉大覺醒。毛澤東和毛澤東的戰友劉少奇等共產黨人指導了這運動的前進。

在這民族空前危機與國家破碎的局面中，和全國人民意志相結合的毛澤東——中國共產黨起了扭轉乾坤的作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號召全國組織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以挽救民族的危亡。全國人民熱烈擁護共產黨的號召。但是，蔣介石根據自己家族和他的姻親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陳立夫兄弟家族這幾個封建買辦金融寡頭的利益，拒絕共產黨的建議。蔣介石，一方面，像上面所說，繼續以喪盡天良和窮兇極惡的辦法圍剿蔣管區的人民愛國運動，逮捕救國運動的領導人，一方面又繼續倒行逆施，圍剿為抗日和民族團結而奮鬥的紅軍。二十五年，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蔣介石在西安軍官團向東北軍西北軍「訓話」，繼續無恥地說：「共「匪」」讀為號召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是中國目前之敵人，日本是遠在數千里外之敵人，故必須先將目前之敵人消滅，然後再消滅較遠之敵人。若不如此，是遠近不分，先後倒置，就不配作「革命」（讀作反革命）軍人」。張學良幾次要求聯共抗日，有一回，「蔣乃大怒，撮大姆指頭當胸謂張曰：我既定的計劃，有人拿手槍打死我，也不能變更。且說：日本不過是皮膚之患，共產黨乃心腑之患，故必須滅共」（高崇民：「紀念雙十二」）。當然，在人民面前，倒行逆施的蔣介石終究要受了教訓。成為歷史時局轉換點的西安事變，於十二月十二日發生。

這個大劊子手，平時「殘忍陰謀」，「機巧權術」，殺人如割草，但極端恐懼自己的生命被殺。誰相信他的「西安事變日記」所寫的那一派裝腔作勢，誰就會使人笑破肚子。據一位當時參加西安事變者的回憶：

「十二月十二日晨五時，華清池門前槍聲大作，蔣介石隨身帶的幾十名「御林軍」慌忙

起來抵抗，於是在華清池院內演了一場激戰。蔣介石從睡夢中驚醒，趕緊從床上爬起來。也
不及穿衣穿鞋，就披着睡衣，光着襪底，從華清池後門逃跑，出了後門，在天色朦朧中，深
一脚淺一脚的向小山上奔命，跑了大概有將近半里路，一失足，跌到有七八尺深壁立的一個
山凹凹裏邊去了。脊骨跌壞了，腳也擦破了。山凹凹裏長的有荒草，蔣介石就趁勢向草裏
一鑽，像野雞一樣顧腦袋不顧屁股的鑽到草裏邊。捉蔣介石的東北軍在華清池遍尋他不着。
有一位營長很細心，跑到蔣介石的住屋中，摸摸蔣蓋的被子還是溫暖的，桌上還放着蔣介石
的假牙，知道蔣介石不會跑遠，於是到小山上搜來搜去，一下看見山凹凹裏邊荒草當中鑽着
一個人，於是大喝一聲：「什麼人出來！」蔣介石這時沒有辦法，才戰戰兢兢的從草中鑽
出，連問：「你們是什麼軍隊，你們是什麼軍隊」，及至知道是東北軍，他却又裝模做樣坐
下抵死不肯自己上來，東北軍的官兵看是蔣介石，就下去把他拖上來，架到汽車上，押送到
西安新城大樓。

上午八時，蔣介石被押送到了新城大樓。蔣介石這時還是披着睡衣光着襪底。雖然一路
之上，有白鳳翔師長的好心把他的皮大衣脫給蔣介石披上。當時守衛新城大樓的是綏署憲兵
營，伺候蔣介石的是楊虎城將軍的幾個親信副官。副官們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一套全新的衣服
鞋襪送給蔣介石穿。副官們說：「這是楊主任給委員長送的，請委員長更衣吧。」蔣介石一
聽，連說：「我不穿，我不穿楊主任送我的衣服。」副官們沒辦法，同時也猜透蔣介石的心
理，於是將衣服拿出去，馬上又拿回來向蔣介石說：「這是我們幾個人出錢給委員長買的，
請穿上吧！」蔣介石聽了馬上就說：「啊！你們給我買的，我穿，我穿。」穿上衣裳以後，
蔣介石就裝着很和氣的面目對幾位副官說：「我們現在是共患難的朋友，你們叫什麼名字，
給我開一個名單來，我帶在身上，將來是不忘你們對我的好處。」蔣介石這一套是想收買還

總領副官的，但是這總領副官却始終沒有交給他的名單。

大概是住了二三天以後，張楊兩將軍認為蔣介石在新城大樓住着有些不方便，特意把副司令公館對門的高桂滋公館打掃好，作為蔣介石的住處。那天夜晚十一點鐘，張學良將軍派他的衛隊營長孫銘九去接蔣介石，孫營長胸前皮帶上插着一支左輪手槍，進了新城大樓，見了蔣介石說：「報告委員長，這裏住着不方便，副司令給委員長預備下一個好地方，請委員長馬上同我搬去。」蔣介石一看孫銘九胸前插着的手槍，天又晚了，並且叫他馬上同他一起走，他誤會是要槍斃他，他馬上臉上的顏色變了，渾身發抖，嘴裏的假牙上下打的格格響，他於是迤里歪斜的連走幾步，一歪身倒在床上，用被子把頭一蒙，就說：「這是公家的地方，我不到的地方去，讓我死在這裏吧！」孫營長再三向他解釋，他總是蒙在被子里打哆嗦（申伯純：「回憶雙十二」）。

蔣介石大殺特殺中國愛國人民而且從來沒有放手過的時候，蔣介石自己是毫不哆嗦的。就是這雙十二事變前三天，他對於西安學生的愛國遊行，打過電話給張學良，「要格殺勿論，要格殺勿論」，他當然也是毫不哆嗦的。可是，他現在打哆嗦了。共產黨的代表周恩來出現在蔣介石面前時，蔣介石同樣地恐懼得變了顏色。事實上，那時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政策，是要利用一切可能的力量轉變到抗日戰場上，所以對於蔣介石的問題，乃是要他放下屠刀，回頭是岸。在蔣介石接受了團結抗日的條件之後，共產黨就和張學良、楊虎城一起釋放了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蔣要殺害蔣介石的，恰巧是在南京的蔣介石自己一幫狐羣狗黨。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合衆社南京電，記載蔣介石顧問端納所述赴陝經過，說：

「我於蔣被扣之後一日行抵洛陽，翌日趕赴西安，……是夜張學良致電南京，歡迎派人磋商蔣問題，但南京無人願意入陝，反之，南京要人復下令陸空軍立即進攻，因此遂與蔣

安斷絕一切交通，南京並禁止任何人進往該處，初阻宋美齡前往，繼復圖制止宋子文前途。

端納又說：

「假使蔣介石初困之三日，天氣晴朗，則西安當已被炸，而蔣氏亦已喪生矣，但因數日天氣不佳，乃能避免轟炸，比於太陽再露時，宋子文亦已飛抵西安」。

據前引的回憶者所說：宋美齡會由端納帶給蔣介石一封信，信的最後有一句是：「南京是戲中有戲」。蔣介石看到了這一句，「就當着端納和張學良將軍咧着嘴哭了」。

蔣介石和他的一批狐擊狗黨既然都是一批活的吸血鬼，以爭權奪利和左右竄國做出路，而蔣介石又善以自己的「殘忍陰謀、機巧權術」教他的徒弟，因此，也正如我們在寫袁世凱時所說的：「有其師必有其弟」，「以其人之道，還乏其人之身」。蔣介石在南京的徒弟像何應欽們要按照蔣介石暗算別人的辦法來暗算蔣介石，這是絲毫不足怪的。當蔣介石滿口答應停止內戰準備抗日的條件之後，蔣介石馬上得到了釋放，張學良還陪送他到了南京，這倒是出乎南京那批陰謀家——蔣介石的徒弟何應欽們的意料之外。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張學良陪送到了南京之後，蔣介石不但捏造一篇在西安的所謂「對張楊訓話」，而且又背信棄義地扣住了他，後來更扣住楊虎城，兩個被扣到現在，已有十一年之久了。

四 抗戰失敗主義和繼續與人民爲敵

(一) 多邊的買賣政策

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接受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條件，這一方面是由於人民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壓力以及很多國民黨軍隊對於「剿共」政策的抵抗，另一方面則是英美對於日寇的態度有了新變化，這種變化直接影響到蔣介石集團。

蔣介石這個在北洋軍閥之後大買辦大封建奴隸主的集中統治，代表了各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共同利益，同時，在一定時機，一定場合，又代表了某一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殊利益，因此，不但蔣介石與國民黨內部各派別在各種期間內的鬥爭，是反映了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矛盾，同時蔣介石自己的政策變化，也是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矛盾變化的反映。蔣介石原來在交易所中所學得的本事，全部都應用到政治上來。他進行左右賣國的貿易，但賣給誰，怎樣賣，完全看行情辦事，看對方所出的價格高低，看自己在這方或在那方所得的利益的比較。蔣介石和日寇「親如一家」，視日寇如神物，日寇要什麼就給什麼，但是，他的買賣聯系是有幾方面的，假如他覺得還有另一種買賣可做，他就可以不只做一樣的買賣。以前英美帝國主義是完全放任日寇去佔領東北和熱河的，但自從日寇進入華北，特別是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之後，英美帝國主義就不像以前那樣的完全放任了。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北華中有很大的利益，直接受到日本這個角逐者的武裝打

擊，因此就改變了態度，並對蔣介石給以影響。在大革命的時候，上海的宇林西報代表英帝國主義者鼓勵蔣介石反革命，在西安事變的時候，同是這一個報紙就提出了：「只要南京能夠充分保持他的最高權力（就是說：只要最高權力不落入中國人民之手），他便不妨在政策上同共產黨採取某種形式的聯合」。因為照該報的看法：「開始對於日本所提要求加以拒絕……這件事對於我們（就是說：對於英國）萬分重要」。英美帝國主義這種態度的變化，不但是在中國問題上，而且在世界範圍的問題上，正如當時密勒氏評論所說，這「是反映着英國對於最近締結的日德軍事同盟的反對態度」。

其次，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獨佔的財產和他的政權，在何梅協定之後——日寇新的侵略行動前面，受到了命運不定的直接威脅。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的財產和統治中心是在以國策帝國主義大買辦市場——上海為中心的華中地帶；日寇佔東北的時候，四大家族的財產和中心政權，離開那裏很遠，所以蔣介石公開發說，「沒有多大關係」，「失掉了對於『革命』無所損失的」。日寇的進入華北，蔣介石的勢力從河北、察哈爾撤退，這時蔣介石覺得還可以和它相安，並進一步以臣妾的態度服事日寇，但是，事實上，日寇已迫近四大家族的財產和統治的中心所在地了。日寇對於四大家族的財產和統治，是「保存」呢？是「取消」呢？這就使得蔣介石引起了疑問了。蔣介石在英美日之間，如前所述，本來是採取狡兔三窟的多邊買賣政策的，如果英美能夠支持他的財產和中心統治，他也就可以把屁股移到英美的身上，而執行英美的政策。

所以，西安事變所得到的國內和平的結果，是人民抗日潮流的壓力和英美政策以及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利益這種種不同的因素，不同的方面，所交錯結合起來的。這些不同的因素，不同的方面，其利益和立場是完全相反的，矛盾的，但却在一種特別的歷史機遇上，互相錯綜，形成了這一種特別的新局面。

正因為是這末一種極端矛盾的結合，所以，這國內和平的局面，乃是動搖不定的。蔣介石對於這個局面，既然是完全被迫，無可奈何而承認的，所以，他的仇恨心仍然始終放在人民身上。在西安事變之後，毛澤東號召的，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準備抗戰。蔣介石却在另一方面，背信棄義，佈置軍事的新陰謀，侵佔西安，繼續「圍剿」南方的紅軍游擊隊。在政治上，他繼續查禁愛國書報，照一個外國報紙所說，「除裸體畫外，幾乎任何東西都要被檢查抽去」。他繼續以「危害民國」的無恥罪名審判救國運動的領袖。他堅持所準備的國民黨法西斯獨裁的被公認為「穢聲載道言之齒冷」的所謂「國大代表」和「五五憲草」。這一切和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諾言相反的東西，是和蔣介石對外的買賣聯繫在一起的。那時，不用說日寇的盟友希特勒和慕沙里尼還繼續是蔣介石的密友，德國法西斯蒂的顧問仍然盛踞在蔣家的軍部，德國獨佔資本仍然在四大家族的經濟活動中佔有重大的地位，而且蔣介石還直接保持和日寇的密切聯繫。蔣介石接見日寇的經濟考察團時，還在那裏聲稱「禮讓」為「東方文化的特點」，希望兩國「為東方文化努力」。當時日本新任的外相佐藤對記者的談話，聲稱不變更對華政策，而且在日本下院申明「仍維持天羽聲明之精神」，「日政府之精神是要將華北變為獨立區域，不管國民黨三中全會之決定如何，日本必仍繼續此政策」。但那時蔣家朝廷的新任外長王寵惠却對那辭行的川樾表示：「本人熱望調睦中日國交，立對於佐藤外相外交演詞，至為欽佩，願在事實上努力促其具體化」。蔣介石是完全可以並準備隨時看風轉舵的。

(二) 從英美帝國主義及四大家族的利益出發與 抗戰失敗主義

日寇終於發動了七七的事變了。蘆溝橋出現了中國士兵的浴血抗戰。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毛

澤東、朱德率領全體紅軍將士向全中國呼籲：爲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但是，與日寇謀和，還是蔣介石特別有興趣的工作。只要日寇還能够多少地顧全蔣介石的面子，蔣介石的財產和統治中心的面能够多少地得到日寇的保證，那末，蔣介石是一定還要和日寇保持『禮義』的。七月二十七日，蔣家外交部發言人發表了以下的談話：

『自本月七日夜，日軍在蘆溝橋無故向我駐軍襲擊以來，雖其責任完全不在我方，但我當局爲顧全東亞和平，始終表示願以外交方式謀適當之解決。我外交部長曾迭次向日方正式提議，雙方約定日期同時撤兵（按：蔣家的提議，不是日寇撤兵，而是『雙方同時撤兵』，即要中國軍隊和日寇同樣從一定的中國領土撤退），不幸日方對於我方歷次和平表示及提議，不獨不予接受，且大舉增兵，集中平津，同時與我地方當局議定解決辦法，我中央得報後，察其內容，與我既定方針，尙無重大出入，爲貫徹和平之初衷，不予反對。我方極端容忍擁護和平之苦衷，應爲中外人士所共見，方謂日方前線之軍，從此可以撤退，後方之軍，亦可以停止進發。乃一週以來，日軍不獨毫無撤退模樣，且日本國內及朝鮮各地仍續派大量軍隊，絡繹向平津出動……』

可見連日寇的辦法，蔣介石都接受了，而且認爲和蔣介石的『既定方針尙無重大出入』。但日寇那時的『辦法』，不過是爲着『續派大量軍隊』，大舉進攻我偉大的祖國。不久，日寇攻陷北平天津，並且進攻上滬了。日寇根本的計劃和行動使得英美帝國主義吃了一驚，蔣介石預定的交易算盤不濟事了。英美帝國主義在華中華北的利益已處在日寇武裝的直接威脅之下，而蔣介石四大家族的財產和統治中心正受到直接的打擊。於是蔣介石根據英美帝國主義和四大家族的利益，乃不得不變計，接受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並與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武裝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屠殺革命的時候，並過河拆橋，與蘇聯

斷絕邦交，在一九二九年，蔣介石又在東路發動了反蘇的冒險衝突，以取媚於帝國主義，這一切反蘇政策造成中國民族在國際的孤立，使日寇敢於放手發動九一八事變，而經過人民輿論的要求，才在日寇進攻熱河的時候恢復中蘇邦交，在八一三抗戰之後，又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事實是這樣：或者是繼續不抵抗主義，任令日寇滅亡中國，或者是恢復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起而抗戰挽救中國的滅亡。只要你要抗戰，在國內就必要聯共，在國際上就必要聯蘇，這是不可抵抗的規律。漢奸周佛海就說過他「深刻的認識了抗日勢必聯俄聯共的命運」，他反對聯俄聯共這個抗日救國的必然「命運」，而走上反共反蘇的必然降日的「命運」。所有汪精衛一夥及其他漢奸都是這樣。經過許多歷史的反覆證明，孫中山聯共聯俄的政策是代表民族利益的惟一內外政策。

但是，正如毛澤東所分析：抗日戰爭一開始就有兩條不同的指導路線。當蔣介石還在那裏和日寇進行「和平」談判，並打算接受日寇的「辦法」的時候，毛澤東於七月二十三日發表的名文「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方針辦法與前途」，就提出了兩種方針，兩套辦法，兩個前途的問題：即一種方針是堅決抗戰，而對堅決抗戰方針有誠意的人，辦法一定是依靠人民大眾，結果就得到解放的前途；相反，如果方針不是堅決抗戰，而是妥協退讓，如果辦法不是依靠人民，而是壓迫人民，結果就是奴隸牛馬的前途。這是兩條路線。毛澤東號召人民的全面戰爭，警告壓迫人民的片面戰爭的危險性。但蔣介石所進行的路線，僅僅是壓迫人民的、不斷企圖與日寇妥協的、片面的消極的應戰。蔣介石被迫而重新採取聯共聯蘇的政策，但是，蔣介石害怕人民，比起害怕日寇，不知有多少千萬倍。蔣介石是堅決拒絕人民戰爭的路線的，而且今天採取聯共聯蘇的政策，明天就馬上可以推翻聯共聯蘇的政策。

整個中國社會的抗戰陣營基本上是左中右三個陣營，即以無產階級為首的人民大眾的陣營，自由資產階級的陣營，以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陣營。但路線的基本分裂是兩條：或者是人民的

路線，或者是壓迫人民的路線。無產階級的路線是前者，它有以土地改革為基礎的解放人民的堅決政策，而基本依靠是人民的武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路線是後者，它有以保護封建土地制度為基礎的壓迫人民的堅決政策，而基本的依靠就是反人民的武力。自由資產階級的路線是矛盾與動搖的，他們覺得抗戰需要人民，需要民主，但沒有反對封建土地制度的解放人民的堅決政策，而特別是它的少數右翼分子還戒備與害怕人民的武力，可是如果沒有解放人民的堅決政策與人民的武力，如果沒有強大的人民武力，抗戰便不可能有任何結果。

毛澤東的警告很靈驗。在蔣介石的反人民路線指導下的反人民武力的國民黨戰場，一遇到窮人，便一潰千里。但在毛澤東的人民路線指導下的人民武力的解放區戰場，却逐逐勝利。中國紅軍改編的和廣大人民相結合的國民革命軍八路軍，由朱德總司令率領，一上戰場，便在抗戰史上取得破天荒第一次的平型關大勝利。不久，新四軍也挺進到大江南北了。

人民的路線，人民的武力，抗戰的勝利，這就是以毛澤東為領袖的獨立民主的新中國——即中國解放區。反人民的路線，反人民的武力，抗戰的失敗，這就是以蔣介石為領袖的半殖民地與封建的中國——即國民黨統治區。

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一變而為抗戰失敗主義。

(三) 擺出投降的價格

蔣介石的抗戰（他本來叫抗戰）既然不是出於真心，不是從保衛民族出發，而是從四大家族的財產和統治出發，不是從中國民族、中國人民出發，而是從國際的政治投機、觀看英美帝國主義的風色出發，因此，他的所謂「抗戰」就命定是失敗主義，而且也就隨時準備相機把抗戰結

東。當時，在國際上，真正實際援助中國抗戰的，只有蘇聯一國，這只從蘇聯對中國的大量借款也完全可以看出，一九三九年三月，斯大林說：「我們支持在為保衛他們自己的獨立而在戰鬥中成為侵略的犧牲者的民族」。有一個刊物還寫過當時的情況：「那時，蘇聯正在不聲不響地援助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軍火、汽油、卡車自西北源源而來；蘇聯健兒無聲無息地血洒長空，參加保衛中國。這前後美國還在以廢鐵裝備日本，英國則封閉滇緬公路，窒息中國」。英美帝國主義當時的政策，正如毛澤東所巧妙形容的，叫做「坐山觀虎鬥」。日本帝國主義既然在中國那末橫衝直撞，看不見英美原來的帝國主義利益，英美帝國主義也就樂得讓中國抗他一抗，但英美帝國主義却深深駭怕中國民族因此大覺醒起來，結果中國人民抗戰的火燄就不但要燒死日寇，而且也會燒死在中國的所有帝國主義。因此，他們懷有和蔣介石同樣的心情，只要日寇在一定界線上，讓英美過得去，讓蔣介石下得了台，就必須停止中國民族革命火燄的燃燒。德意法西斯蒂則努力設法彌補日蔣之間的關係。抗戰開始之後，全國輿論大攻擊這些與日寇同盟的國際法西斯強盜，但蔣家「中央宣傳部」竟然通令各地新聞檢查所：「希特勒為德國元首，慕沙里尼為意國負責當局，各報對於兩氏個人如有譏諷謾罵文詞，應予刪除，務須嚴密檢查為要」。蔣介石這樣孝敬日寇的盟友，同時就是對於日寇保留了孝敬。果然，抗戰不久，參加蔣家軍機的德國顧問和被蔣介石待為上賓的德國大使，成為日寇的媒介公開出來了。南京失守之前，日蔣的一段買賣早已經是公開的祕密。後來汪精衛為着和蔣介石相比，說明蔣介石也是「主和」的先進，披露了當時蔣家朝廷「國防最高會議」這段歷史的記錄。汪精衛還說是「舉一個例」而已，可見「例」是很多的。但是只這「一個例」，已經很可觀了。雖然記錄長點，却很有味，照抄如下：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

時間：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點：漢口中央銀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應欽。列席：陳果夫、陳布雷、徐堪、徐謨、翁文灝、邵力子、陳立夫、董顯光。

主席：汪副主席。秘書長，張寧。秘書主任：曾仲鳴。

徐次長謨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下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會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如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轉達於中國當局。其條件爲（一）內蒙自治。（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爲華北之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尙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鐵產開發，仍繼續辦理。（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方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寧部長與川越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五）防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六）關稅改善問題。（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覆電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徐謨自稱——下同）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與陶大使私人談話，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恐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接受。德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之條件並不苛刻。十二月二日

抵京。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考慮後，請與在京各高級將領一商；下午四時又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白健生、唐孟藩、徐次辰（即：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編著）。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的任務。本人報告後，各人就問有否旁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的軍備？本人答稱：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條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藩的意見，唐未即答；又問健生有何意見？白謂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墨三，顧答可以答應；再問孟藩，唐亦稱贊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遂表示：（一）德國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下午五時，德大使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担任翻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說，與在漢口對孔院長王部長所說者相同，但加一句謂：如現在不答應，戰事再進行下去，將來之條件恐非如此。蔣委員長表示：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可以不算數；但對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調停，因為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及範圍（下略）。

蔣介石很傷心汪精衛洩露他這個秘密，結果由吳稚暉出面互罵了一通，據說是：「當時德大使調停的經過，和外交的秘密，到如今敵人尚不敢借此宣傳，即陶大使亦未便在外宣露一些，而『汪氏斷斷於主和者不是他一人，就將國防最高會議記錄披露，只就是洩露外交軍事秘密，律有明刑』。但吳稚暉這一出面，却反轉而更加證明了蔣介石這一段投降活動的秘密。蔣介石的投降價格，是：只要在華中保存四大家族的財產和統治中心的一定場面，華北則可以保存一定形式，而實際上歸日寇統治。至於東北，那他就老早在塘沽協定上承認了日寇的佔領，此時就更不

要提起了。

日將這段買賣當時沒有做成，但蔣介石擺下的這張買賣的棋子，是沒有變化的。武漢失守之後，蔣介石又向日寇伸手。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美聯社紐約電：蔣家朝廷駐美大使胡適在紐約律師俱樂部演講：「中國自廣州漢口陷落後，曾向日本作非正式及間接之和議建議，但因日方所提條件，在中國萬難接受，故決計繼續抗戰」。蔣介石的「和議」建議的實際內容是什麼呢？蔣家有一個刊物公開發表了這個內容，說：「我們以為日本如確有誠意與中國罷戰言和，應該立即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這個刊物是在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的（見「血路」四十四期）。這是蔣介石在當時國民黨五中全會對他們的「中央執監委員會」所說明的投降價格，其實也不是什麼秘密的了。可見蔣介石這個價格，與他在南京失守之後所開列的價格是不相上下的。一直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蔣介石在國民黨的六中全會，所公開開列的，依然是重複這樣一個價格，他說：「所謂抗戰到底究竟是什麼講呢？我在五中全會曾說明，抗戰到底要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是根據以中國為基準的說法」。這不只是掛牌，實際上他是用一切秘密的或公開的方法去哀求日寇批准他擬議的這個投降價格。例如：「二十八年，蕭振瀛被派潛赴香港，對日寇媾和，蔣介石當時所提的條件，是祇要恢復七七以前狀況，不言而喻，東北不要了」。（見閻寶航：「蔣介石如何出賣東北」？）但這僅僅是蔣介石秘密活動的一種例子。

（四）熱衷於遠東慕尼黑

蔣介石同時反映英美帝國主義的要求。並經過英美進行了許多求和的活動。那時西方帝國主義的政策，是「不斷敦請中國講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合眾社華盛頓電稱：「中國開

題研究會爲非官方之機關，頃發表聲明書，謂現惟有一事足以擊破中國，卽西方各國之不斷敦請中國議和，此層英美兩國政府之舉動爲尤然。『英國一個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已經明白說過：『英國只要日本能接近『民主國』，便在長江方面受點損失與日妥協都可以』（見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上海導報社評）。這就是遠東慕尼黑黑黑的活動。一九三九年二月九日路透社已經從重慶電傳有所謂『遠東國際會議』『斡旋』中日戰爭之說。路透社重慶電稱：『中國官員』對該社記者發表談話：『中日問題將由列強以壓力加諸中日兩國解決之』。並說：『討共問題將成爲一爭點，此一錯綜事件，至今未獲妥協之解決方法』。中國共產黨使得蔣介石不能夠順利地進行販賣中國的貿易，是很清楚的。正如當時上海一個報紙對『中國官員談話』評稱：『今天中國之所以繼續抗戰，而不能造成遠東慕尼黑前途，完全是爲了『討共問題』無法解決。如其沒有共產黨，中國（按：不是中國，而是蔣家朝廷）早可接受日本的條件而『媾和』了。但是，進行還是進行的。一九三九年四月間，英國大使卡爾由上海到重慶，那時輿論即認爲是和蔣日媾和問題有關。卡爾於一九三八年冬天也到過重慶，據日本人說：他曾『和蔣委員長會談七次，並歷訪中國政界要人』。那次他離開重慶到香港曾對日本人表示過：『假使日本和中國兩方面都能自動地接近，那時候英國很願作一個調停者』。當然，這次卡爾之來，又是『願作一個調停者』了。這是關於英國方面的活動。第二次歐戰爆發之後，美國方面的活動就特別突出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蔣家外長王寵惠對美國合衆社遠東部總經理毛勒士發表談話，稱『中國自開戰以來從未拒絕和平』，並稱『希望愛和平的國家如美國能促成調停』。王並請毛務將此意告訴美國。當王寵惠談話時，英美大使正集於重慶，接着王寵惠的談話，又有張羣、魏道明等紛紛赴香港作『和平』的試探，因此，有如香港大公報十月一日消息所謂：『近來和平謠言，傳遍遐邇』。那時美國的政策是怎樣的呢？請看以下一針見血的分析，便知道王寵惠的談話完全是內幕的根據的。

「美國對中國之政策，在於供給中國以其種繁豐之必要軍火及軍用品，然其供給之方式却在於使中國更增加其經濟依賴性。美國購買中國白銀，使中國易於購得戰爭資金。美國對中國之「援助」，主要的基於年利之上，在此「援助」中，美國非但未虧損分文，且從戰爭買賣中大獲其財，同時吸取中國之白銀，準備使中國愈加依賴美國。另一方面，美國又積極的援助日本對華作戰，日本以黃金償還其由美國所購得之軍用品，自戰爭爆發以來，美國由日本所輸入之黃金達五萬萬元。美國如此的吸取兩個交戰國之黃金與白銀，並相信美國因而將使雙方愈加依賴於美國，迨交戰國已充分的疲憊，這就是美國的適當時機，由「不干涉」而變到直接的干涉，迫使中日兩國在遠東建立對美有利之和平」(蘇聯真理報評論，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塔斯社電)。

上述美國的政策，果然一步一步地上來了。一九四一年五月間，蘇聯真理報東京消息稱：「美國最近由日本非官方之負責人士接到一締結日美協定之提議，提議中提出：美國干涉中日戰爭，日軍則先由中國內地撤退，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之支配地位，日本保證不向南洋發動戰爭，予日本以重要經濟讓步，尤其在南洋方面，同時或者由美國貸款予日。」該訪員稱：「在談判此問題之前，華盛頓要求日本取消一九三八年一月不以蔣介石作為談判對手之聲明及修改歷次所作關於不容第三國干涉中日戰爭之宣言，闡明日本在遠東之經濟計劃。」真理報揭露了這些日美妥協的消息，日美雙方都不加否認。五月十九日松岡、格魯在東京會談。五月二十三日蔣家軍委會發言人稱：「上週寇軍全面發動總計達三十萬人之多，以此種方式而修談解決「中國事變」，不但世無相信之人，即敵寇亦自知其不可能也。」這無異乎說，軍事進攻方式，是不能解決的。果然，同盟社接着就紛紛報告：日本「各戰線軍事當局均稱第一期作戰已結束」。日寇的意思是告訴蔣介石：「奴才們啊，你們不用慌，只要你們努力反共，我還是會收納你們的」。

蔣介石既熱衷於英美的遠東慕尼黑政策，把遠東慕尼黑的活動和他的投降價格結合在一起；而對於認真援助中國抗戰的蘇聯就採取了極端仇視的態度。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路透社重慶電：「據消息靈通之華人各界稱：中蘇邦交固仍親善，然據現象觀之，「中國」（指蔣家朝廷）甯願求援於美國與歐洲之數國，而不欲求之於蘇聯。；惟蘇聯威望在中國民衆中仍頗重視，彼等感覺蘇聯至少已以實在的助力給予中國，而非徒托空言表示同情。」不僅如此。蔣介石當時投降的活勳，並且是企圖挑唆日寇向蘇聯進攻，而表示蔣介石自己仍然可以做日寇的「友邦」。蔣介石黨徒當時在公開的刊物上，說出了如下的願望：

「倘使敵人能够對於和平真價，有切實的認識，；那末，本來愛好和平的我們，也當然樂於媾和這一回事。」

就敵人方面說，；長此下去，中國是征服不了的，而敵人在亞洲方面的真正的世仇，却好將其所養之精所蓄之銳，一鼓而殲滅敵人之疲憊脆弱的力量，那時，敵人是與一蹶不振的，這層膚淺理由，敵人中有幾個，諒也很能認識了，倘能；移其目光於另一方面，以敵人的本身的智力和其所謂同一軸心的德意兩邦的觀察推動，這是可以做到的事。那末，這媾和的可能性是會有的」（見蔣家刊物「血路」四十期，二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出版）。

蔣家黨徒是這樣喪心病狂，為敵劃策的！蔣介石這批渺小的小爬蟲，竟然公開哀求日寇進攻蘇聯作為他與日寇「媾和」的通路！日寇對於蔣介石這批小爬蟲的奏本，雖然也羞許了他的忠誠，可是日寇究竟「力不從心」，在強大的蘇聯面前，覺得戰慄不堪，就使得蔣介石這批小爬蟲大掃其興。

(五) 武漢失守之後日寇與蔣介石的作戰重心同時

指向共產黨

七七事變發生不久，毛澤東——共產黨洞察了蔣介石的兩面政策，即指出了：在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却、內部的分化叛變』，因此，『共產黨員及其所領導的民眾與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的站在鬥爭的最前線，應該把自己成爲全國抗戰的核心，應該用極大力量發展抗日的羣衆運動，不放鬆一刻工夫一個機會去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在抗戰前，在抗戰中，毛澤東一個最根本的號召，就是：『爲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統一戰線而鬥爭』。日寇駭怕共產黨這種努力，蔣介石也駭怕共產黨這種努力，因爲正如毛澤東的斷定：『我們的努力將確定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實現全部的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武漢失守之前，毛澤東又發表了舉世聞名的『論持久戰』，振奮了全國人民。在這個偉大著作中，毛澤東反對『亡國論』，也反對『速勝論』，分析情況，確立了政治上與戰略上的抗日持久戰的思想方針，指出抗戰將經過戰略的防禦、戰略的相持、戰略的反攻三個階段以取得最後勝利，而全部『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中國共產黨人遵循毛澤東的路線前進，把抗日和反封建結合起來，在解放農民、土地改革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抗日力量，日益強大起來，從日寇手裏收回的解放區（即獨立與民主的中國），日益擴大了。這和那保護封建與半殖民地制度的蔣介石統治區（即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中國）的『日蹙國百里』情況，恰好是完全相反的對比。

自從武漢失守之後，蔣日之間，已經沒有進行過真正的戰鬥。那時日寇『華北方面軍司令部』文件稱：『剿「匪」的重心必須指向共產黨』。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戰場成爲主要的戰

場，八路軍新四軍成爲抗日的主力。日寇集中攻擊的目標就是解放區和八路軍新四軍。日寇採用了蔣介石原來在內戰時所「發明」的三光政策，獸蹄所到，對解放區進行極端慘酷的蹂躪。八路軍新四軍與解放區人民忍受一切極端的苦難，堅苦作戰，一方面繼續向日寇手裏收復蔣家朝廷所失的國土，一方面保衛了尚未淪陷的中國半壁河山。英美坐山觀虎鬥的政策，這時就變爲蔣介石的政策。蔣介石縮到峨嵋山上，「保存軍事實力，而把作戰的重担放在解放區戰場上，讓日本人大舉進攻解放區，自己則坐山觀虎鬥」（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蔣介石這個政策，照日本人的話，叫做「觀戰」政策。蔣介石這種「觀戰」的政策以及日寇反覆進攻「掃蕩」解放區的政策，是和蔣介石求和的政策以及日寇誘降的政策，相一致的。蔣介石由消極應戰的政策轉移到觀戰與求和的政策，因此，重點也就由對外轉移到對內，由聯共的政策轉移到「防共」、反共的政策。

像前面所述：蔣介石的聯共抗日本來是被迫的。當他由反共轉到和共聯共的第一天，便開始作了反共的新準備與新部署。二十六年（即一九三七年）七月蔣介石辦的廬山訓練班就提出了「在抗日戰爭中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的陰謀。七七事變之後，閩粵邊紅軍游擊隊千餘人在進行抗日的調動中，就受了蔣介石的突然襲擊。蔣介石在抗戰初期即告訴人：「不消滅共產黨，我是死不瞑目的」。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政策是這樣盤算的：「當然，共產黨是堅決抗日，並會站在抗戰的最前線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他們擋住一下日本，我就可以乘機保護自己的財產和獨佔的政權。但是，日本人是不好惹的，就讓共產黨在前線上送命吧，後方剩下的共產黨，我就找尋機會把他們收拾乾淨，這樣就達到了與日本人協同夾擊的目的」。因此，蔣介石除了在蔣管區用各種方法破壞共產黨之外，並集中最重要的嫡系部隊在陝甘甯邊區的周圍，進行封鎖並相機進攻。武漢失守之前，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上已指出了蔣介石反共的伎倆：「甚至某些人

在戰爭形勢稍爲好轉的時候，就準備在國共兩黨之間加緊磨擦一下，把對外的眼光轉到對內，這種情況，差不多每一個較大的勝仗之後，或敵人進攻暫時停頓之時，都要發生。到了日寇佔領武漢而集中力量進攻解放區之後，蔣介石爲配合他的觀戰與投降活動，他的「防制異黨辦法」的全套反共計劃就在國民黨內出現了。「共黨問題處置辦法」也出現了。蔣介石口頭上駁斥近衛聲明，叫做「共同防共則中國滅亡」，而實際上蔣介石正在做滅亡中國的共同防共。蔣介石決定對於那抗戰、民主與國內和平的堡壘——陝甘甯邊區的四周「加強軍事力量」，「加派有力部隊開入陝北」；決定對於前線的有名抗戰堡壘晉察冀邊區，「選擇若干重要據點，配備黨政軍力量，逐漸肅清「反動」勢力（按：讀爲抗日的人民武力）」，「加派有力部隊或忠實精幹之幹部前往冀魯，以限制共黨之發展」。蔣介石完全變成了日寇「剿共」的左右手。蔣介石法西斯黨的「中央黨政軍高級長官每月會商」一次，研討對共黨問題處置辦法」。蔣介石決定「加強特務工作，組織特種黨團打入共黨組織」。蔣介石決定「共產黨活動最烈之區域應實行聯保連坐法」。蔣黨一個叫做「黃堆」的刊物已公開吐露：「相信不久的將來，能够作一次大清掃」。這批以蔣介石爲首的混身帶着人民鮮血的國民黨棍，爲着以吸血取藥，就又這樣瘋狂地流露出了蔣介石所準備的殺機了。這一批好大胆的帝國主義狗奴才！他們似乎還不知道中國人民最後收拾他們的日子已經一天一天地迫近了。

蔣介石的投降活動和反共新活動，說明了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中國人民的新仇恨，同時，這種活動恰是與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財富新積聚成正比例的發展。四大家族的統治被迫退出以江浙爲中心的地帶，在重慶重新建立小朝廷，但四大家族仍然以上海作爲他們大規模金融投機與商業投機的重要根據地，並在這些投機專業上和日寇結成千絲萬縷的利害關係，在蔣管區與淪陷區之間，則實行武裝的走私，替敵人運銷商品到內地來，並把經過掠奪所集中起來的內

地人民的物品輸送到敵人那邊去，而從中取利。在抗戰中，四大家族利用抗戰的名義對蔣管區人民大肆新的榨取，在金融、商業、工業、農業、新聞出版的獨佔規模越來越大，他們的家庫也就越來越富了。四大家族無情地掠奪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血汗，並且不斷地侵吞自由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全國人民過着困難的生活，而四大家族却利用抗戰大發國難財。這樣，四大家族就逐步地重新擴大了自己與人民的矛盾，並在實際的經濟利益上加強了他們和日寇的新聯繫，因而集中表現為蔣介石的投降活動與反共反人民新活動。

蔣介石的全部統治機器，是阻止蔣管區人民全面抗戰的制動機，完全適合蔣介石這種投降的活動和反共反人民的活動。以蔣介石和四大家族為集中代表的大地主大買辦的反革命統治制度，寡頭獨裁的反革命制度的軍閥機構、官僚機構、特務機構和愚民的教育機構，在抗日戰爭中，絲毫沒有改變，正如以四大家族為集中代表的大地主大買辦的經濟統治沒有改變。蔣介石這個反動的統治集團從西安事變和抗戰開始之後，在內外政策上是起了變化（即對內政策是由內戰到統一戰線，由反共到聯共，對外政策是由不抵抗到抵抗，由反蘇到聯蘇）；但政策的若干變化與政治制度的完全不變，這正是抗戰開始後以蔣介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的特點。政策有一定的變化（注意：並不是說完全變化），是適合抗戰的，封建買辦寡頭獨裁的反革命政治制度的完全不變，是破壞抗戰的，這是蔣介石的政治制度與政策的矛盾。這種矛盾正是反映了蔣介石反動集團在抗戰中的兩面性：即一方面進行一定場合的片面應戰，另一方面隨時進行投降活動的陰謀；一方面聯共，另一方面隨時進行反共的活動。而且，正因為抗戰的爆發與政策有變化，蔣介石對於民眾就更加強了警惕性。蔣介石在內戰時期所經營的CC與復興兩大特務組織，在抗戰開始之後又重新充實與安排起來。這兩大法西斯的恐怖組織一蹶企圖合併，但因為彼此爭權奪利，互咬不休，遂又正式分開，CC仍叫做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

復興的叫做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除此之外，又成立了一個新的、由復興特務系統所操縱的、範圍頗大的反革命團體叫做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蔣介石統治的政治機構，從「中央」到保甲都更加法西斯化（特工化）了，所謂「新縣制」的設立，聯保主任和保甲長的訓練，都是表現這點。至於參政會，則原來是在全國人民要求民主之下，蔣介石用為請客敷衍、實際上是由國民黨統制的帶欺騙性的機關，隨後就越發走向反動。在軍隊制度上，蔣軍重新計劃的政治工作，乃是法西斯的特務工作。共產黨代表周恩來一度擔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實際上完全無法使用人民的權力；革命文學家郭沫若一度擔任第三廳長，實際上第三廳的工作也不能到達蔣軍的內部。在愚民教育的制度上，蔣介石又用最著名的特務頭子之一陳立夫做教育部長，抄襲了希特勒在德國所特別設立的一些法西斯學校所謂「品格為一切評判的基礎」，在各學校中建立和加強了法西斯化的「訓導」制度。蔣介石深深駭怕四大家族的全部統治機構有點放鬆，因為他覺得如果有點放鬆，便會使他和他的「羣民賊在抗戰的洪流中淹沒而死。蔣介石這一切機構本來是反共反革命的活動機構，因此，也就是由抗戰到投降的最方便的機構。「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在蔣介石的那種反動政治制度下，昨日可以宣佈抗日，今日也可以宣佈投降，昨日可以宣佈聯共，今日也可以宣佈反共，這並不算要費怎樣重大的手續。當蔣介石採取上述各種反共決策的時候，於是，蔣介石就逐步消除抗戰以來自己政治制度與政策的矛盾，蔣介石這一類的反革命機構，都同時有效地動作起來了。法西斯的妖風日烈，反共的妖言也到處散佈出來了。於是，就到處出現了蔣賊黨徒從事屠殺的血案，冀魯的蔣賊黨徒和日寇配合，殺了許多英勇抗戰的共產黨員和人民戰士。平山慘案、確山慘案，……種種倒行逆施，都經過蔣介石的指使，一幕一幕地排演出來。

這時蔣介石有一個「新發明」，叫做「曲線救國」。蔣介石的部下張蔭梧給蔣介石的一通電

文襄會經這樣說：「柴愚波爲保存實力，及實行曲線救國計，已與日方接洽，被委爲冀中剿匪總司令」。張蔭樞給何應欽的一個電報也是同一樣說法。可見所謂「曲線救國」乃是蔣介石內定的方針，而這所謂「曲線救國」，便是投敵對共的代名詞。在山東的蔣黨沈鴻烈把九一八前夜蔣介石表示過的甯亡於帝國主義不可亡於共黨的意思，重新用新的言語表示出來，即叫做「甯亡於日，不亡於共」。從此一批一批的國民黨降官降將，便不斷從蔣介石的「黨、政、軍」中到了日本人那裏，而蔣介石並親自出馬導演了幾次的反共高潮，以公開說明他和那大批降官降將的同心。

(六) 舉行三次反共高潮

每次反共高潮都是蔣介石投降降活動的積極反映。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在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冬季至一九四〇年春季，這正是上述英美反動派大鬧東方慕尼黑陰謀的時候。那時蔣軍襲佔了陝甘甯邊區的淳化、旬邑、正甯、甯縣、鎮甯五城，並且使用了飛機。在華北，蔣介石派遣朱懷冰襲擊太行區域的八路军。中國共產黨實行了毛澤東有名的堅決自衛立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克服投降的危機：「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在這期間內，毛澤東針對着蔣介石封建買辦寡頭獨裁的反革命制度及其反共活動，總結了中國百年來革命的經驗，分析了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規律，發表了代表中國革命惟一真理的「新民主主義論」，向蔣介石及一切反動派作了警告：「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齏粉」，掃清了一切反共的烏鴉老調子。這個戰鬥的、不可抗拒的著作馬上吸引了中國人民大眾的注意力，因爲這著作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內心。「精神一旦把握了大眾，就變成物質的力量」。中國人民在

這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下動員起來，準備破壞一切舊的腐朽的東西，建立一個新中國，而粉碎蔣介石在抗戰中所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戰勝當時的遠東慕尼黑陰謀，便表現了毛澤東這個著作第一次的威力。毛澤東那時說：「全國所要的是抗日、是團結、是進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敗」（『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毛澤東的言論所以有效，便因為是合乎人民的意志，而蔣介石的行動所以失敗，便因為是與人民的意志背道而馳。

當蔣介石的政策變到聯共抗日的時候，人民會採取不念舊惡的態度寬容了他，但事實却撕碎了人民一度對他的希望。蔣介石再依靠那反革命的政治制度重新向人民進攻，因此，蔣介石也重新把自己孤立起來。蔣介石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失敗了。但蔣介石的利令智昏，他是不會死心的。南洋華僑陳嘉庚的『南橋回憶錄』曾記述過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蔣介石對他的一段談話：

「蔣委員長則大罵共產黨，比較在成都所罵更形激烈，甚至面紅氣盛，聲音俱厲，憤怒云：抗戰要望勝利，必須先消滅共產黨，若不先消滅共產黨，抗戰難勝利。此種專，外國已多經驗，凡國內反對黨，必先消除，對外才能勝利。此項話我未曾說出，今日我對你方姑說到，確實是如此……」。

這個記錄，活現出了大劍子手蔣介石的一副兇相，一套狠毒陰謀，蔣介石的所謂『外國』，便是指他的老祖宗希特勒、慕沙里尼，他所歌頌的所謂『勝利』，便是指希特勒、慕沙里尼的侵略戰。認賊作父的蔣介石就是這樣的。

蔣介石再舉行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蔣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一方面是和前述美日的勾搭有關，一方面則是日寇的直接策動和德國的勸降活動的結果。據一九四〇年（即民國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合衆社上海電稱：「德

威人士今日透露松岡要求暫時停止與南京政權首領汪精衛之談判，蓋松岡將作最後一次企圖直接與蔣介石談判。『德國現正德慮日本政府……放棄汪精衛政權，而以較寬大之和平條件與蔣介石，如可能者，則要英國作調人，否則由德國任調人亦可。十一月十八日海通社稱：『在過去數月中，日本已向重慶政府提出若干和平建議，同時最近中國駐東京大使會爲此目的在香港與日本代表取得接觸，中國大使會親自將極寬厚之日本建議帶至重慶。』同月二十三日，合衆社稱：『上海方面盛傳日本又向重慶蔣介石政府提出建議舉行和平談判。該消息謂：日本要求在十二月一日以前接受其建議，不然將正式承認日本羽翼下之南京汪精衛政府。』又同月二十六日，合衆社稱：『據稱德國駐重慶外交官正以壓力加諸中國領袖蔣介石，企圖使中國與日本成立和平。』必須知道：一直到這時候，中國人民從七七以來已和日寇作戰了三年半，但日寇並不對蔣介石政府宣戰，而蔣介石政府也沒有對日宣戰，日蔣之間還叫做『不存在戰爭狀態』。這一切都是爲保留一個『和』字，而蔣介石在抗戰中的一切反共的活動，總是追蹤着日蔣之間這個『和』字的魔影。

蔣介石佈置這一次反共高潮的步驟，就是先由何應欽、白崇禧以皓（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電致朱總司令、彭副總司令、葉軍長、項副軍長，強迫命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限期一月一律開赴黃河以北。蔣賦這個命令，不用說是爲着『軍令』名義，使得日寇得以重新佔領八路軍新四軍在華中所已解放了的解放區，企圖免除日寇在華中的『心腹之患』，但特別是準備要當新四軍移動中給予一個突然的出其不意的襲擊。這種目的，也就是爲的達到在與日寇的談判中獲得日寇諒解並從而『成立和平』的目的。朱、彭、葉、項在十一月九日的佳電具體地指出：『國內一部份人士正在策動所謂新的反共高潮，企圖爲投降掃清道路，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險，其計至毒，

道路相告，動魄驚心，時局危機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所謂「國內一部份人士」，不是別人，正是蔣賊及其一批匪幫。朱、彭、葉、項爲顧全團結的大局，忍痛北移，而正當新四軍萬人在皖南按照蔣介石規定的路線北移的時候，喪心病狂的蔣介石，對於這偉大的抗日人民軍隊，却早已下「一網打盡」的命令了！

這是蔣賊和日寇協同的計劃。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同盟社南京電：

「重慶政府嚴令長江下游江南地區之共產軍，於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移往江北，第三戰區司令官爲使共產軍早日移往江北，遂開始在東流附近圍攻新四軍及共產軍各軍隊，共產軍一部已於十日由荻港附近潰退江北。自十四日以來，日軍各部亦攻擊宣城金壇附近之新四軍，「國民政府」綏靖部隊亦協助日軍作戰」。

這個電報充分說明了襲擊新四軍的皖南事變乃是日寇與重慶蔣家小朝廷及南京汪家小朝廷的軍事行動的結合。

葉挺軍長和新四軍全體指戰員對於蔣介石匪幫滔天罪行的突然襲擊，作了極端英雄主義的抵抗。蔣賊與日汪合謀消滅新四軍的計劃沒有達到目的，證明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武力之偉大。據鄰報載「患難餘生記」所述：

「有一位我所信任的江蘇同鄉前輩告訴我，說皖南事件發生後，顧祝同會親到重慶。召集一個江蘇同鄉談話會，參加的是在戰時首都的江蘇重要士紳，顧氏對他們報告，老實說原定計劃是要消滅新四軍，後來未能成功，竟被跑到蘇北，很對不起云云」。

蔣介石匪幫狼肺狗肝，陰毒險狠，爲日本人效忠而襲擊新四軍，這不就是明白的供狀嗎？蔣介石匪幫企圖殲滅新四軍，乃是得罪於天下，而蔣介石匪幫並沒有達到圍殲的目的，僅僅很對不起日本人。……真的，如果不在皖南消滅新四軍，日本老爺要生氣的，他會說：「我的兒子

們呵，你們這樣無用，看我打你幾十板屁股」……」（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談話）。

抗戰的時局處在緊急的關頭。毛澤東聲明：「若問中國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顯的，日寇與親日派之計劃即使實現，我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不但有責任，而且自問有能力，挺身而出收拾時局，決不讓日寇與親日派橫行到底。時局不論如何黑暗，不論將來尙須經歷何種艱難道路與在此道路上須付何等代價（皖南新四軍是代價之一部），日寇與親日派總是要失敗的」。毛澤東警告了蔣介石：「我們還是希望那班玩弄火錢的人，不要過於衝昏頭腦。我們正式警告他們說：放謹慎一點吧，這種火錢是不好玩的，仔細你們自己的骨頭」。共產黨員拒絕參加那時蔣介石召集的參政會。共產黨提出了解決時局的根本辦法十二條和臨時辦法十二條。毛澤東堅決的華命政策，震動了國內國外。於是，無恥的蔣介石，這個玩火的外強中乾的獨夫，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參政會上說了以下的話：「我今日可以說，我們政府與全國人民，只有一致對付抗戰與剷除叛徒的漢奸、偽逆，決不忍有『剿共』的軍事，更不忍再聞有此種剿共之不祥名詞，留於中國歷史之中……而且以後，亦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你看！這個大劍子手簡直說得很「和平」，一個「負責」還不夠，還來一個「保證」！但這個大劍子手所推「負責」的，推「保證」的，是什麼呢？決不是別的，而只是計劃新的「剿共的軍事」。

雖然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受了蔣介石反革命的突襲，付了犧牲的代價，但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却因此而有新的大暴露，比之第一次反共高潮時候蔣介石的孤立又進了一步。毛澤東的政策從此極大地掃落了蔣介石自從抗戰以來的政治地位。以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民主政團同盟是在皖南事變後出現的，這正是蔣介石政治地位更加孤立的重大標誌之一。蔣介石只得採

取「伺機而動」的策路。蔣介石經過以下幾個事件醞釀第三次反共高潮。

第一：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法西斯德國進攻社會主義的蘇維埃聯邦。據新華社七月二十四日重慶電：蔣介石親信黨徒於德國法西斯外交官吏從中國撤退時，「竟大擺筵宴，歡宴德代辦及滬通社駐滬社長等多人。出面請客者有何應欽及其他親德派頭子朱家驊等。席間賓主各作何語，沒有人知道，但根據接近何應欽及其他親德派者稱：何等認德必勝，日亦必勝，英美蘇必敗。……爲討好希特勒起見，設此歡宴，以爲將來復交親德餘地，親德方面人員更放出空氣，謂德方面條件，爲德軍打至中央亞細亞時，担負修築一條鐵路通至甘肅，扶助中國實行法西斯制度；中國方面，全面計劃有待於德勝蘇敗與日本攻蘇，故目前須積極發動反共反蘇」。這實是蔣介石於中德絕交後所下的另一面活動的棋子。中德絕交是爲着應付英美蘇與中國人民，但蔣介石的心是向着他的老師希特勒。

第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這時候遠東慕尼黑式的危險告一結束，可是日蔣關係也更複雜化了。英美在戰爭初期的慘敗，使得蔣介石更加驚羨日寇的「力量」。蔣家朝廷外交部長郭泰祺因爲急性地宣布所謂對日德意三國宣戰，因而被免職的處分。蔣介石對二十六個聯合國的簽字是動搖的，在勉強簽字後，却又覺得一無所得，於是一個國民黨中央要人便受蔣介石命令，在一九四二年一月間對美記者發表談話稱：「中國對日作戰犧牲重大，如再不援助，中國便單獨媾和」。同年三月左右，桂林南突出現一個日本浪人叫黑田的，去見廣西省主席黃旭初，黃打電問蔣介石請示，蔣介石回電就叫暫時看管，秘密談判。蔣介石投敵將領的人數比以前更多，其官職也比以前投敵的官職更大，什麼上將呀，中將呀，總司令呀，總指揮呀，一個一個地奉蔣介石的祕密命令投奔日寇方面。蔣介石的「曲線」論有新的發展。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部曾經編發祕密文件稱：「除「奸」至爲迫切要務，應分別輕重，首先從專剿共，

如影響抗戰，則可略走曲線」。就是在這時候，蔣介石那裏出現了「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高潮。蔣家小朝廷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替他這批降官降將辯護。例如對於龐炳勳，蔣家軍委會發言人這樣說：「……均為敵寇所未能屈辱，矢志矢勇，剛強堅貞」。何應欽也公然在蔣黨的「中央紀念週」否認龐炳勳、孫殿英投敵。但龐炳勳這個蔣家降將這時正以日汪委任的「晉冀魯豫剿共總司令」兼「和平救國軍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的頭銜來和八路軍新四軍作戰。現在事實再明顯沒有了。所有降官降將都是奉有蔣介石的命令的。一九四七年春間孫殿英被解放軍俘虜，見了劉伯承將軍，就叫道：「蔣介石下令叫我當漢奸，事後又秘密派人來，想把那個命令要回去，那還行啦！」據孫殿英的部下說，這個事已製成照片，妥慎收藏了。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海大公報關於「濟南小組在兗州」的通訊中報導，當新四軍的政治主任嚴詞拒絕與偽軍談話後，「吳化文輕輕地笑着說：『我是在三十二年一月五日奉蔣委員長手令加入偽軍的，專對付好黨』……」。毛澤東說：「很多人只知道南斯拉夫有一個米海洛維奇，而不知道中國有幾十個米海洛維奇」。這幾十個米海洛維奇的總頭子就是蔣介石。這是一方面，即是新從蔣軍蔣黨裏面走到日寇那裏。但太平洋戰爭以後，還有另一方面，這是從日寇那裏回到蔣介石裏面。就是說：一批走出，一批走入，正是這時日蔣關係的特點。走入的一批，由陶希聖開頭，隨後又跟着吳鳳先坐飛機回來，隨後又陸續走進這個和那個。吳開先走進之前，「敵參謀小林少將會爲之送別，強調日本對重慶遲早必化敵爲友，以期共同反共反蘇。今日准汪政權獨立及交還租界，取消特權，都是希望蔣介石回來的準備，即華北亦可恢復戰前政委會之組織形式，且日本可強制德意法相繼實行。現在英美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治外法權是空談，日本則是拿具體事實來昭示中國人。吳則答應將此意向蔣介石忠實傳達」。這批走進的牛鬼蛇神都被蔣介石及其徒黨獎飾爲「忠貞」，繼續爲蔣介石手下的紅人。

第三：蔣介石企圖對抗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依靠那個由日汪那裏回來不久的陶希聖，寫出一本反共反人民的「中國之命運」。這本遺臭萬年的小冊子，甚至還沒有出版的時候，蔣介石的爪牙已在替他大吹大擂，肉麻兼有趣，簡直說它是「古今中外惟一的偉大創作」，好像明末無賴巨奸魏忠賢的一批狗黨稱頌魏忠賢作「三朝盛典」並比擬於「孔子作春秋」一樣，可是這一本中國法西斯主義的作品一出版，馬上傳笑全世界。蔣介石這本東西裏面，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鼓吹法西斯主義的血統論和法西斯主義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歌頌中國的封建主義，禮讚奴役中國的滿清朝廷，崇拜勾結洋人洋兵鎮壓太平天國的漢奸劊子手曾國藩，並稱說「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準備於兩年內決定命運」。這是一本法西斯主義的內戰宣言書，世界輿論把它叫做希特勒「我的奮鬥」在中國的翻版。但日本帝國主義看到了，却大快樂。據同盟社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三日東京電稱：「『中國之命運』一書，如果說其論述之方向，那是沒有錯誤的。但由日本人觀之，它只重複了為帝國聲明說盡了的大東亞秩序論，迎合大亞細亞主義，抄襲汪精衛之和平建國論」。日本『東亞雜誌』有一篇文章，說是從「中國之命運」發見了蔣介石在本質上還是一個東亞人；：「不管從那一個方面去看，都存在着東亞精神的味道」。在重慶，東亞精神的抬頭，重歸東亞，提供了把中國事變作為東亞內部問題個別解決的重要理論根據」。漢奸們當然也大高其興，認為蔣介石是說出了他們內心所想說的。由日寇外務省所支持的上流漢奸『新中國日報』於同年十月十七日稱：「重慶的最高負責者蔣介石，於本年三月發表『中國之命運』，在那一本書裏，蔣介石的意見，有三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他清算了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思想，認為不適用於中國，對共產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給予無情的批判；第二，他特別指出東方固有道德的優良，強調發揚東方固有德性以為立國根本；第三，他說明中國民族的統一性，解釋民族主義的內容不是對立和鬥爭。這三點都是無背於東亞新秩序的基本精神的。」

特別是第一點最爲重要」。蔣介石這一本東西，被日本侵略者和漢奸稱許備至，就是因爲它仇恨中國人民及其偉大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就是因爲它實際上代表中國民族的敵人及漢奸賣國賊和一批社會寄生蟲——封建買辦寡頭的利益。蔣介石用了偽「中國人」的臉孔，在中國人當中充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思想的宣傳使者。這一本醜惡不堪的東西是蔣介石大規模反共的思想準備。

蔣介石經過上述的各種醞釀，就發動了第三次的反共高潮。六月底蔣介石下令調動河防兵力向陝甘甯邊區前進，下令叫蔣管區各地特務以所謂「民衆團體」的名義，要求解散中國共產黨。這時日僞報紙就紛紛鼓勵蔣介石，要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及抗日的人民武力，「用武力痛剿，覆其巢穴，進一步作到奠定全面和平的基礎」。

但是，蔣介石這次反共高潮失敗得更可憐。當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擊退之後不久，毛澤東會這樣嚴肅地告訴了全體共產黨人：「以蔣介石爲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人民革命力量之仇恨與殘忍，不但爲過去十年的反共戰爭所證明，更由抗日戰爭中的兩次反共高潮特別是皖南事變完全的證明了。任何人民革命力量要避免爲蔣介石所消滅，並迫使其承認這種力量的存在，除了對其反革命政策作針鋒相對的鬥爭，便無他路可循」。蔣介石發動第三次的反共高潮，證明了對東的預告。全體共產黨人在毛澤東的指導下，繼續奮起反擊蔣介石的反革命，結果又打退了蔣介石這次反共高潮。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在戰鬥中的萬丈光芒，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照得妖形畢露。從這個時候起，蔣介石在中國人民當中，在世界輿論當中，便聲名狼籍不堪，簡直令人聞名即嘔。蔣介石的失敗，當然又是日本人的失敗。中國人民力量的強大，在這次又經過一番重大的考驗。

自由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擁護抗戰與團結，不滿意蔣介石的法西斯獨裁與分裂政策，但又

中立於左右之間，而革命隊伍中的機會主義者則不分別抗日統一戰線中的左中右勢力。一般說來，他們都是只有抽象聯合的政策，沒有鬥爭的政策，對於蔣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政策，不敢作針鋒相對的堅決鬥爭。正如毛澤東所指出，革命隊伍內那種投降主義思想「即是對於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讓步，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羣衆，不敢放手發動羣衆鬥爭，不敢在日本佔領地區擴大解放區與擴大人民的軍隊，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那種怯懦只便利於蔣介石的反革命。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政策，是信任人民力量的、又有聯合又有鬥爭的政策，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政策，是堅決地擴大解放區與人民解放軍的政策。只有對於蔣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實行堅決的鬥爭，才能鞏固抗日的統一戰線，才能堅持抗戰，才能堅持持久戰，使獨夫蔣介石的反革命政策走到失敗的道路。所有這些，都由蔣介石的三次反共高潮所證明

（七）在國際市場上的新拋賣

太平洋戰爭之後，蔣介石的變足繼續踏在雙船上：一方面，如上面所述，和日本侵略者保持那樣親密的來往，在反共上互爲呼應，進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務交流，蔣介石還繼續那本來的企圖，即挑起日本進攻蘇聯。另一方面，即保存和擴大自己的軍事力量，坐待英美作戰，以觀成敗。蔣介石這種兩足踏雙船的思想和政策，已決定於前述內戰時期所講的「抵禦外侮復興民族」裏面，而在這時就更具體發揮起來。不管蔣介石踏的那一隻船，或者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船，或者是美英帝國主義的船，總之，都是把民族供他人作魚肉。走上日本帝國主義的船，那就不用說了，走上美英帝國主義的船，結果就至少要把戰後中國變成美國帝國主義或英國帝國主義的附屬國。

（現在證明：蔣介石正是把戰後中國變成美帝國主義的完全附屬國。）毛澤東主張依靠人民（主要是農民）自己救自己，不是完全否認外援，而是把外援放在人民解放與人民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這才能保證中國獨立自由富強的前途，但大地主大買辦的首領蔣介石恰恰就是反對這一着。蔣介石爲着把人民作自己的魚肉，就一定把民族作他人——即異民族的魚肉。蔣介石要保持以四大家族爲集中代表的大地主大買辦的統治，而以反共作爲反人民的根本工作，就必要帝國主義作靠山，這正如前面一切的歷史所說明的。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兇暴已盡暴露在中國人民面前，而且和中國人民作戰已有長時間，蔣介石和它來往合作，就被迫採取秘密的形式，而且公開的形式還裝着對立的姿態，同時，日寇正和全世界作戰，蔣介石也感覺得未必靠得住，因此，蔣介石就覺得必須緊靠另一個公開的主人，在新的場合上把中國拋賣，當然，他是看上了美國帝國主義。特別由於人民力量在抗戰中的日益壯大，所以，就盜賣得更急。比如在開羅會議時，蔣介石和他的醜態百出的老婆宋美齡同去，目的並不是去談抗日的問題，而是想拿我們偉大的中國去作投機的買賣。小羅斯福那本回憶錄記下了宋美齡以下一段故事：

「我……代我父親出席蔣氏夫婦的雞尾酒會。他們的別墅離我們的住所約一二里遠，當我走進門的時候，我發現邱吉爾的女兒撒拉正和我扮演着同樣的角色。可是我沒有機會和她談話；蔣夫人走到我的身旁，毫不停留地把我帶到兩張並排放着的椅子上坐下。我覺得她像一位頗爲老練的演員。差不多有半小時之久，她生動地，有風趣地，熱心地談着——而她是設法把我，作爲我們談話的中心，這種恭維與魅惑的功夫之熟練到家，是多少年我難得碰到的。她談到她的國家，可是所談的範圍祇是限於勸我在戰後移居到那兒去。她問我是否對畜牧業發生興趣。那麼中國的西北對我簡直是最理想的地方了。她爲我描畫出一個有能力，有決心的人從中國苦力的勞作中所能集積起的財富的金色的畫面以後，她把身子靠向前來，

閃爍着光彩的眼睛凝視着我，同意我所說的每一句話，她的手輕輕地放在我的膝蓋上。在最初的幾分鐘內，我極力地對自己說：這位夫人祇是對我們之間的談話感到濃厚的興趣，而在她的心中絕無其他任何動機。可是在她的神態之中却有一種與絕對的眞摯不相融洽的歡愉的光采。我絕對不會相信我是如此重要的一個人物，以致她認爲必須將我征服，使我很快地變成她的好友，爲了任何將來的其他的目的。不過我却相信蔣夫人多少年來始終是以一種征服人的魅惑與假裝對她的談話對方發生與輕的方式來應付人們——尤其是男人——以致現在這變成了她的第二性格，而我怕着她的第一性格發作；說實話，那會嚇壞了我。」（錄自中文譯本一四四頁）

這位小羅斯福還算不錯，竟是一個有良心的美國人，沒有被這個國際的政治賣淫婦的「風趣」與「魅惑」所「征服」，沒有沉醉到她所給他「描寫出一個有能力有決心的人從中國苦力的勞作中所能集積起的財富的金色的畫面」裏面，雖然這個國際的政治賣淫婦一見面就那末急於獻身說法，獻了中國的土地，又獻了中國的苦力。其實宋美齡在國際外交場合上獻身說法的故事，我們本來已聽說得很多，這不過是小小的一件罷了。歷史上有秦檜的夫妻齊名，現代有汪精衛的夫妻齊名，合起蔣介石的夫妻齊名，算是無獨有偶，鼎足而三。

小羅斯福這本書的結論裏面，叫蔣介石爲「那位封建軍閥」。羅斯福也是相當知道蔣介石的。當小羅斯福在給他講述對宋美齡的印象的時候，羅斯福還「皺着眉頭」。羅斯福在私下是對蔣介石有批評的。據小羅斯福所說，羅斯福還「從那位封建軍閥，扭擠出來一項諾言」，也即所謂「雙方同意關於增強國內團結的初步協定，特別是關於中國共產黨這一點」。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抗日主要的力量，主張和中國共產黨合作，這是羅斯福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事業中所採取的一種進步政策。但是，羅斯福的政策是很矛盾的。當他聽到小羅斯福講述——宋美齡的情形之後，

羅斯福却這末說：「毫無問題地她是一個機會主義者。而我決不想在她的國內使人知道我是她的一個敵人。可是目前在中國有誰能替代蔣的地位呢？根本就沒有其他的領袖。蔣氏夫婦固然有很多短處，可是我們却不得不依靠他們」。抗日是中國人民抗的，中國人民自己有自己的領袖，中國應當由中國人民自己決定命運，而且中國人民的領袖老早就應該替代蔣介石的地位，以領導中國的前進。中國要蔣介石這種封建軍閥外國買辦的「領袖」幹什麼用呢？小羅斯福書上的結論，很正確地說到戰後在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目前狀況，並不是進步的狀況，而是連續的反動」，「政府是獨裁的政府，下面人民大眾是飢饉，在上面是貪污與鬼混」。當然這也就是開羅會議時候的狀況，但羅斯福爲什麼說「不得不依靠」這「連續的反動」、「獨裁」、「貪污與鬼混」的蔣介石夫妻呢？爲什麼說「根本沒有其他的領袖」呢？這是美國大資產階級——華爾街金融寡頭對於羅斯福政策的反映。雖然小羅斯福沒有接受也沒有權力接受蔣宋夫婦所獻出的中國土地和苦力，但華爾街的金融寡頭却最喜歡這些東西，他們是得瞞望蜀的貪得無厭者。扶蔣援蔣的政策，決不是幫助中國抗日的政策，而只是幫助中國反動派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所以，這只是美帝國主義所需要的政策，只是使得美帝國主義便於代替日寇獨佔中國的政策，這由此後發展的事實所充分地證明了。

蔣介石和他的老婆一心一意所追求的，就是不惜拿出一切民族的代價，從美國那裏獲得金錢與物資，以作爲反共的資本。羅斯福要求蔣介石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和中國共產黨一起組織聯合的政府，但是只要美國扶蔣援蔣，一切便都是落空的東西。不用說蔣介石的任何諾言是隨時撕碎的，而且只要蔣介石那全套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機構還沒有被人民打碎，並還取得美國的供給武裝與物資，那末，蔣介石反動集團的統治當然一定照舊高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這就是蔣介石所說的「以不變應萬變」。顯然，如果在太平洋戰爭之後，蔣介石得不到美國的援助和支持，

中國人民早已推翻這個腐朽不堪但橫暴至極的統治，而在全國代以人民自己的統治了。

(八) 不打日本人，遇到日寇則一觸即潰，但仍然是

中國人民的囚籠

本來蔣介石不打日本人，專門從事反共的工作，已是天下皆知的事。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之前，對他的兒子就說過：「……拿蔣介石來講，他固然有許多困難，可是憑什麼理由叫他的軍隊不打日本人」（小羅斯福：『羅斯福見聞秘錄』中譯本一二二頁）。在開羅會議時，他和蔣介石第一次見面談話之後，他又對他的兒子說他『倒知道了很多關於中國的事情』。他的兒子就問：『你知道了些什麼呢？』以下就是羅斯福所說：

「關於那陷入停滯狀態的戰爭，以及為什麼蔣介石的軍隊不打日本人——雖然他們還在報紙上登載許多戰事的消息。他（指蔣）說他的部隊沒有訓練，沒有裝備……可是這却決不能解釋……他為什麼把大部最精銳的軍隊屯在西北——紅色中國的邊境上」（小羅斯福：『羅斯福見聞秘錄』中譯本一三五頁）。

羅斯福這段話說清了兩件事，第一，蔣介石的軍隊不打日本人。第二，蔣介石把大部最精銳的軍隊屯在西北解放區的邊境上。小羅斯福的書上還記載，當時美國駐華的主要軍事代表史迪威有一回看羅斯福：『史迪威對蔣介石的政策表示不滿，並且說蔣介石是在養精蓄銳，預備在戰後以全力對付共產黨』。至於蔣介石所說的『沒有裝備』，事實上他的軍隊恰是裝備了許多許多外國來的新式武器；並且也不是『沒有訓練』，而是只有反共內戰的訓練，沒有抗日的訓練。

羅斯福和史迪威所說的，是開羅會議時候及以前蔣介石那裏的根本情況。另一方面，當時解放

置戰場的情況，在那裏也有另一種反映。在小羅斯福的回憶錄中是這樣記載的

「……英國人說中國的海岸上密密地都佈滿了日本軍隊，可是我們却很充分地知道大部分中國海岸是在中國游擊隊手中。」羅斯福說。

小羅斯福問他「這些游擊隊是不是中國的共產軍，他點了點頭，表示肯定」。羅斯福說：

「蔣介石偏偏又想使我們相信中國共產黨對日本軍隊並無任何敵對的舉動，可是不幸地，我們所知道的却與他們說的完全不同」。

所謂「對日本軍隊並無任何敵對的舉動」，完全是這個民族的巨奸大盜的自我描寫。羅斯福算得是「旁觀者清」。至於敵人對於情況當然就更清楚了。例如：一九四四年三月間日本東京同盟世界週報有一篇「國共相峙的近況」稱：「根據我們的見解，真正的抗日勢力，始終一貫的是中國共產黨。在表面上看來，好像重慶是抗日的中心勢力，其實把中日間引導到今天這樣的形勢的，是抗日勢力的共產黨」。只就軍事上看，武漢失守之後，到一九四三年，侵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四及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和八路軍新四軍作戰。一九四四年一月敵華北派遣軍公布一九四三年華北作戰的情況，是這樣說的：「在交戰回數二萬五千次中，和中國共產黨軍隊的作戰佔七成五，在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也都是中國共產黨軍隊。……充分說明了已完全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見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日本朝日新聞）。是的，只就敵人口中的事實，也足以說明：為什麼原來日寇提的「反共滅黨」的口號，只剩下「反共」的口號，再不提「滅黨」的口號了。為什麼日寇不再提「打倒國民黨」「推翻蔣介石」的口號了。為什麼日寇始終沒有向蔣政府宣戰，一直到日本投降時都還沒有戰爭狀態存在了。為什麼敵酋畑俊六還遣派代表到奉化去祭祀蔣介石祖先的墳墓了。日寇與蔣介石對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仇恨心成正比例的發展，而仇恨心的出發是一個，即這個抗日的人民武力的發展及其戰鬥力的強大。一九四四年一月

敵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岡村雷次（現在蔣介石的上賓——反共的機密參謀）在他的「歲首獻辭」中着重指出以「消滅共黨」爲「最主要的工作」。據他說：「中共不滅，則華北不能對大東亞戰爭有所貢獻」（一月一日偽情報）。上引日寇派遣軍公布戰況的文件又稱：「只有對於中國共產黨軍隊的絕滅作戰，才是『華北軍』今後的重要使命」。但是，這些都不過是這個荏爾小醜的日寇聊以自慰的妄想。日寇公布的文件也不得不說到「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顯著昂揚」，「不斷的躍起工作」。由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所武裝起來的人民軍隊是無敵的。有中國共產黨存在，有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相結合，中國便不可滅亡。沒有中國共產黨便將沒有中國。——這一切不但在實際上爲中國人民所明白，而且也爲中國民族的敵人所明白。日寇繼續對人民解放軍作殘酷的絕望作戰，同時，它也就更加指望蔣介石，指望蔣介石這個反共的合作。

日寇爲應付太平洋戰爭，並準備在東亞大陸上和人民解放軍作生死的鬥爭，於是，一九四四年春起，就在軍事上進行打通大陸交通線的行動。當然，日寇很熟悉蔣介石，用的兵力並不多，但蔣家軍遇到日寇，則一觸即潰。幾個月之間，敵人在蔣管區橫衝直撞，佔河南、下湖南、進廣西、窺貴州，對於蔣家軍，簡直像秋風掃落葉。日寇要到那裏，蔣介石就讓它到那裏。而同一時候，在解放區戰場的八路軍新四軍却正舉行了偉大勝利的進軍。

但當敵人這股妖風掃到貴州的時候，風就停下了不掃了。那個時候，如果敵人再加上些兵力，進攻重慶，蔣介石的豆腐軍隊是毫無辦法，而且蔣介石一定會給它騰出的。可是日本人並不願意那樣辦。打通大陸交通線，是日寇這次行動的軍事目的，但不是目的的全部。日寇還有政治目的，就是逼蔣公開投降。可是，日寇的蠻打，却也具有很大的危險性，一方面是八路軍新四軍在它後面的勝利進軍，一方面就是中國人民對於蔣介石的法西斯主義與失敗主義的再耐不住。中國人民又在憤怒着火燄了。當日寇打到貴州省的時候，日寇的言論界已進行討論：「重慶（按：指

蔣家小朝廷」的存在果然對我們不利嗎？」他們的結論是：「重慶政權起猛獸的囚籠作用」。『如果沒有重慶政權，我們將遭受四方八面盡是滿佈抗日精神的苦惱』。日寇所謂「猛獸」是什麼？就是中國人民這一個偉大的雄猛的醒獅。中國人民已變成醒獅了，但是蔣介石封建買辦統治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龐大法西斯機權却要把這醒獅囚籠起來。因此，保存蔣介石政權，這只是對於日寇最有利的。共產黨在重慶的代表之一董必武有一次回到延安，關於日寇這一個秘密，會說得很好：

「日本軍閥知道靠自己赤裸裸的統治中國成爲不可能，日軍侵佔到的地區，一定要扶植一些傀儡政府。這些傀儡政府，北平、太原、南京、瀋陽、武漢都有。這些傀儡政府可能代他一到那裏，民衆就起來了，共產黨和民衆搞到一起建立起強固的抗日根據地。日寇對這點最感到頭痛，毫無辦法。日寇若是搞垮了蔣政權，那末，民衆起來了，進步力量團結了，民主分子抬頭了，共產黨員活躍了，真正抗日政權一定會出現，日寇就麻煩得多。它不搞垮蔣，讓蔣的力量壓迫着民衆，在蔣統治的區域內進步和民主分子不能活動，共產黨員也不能積極作抗日工作，實際比日寇自己直接來統治還要省事些。而且敲一下蔣，還可以從蔣那裏得到一些英美援助的東西，如在進攻長沙衡陽時所繳獲的大炮就是一個例子。蔣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正好成爲日寇控制中國的一個工具。」

所以，就日寇的立場與利益來看，以保存蔣政權爲有利，而且它一方面固然希望蔣介石公開投降，另一方面如果蔣介石一旦公開投降，假面具就完全揭穿，蔣介石也就不能再起着原來那種鎮壓與欺騙中國人民的作用，而公開投降對於日寇也就反轉變成害多而利少了。因此，日寇就不但在軍事上要保存蔣政權，同時，在政治上也不要讓蔣介石在中國人民面前再沒有戲法耍弄。日

寇充分體貼了蔣介石，讓蔣介石有方便繼續反共，有方便繼續囚籠蔣管區人民。特別是日寇當它國內外的危機日益深重的時候，更不得不採取這樣的策略。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日蔣合作。這樣，這個搖搖欲墜的蔣家小朝廷，這個小朝廷的「最高領袖」——獨夫蔣介石（按照若干中外人士形容，乃是一個「真空管」），一方面受美國與英國的支持，一方面又受日寇的支持。這是對人民作戰的老奸巨滑的蔣介石特別得意的文章，因為他可以從左右的外國蠱山當中，找到反共反人民的出路。

（九）以法西斯主義的政令和失敗主義的軍令作擋箭牌，拒絕任何改革，準備大規模的內戰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人民和以獨夫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之間，進行了極劇烈的鬥爭。在四大家族統治下的情況已類似「羅馬社會的末日」。例如當時蔣方報紙桂林掃蕩報自己這樣供認：「人們似乎都失去了理性，也遺忘了感情，搜括的儘可能搜括，自私的儘可能自私，這樣於是造成了以虛偽為能事的社會，以狡黠為必然的人羣。寫到這裏，真是不寒而慄！舉目四望，狼煙遍地，到那裏找得一片乾淨土？一堆乾淨人？」這裏說的，正是表現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些垂死的階級的絕望及其亡國的情調，而與解放區的如旭日初升欣欣向榮的情況比較起來，正像是一個地獄與一個天堂的比較。必須完全改變蔣管區的情況。毛澤東提出改組蔣家政府，改組蔣家統帥部，而代蔣以民主的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以便團結全國人民，挽救國民黨戰場的危局，並認真準備全國大反攻。在國共談判中，蔣介石提出完全相對的提案，主張把他那一套法西斯的政令與失敗主義的軍令擴充到解放區，叫做「軍令政令之統一」，並且主張把抗日的人民武力——

也即抗日的主力「限期取消五分之四」。蔣介石的無恥的所謂「提示案」沒有一個字提到抗戰。毛澤東嚴正地批駁了蔣介石，並揭穿了蔣介石這種效忠日寇的詭計。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日新華社所發表的延安權威人士的評論聲稱：

「該提示案要把敵後抗戰卓著功勳、抗擊了敵偽軍六分之五的武裝力量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說，該案充編十個師，依國民黨編制每師一萬人，不過十萬人，其餘三十七萬正規軍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請問這不是日本人的腔調嗎？日本強盜千方百計用殘酷的戰爭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現在經過國民黨政府諸公一紙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豈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頭等獎賞嗎？」

評論又稱：「……問題的核心就在國民黨政府今天的政令軍令正是這麼一種東西，政令是法西斯的政令，軍令是失敗主義的軍令。要用這麼一種政令軍令去統一一切，非特是緣木求魚，而且如果統一了，那就會招致亡國大禍。遠姑不論，即以談判進行期間之事實為例。蔣鼎文、湯恩伯、胡宗南、薛岳，都是所謂忠實服從國民黨政府的政令軍令的，結果是不戰而潰，或一觸即潰，喪師失地，塗炭生靈，貽笑天下。反之，被國民黨認為「破壞軍令政令統一」的八路軍新四軍，却在天天打勝仗，天天收復失地，這就是真正有利於民族國家的統一。……因之，今日欲談軍令政令統一，必須徹底改變軍令政令之性質。欲改變軍令政令之性質，必須徹底改變現在國民黨政府所執行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項政策，必須徹底改組政府與統帥部，把那些投降降派、失敗主義者與法西斯分子趕出去，由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去掌握政令軍令，使其能代表全國各方面的力量及人民的意志。」

問題是毛澤東認為必須堅決變革蔣介石那一副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的與軍事的機構。蔣介石則堅持這全套的機構，因為這一套便利日寇進攻的壓迫人民的機構，乃是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天地

主大買辦的專政的機構，改變這一套機構，就將等於變更大地主大買辦的專政。工人、農民、學界、獨立工商業者、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熱烈擁護毛澤東這個改革的主張。以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合作爲主的民主同盟表現了積極，於一九四五年一月間也發出對時局宣言，主張「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權」。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同心，害怕有這種改革；美國反動派也和蔣介石同心，害怕中國有這種改革。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紐約時報有一篇通訊寫道：「……這瀕死的反民主的政府對於驅逐日本出中國之關心不如對於保持其政治權力之關心。美國現在至少是消極地（按：實際是積極地）支持一個在中國日益失民心而爲人所不信任的政府，這個政府保持三個特務機關（按：指CC、復興、三青團）和關閉政治犯的集中營，限制自由言論，壓迫民主的勢力」。『……蔣介石決心保持他的一羣反動老傢伙當權，直至戰爭結束，大家都相信戰爭結束時，蔣介石將專心繼續其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戰爭』。這時不滿意蔣介石政策的史迪威也去職了。該通訊又寫道：「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根本不同點是史迪威急於在中國立即對日作戰，而蔣希望用不着對日作戰」。也因此，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蔣史之間存在了反共與聯共的鬥爭。美國帝國主義者——臭名昭著的赫爾利，爲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背叛了他當羅斯福代表在延安時所贊同毛澤東關於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一項計劃的諾言，貫徹那扶蔣壓迫中國人民的政策。蔣介石因爲得到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扶助，反革命的意志更堅決，甯可讓日寇佔領全中國，拒絕對人民作任何的讓步。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用CC法西斯的頭目之一張厲生去充當內務部長，反共的大嘍囉陳誠去充當軍政部長，以便加強在政治上與軍事上的法西斯化的工作。這就是蔣介石對於人民的答覆。

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的抗日人民武力正在繼續進行反攻，國土的解放一片又一片，但是，蔣介石除了準備反共的戰爭外，已無事可爲。一九四五年四月底中國共產黨召集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

會，五月國民黨則召集了該黨的六次大會。這是兩個性質完全相反的大會。共產黨的大會是爲的：放手發動羣衆，壯大人民力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解放人民，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國民黨的大會則是爲的：放手壓迫羣衆，打擊人民力量，放任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反革命的內戰，堅持封建買辦法西斯主義即新專制主義的舊中國。毛澤東揭穿了實質：「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動員一切力量，向着中國共產黨放出了一切惡毒的箭；明的和暗的，軍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兩黨爭論，就其社會性質說來，實在是農村關係的問題上」。農民問題——這個中國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的根本問題，而在抗日戰爭中的一切問題中都更加突出了。一九四四年以來由毛澤東發起的關於聯合政府的大鬥爭，事實也更加證明了：沒有農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解放，沒有農民的武力，就沒有民主的聯合政府的基礎。農民解放——這是中國民族解放的出發，這是民主的聯合政府的出發。

蔣介石決定對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這一個使民族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變成獨立的中國、由封建半封建的中國變成民主的中國、由分裂的中國變成統一的中國、由貧弱的中國變成富強的中國的偉大方針與偉大計劃作戰到底。在國民黨的大會上，蔣介石做了反共動員的演說：「現在延安亦開所謂代表大會，對本黨和本人攻擊得體無完膚，這不僅是本人的奇恥大辱，也是本黨的奇恥大辱……本黨今後若不好好精誠團結，將來大家都要死無葬身之地」。蔣介石的走狗在國民黨大會上做了特別的報告，聲稱：「與中共之鬥爭，無法妥協，今日之急務在於團結本黨，建立對中共鬥爭之體系，即創造鬥爭的優勢條件與環境，故必須從政治上軍事上強固黨的力量。當前對中共之論鬥，應集中於反駁聯合政府、反駁兩條路線、反駁具體綱領、反對解放區代表大會。」蔣黨並因此成立所謂「特種委員會」，發表一個所謂「尋求政治解決之道」的公開決議，裝着要「和平」的樣子，在黨內則做一個「整軍肅政、加強力量」的祕密決議，準備武裝的反共

內戰。

美國帝國主義的代表人赫爾利四月二日在華盛頓發表的單獨援蔣的聲明，對於蔣介石這個反共的計劃作了直接的鼓勵。六月六日蔣介石的走狗陳誠對外國記者談話：將用美國租借武器進行內戰。另一方面，蔣介石這個計劃是完全和敵偽協調的。六月間，國民黨當局密電南京偽國府主席陳公博：「申電悉。希即以私人名義轉告劉啓雄、孫良誠、吳化文等，目前應嚴密佈置，協力剿共」。幾天之後，蔣介石經戴笠再電陳公博：如盟國對日勝利，陳需負責保持江浙地帶。陳即覆電：「此亦為余素來之懷抱」。那時漢奸們的報紙雜誌還「發明了」一個叫做「共同命運」的理論，表明他們是和蔣介石共同一個生命。

五 窮兇極惡，日暮途窮，即將被人民活捉審判

(一) 從峨嵋山走下來，搶奪人民勝利的果實，日寇變成了恩人，美帝代替了日帝

這一羣蹲在峨嵋山上的以蔣介石爲代表的野獸，虎視眈眈，其欲遂逐，正在等待機會下山。七月間蔣家軍使用美國的火箭炮進攻陝甘甯邊區的爺台山，這只是蔣介石新內戰部署的初步嘗試。忽然，在蘇聯宣戰之後兩天，日寇要求投降了。蔣介石聽到這個消息，一則以懼，一則以喜。蔣介石懼的方面，就是：他的軍隊離開日寇佔領的大城市和重要省區很遠很遠，而所有這一切大城市和重要地區則都在八路軍新四軍的包圍之中。同時，按照道理說：只有積極抗戰、不斷殲滅敵人、收復失地、卓著勛勞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的人民抗日縱隊，享有受降的全部權利；而失地有罪、抗戰無功、不斷對敵求和、並和敵僞千絲萬縷結合一起以反對抗日的人民武力的蔣介石，則不但沒有受降的權利，而且還應該像南斯拉夫的米海洛維奇一樣，由中國人民法庭審判，受有應得之罪。蔣介石喜的方面，就是：他在峨嵋山上多年養精蓄銳的力盞，這時就有用武之地了。他覺得敵僞和他本是互通聲氣的一家人，敵僞一定幫助他，美國帝國主義也一定幫助他，雖然八路軍新四軍抗日有功，雖然八路軍新四軍應享有受降的全部權利，但他依靠敵僞與美帝的援助，就可以顛之倒之，把本來完全沒有受降權利的自己，變成享有受降的全部權利；而把本來

享有受降的全部權利的八路軍新四軍，則變成完全沒有受降的權利。因此，他自己覺得仍有把握可以繼續當起封建的奴隸主和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奴隸總管。

八月十日朱德總司令發佈命令，限令敵偽繳械投降。八月十一日，蔣介石出來了，他發出了保護敵偽的命令。蔣介石一個命令是給朱總司令的，說的是：「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地駐防待命」。就是說，不許八路軍新四軍向敵偽前進，不許八路軍新四軍加緊對敵偽作戰、收繳敵偽的武裝。蔣介石同時又給偽軍下了命令，叫做「負責維持治安，保護人民」。就是說，要偽軍維持敵偽原來奴役中國人民的「治安」。世界上那裏有漢奸隊伍「保護人民」這一件事呢？蔣介石命令中的所謂「人民」，實際上就是敵偽原來所保護的那一批漢奸賣國賊。為什麼蔣介石認為要保護呢？因為這批漢奸賣國賊可能就要落入八路軍新四軍的手裏。接着蔣介石的走狗——皖南事變圍剿新四軍的罪魁之一顧祝同，也對淪陷區真正的人民發「通告」了，通告「淪陷區同胞應力持鎮靜，謹守秩序」。所謂「力持鎮靜」，就是說，不准人民起來。要人民「謹守」什麼「秩序」呢？就是敵偽統治的「秩序」。中國人民受了日寇的蹂躪時間已經很久，中國人民熱血滿腔，都要起來對日寇一洩自己的悲憤與仇恨，要起來當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但是，這個與敵人同心同德的蔣介石，不但不准人民動手，而且不准人民動口。中國人民在日寇鐵蹄下還屍橫遍野的時候，八月十五日，蔣介石就竟公然宣稱要愛護敵人了。蔣介石對於國內人民實行血腥的大獨裁，當然是決不會對別國的人民能夠有什麼「仁義道德」的。他能夠對於他國的統治者奴顏婢膝，但決不會對於他國的人民有什麼「愛護」。蔣介石十五日對於敵人一大套「仁義道德」的廣播，只是表示他對於日本法西斯的一種默契，一種關懷。那時，敵酋岡村甯次已拍電給蔣介石：「他已從南京城撤到郊外，但留下骨幹軍以維持城裏的和平秩序，現只等待中央軍（即蔣家軍）去接受首都」。很明白，這是蔣介石與敵寇心心相印、互打招呼的結果。也就是在十五日那一天，蔣

新委的南京市長馬超俊居然這樣無恥地告訴記者們：「我現在可以很驕傲的告訴你，我的部下在那裏作了『艱苦』的工作，一週以前，這還是祕密，而現在你可以發表了……陳公博向最高統帥部建議：他負責保衛（按：妙在說是『保衛』）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區，並說我在這地區的三十六萬軍隊負責保證將國都與上海並杭州完整地歸還到政府的手裏，在我政權下的一百萬軍隊，正等着你下改編的命令」（上述引文，均見合衆社電）。以漢奸向蔣介石建議協同反共爲『驕傲』，以僞軍能够替蔣家『保衛』江山爲『驕傲』，以僞軍很多爲『驕傲』，而且說得那末津津有味，難道這批蔣家黨徒還知有天下人間的羞恥事嗎？

毛澤東——共產黨認爲抗戰是人民的力量，抗戰的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抗戰的勝利必須是人民的勝利，抗戰結果的天下，既必須是再沒有帝國主義壓迫、又必須是再沒有封建主義壓迫的人民的天下。就是說，抗戰的果實必須歸給人民，中國必須完全終結大地主與大買辦的統治。因此，就主張絕對必須徹底摧毀敵僞在中國一切軍事的、行政的、特務的機構，徹底消滅敵僞任何武裝的與非武裝的力量以及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義思想。只有這樣，抗戰的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中國才能有真正的獨立和平與民主，中國民族才能真正避免奴隸的命運。但袖手旁觀坐待勝利的蔣介石和蔣家統制的國民黨則堅持抗戰的勝利只能是四大家族及其一夥的勝利，抗戰結果的天下，仍必須是再有帝國主義壓迫與封建主義壓迫的四大家族壟斷的天下。就是說，四大家族要竊取全部抗戰果實，而人民仍然必須是在封建奴隸主與大洋行買辦的統治之下。因此，日本一投降，蔣介石就首先着急用千方百計去保護敵僞原來在中國一切軍事的、行政的、特務的機構，不許人民動手去消滅敵僞各種武裝的與非武裝的力量，而且視敵僞的法西斯主義爲至寶。蔣介石要把敵僞的軍事的、行政的、特務的機構及其統治的秩序原封不動地由他接受下來，變爲蔣介石法西斯的軍事的、行政的、特務的機構，變成蔣介石統治的秩序。蔣介石只夢能够達到自己

的目的，不惜採用任何手段，不惜認賊作父，不惜將中國從東帝轉送給西帝。這就是當時關於受降問題全部鬥爭的焦點。當時蔣介石的復興特務頭目戴笠給上海特務的信是這樣寫的：「滬人心極浮動，共黨並已具相當勢力，如非策反得手，尤以周佛海之協力，當難以長鞭克制一切也」。戴笠這封信表現了當時蔣賊對於自己命運作了生死的鬥爭。如果蔣賊沒有先得敵偽的協力，人民就會馬上當起那裏的主人，上海是這樣，其他地方當然也更是這樣。這就說明了：爲什麼敵人宣佈投降之後，第一批從蔣賊那裏得到陞官的，乃是一大批漢奸賣國賊，有的叫做什麼「總司令」，有的叫做什麼「總指揮」，有的叫做什麼「挺進軍司令」，有的叫做什麼「先遣軍司令」，有的叫做什麼「綏靖司令」，有的還保留敵偽原來所加的官名，繼續擔任原來在日寇統治下的奴隸總管的職務。那時一個外國報的訪員稱：「各佔領區的傀儡官員正忙於想辦法從日本人方面「光榮地」轉到重慶方面去」，漢奸賣國賊都帶冠相慶，拍手稱快，他們在蔣介石面前，不但沒有罪，而且功推第一了。

蔣偽這種合流有什麼可怪的呢？這是沒有什麼可怪的。新華社記者八月十四日的談話把這個問題概括得很好：「誰都知道，今日的南京偽政權，就是代表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的一個雙生子。它同重慶蔣政權的分歧，只是在對日態度問題上（按：所謂「對日態度問題」，根本上乃是上述蔣日買賣的價格問題），它們對於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則是完全一致的，它們都絕對仇視中國人民及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它們最害怕中國人民的覺醒與解放，最痛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真正愛國的民族戰爭。不論是南京偽政權，或是重慶蔣政權，都是徹頭徹尾反人民的封建、買辦、法西斯的反動政權。也正因爲如此，所以即在它們過去暫時對立的情況下，仍然暗中保持着它們的親屬關係，並且經常以同情的態度，互相注視着對方反人民與反共的一切活動。現在，日寇就要倒台了，它們中間的分歧也就要消失了，

因而，它們又要合在一塊，共同反對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事實上，原來這兩種政權的同時存在，又正是蔣介石在日本與英美之間所採取的兩足踏雙船的政策之巧妙運用，汪精衛的到南京，人們早就流傳那是蔣介石的政策。這兩種政權的各種統治機構，實際也沒有任何的區別，凡是南京有的，重慶也有，凡是重慶有的，南京也有，以至連機構的名稱都一樣，如果有個別不一樣的，例如在偽政權那裏，叫做「新社會」，在重慶蔣政權那裏，叫做「三寅團」，但合流起來也毫不困難，換一個招牌就是了。至於國民黨的招牌，當然就完全不要換，乾脆合流就萬事大吉了。如果敵偽組織在投降時有被人民破壞或摧毀的，蔣介石就趕快修補或重建，例如十月十八日，國民黨政府內政部公佈所謂「收復區清查戶口辦法」，對於最下層的政治機構，有如下的規定：「對當地原有（按：即指敵偽原有）保甲組織，應斟酌實際情形，盡量利用，已被摧毀者（按：即已被解放軍民所摧毀者）應重新編制」。至於人員，他們許多本來是在兩邊通用的，有時在汪政權那裏辦公，有時在蔣政權那裏辦公，本來沒有隔閡，合流起來更省得彼此奔跑了。於是，正如上海一個報紙的通訊所寫「他們（按：指淪陷區人民）眼看過去敵人漢奸的走狗，一躍而為抗戰英雄，過去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一變而為地下工作者」。

但是，蔣介石很清楚，他的軍隊離開重要的淪陷區既是那末遠，而偽軍是不堪人民解放軍的一擊的。這種蔣偽的合流，如果沒有日寇直接的實力援助，那是不能成功的。因此，蔣賊於八月二十三日經過何應欽派員向日軍投降降代表今井提出受降補充事項兩項，轉知岡村甯次，內容如下：

「甲、中國境內之「非法武裝組織」，擅自向日軍追求收繳武器，在蔣委員長或何總司令指定之國軍接收前，應負責作有效之防衛。乙、根據現有「股匪」攻開封、天津、鄆州等地，該地日軍對於現有各該地之虛炳勳、門致中等部，採取旁觀態度，未事防衛。關於此事，

目前應特別注意，並應依中字第四號備忘錄，迅即將指定之日軍，集中於上述「股匪」進攻之地方及其他各地，作有效之防衛。如果各地或中字第四號備忘錄所列之其他各地，在蔣委員長或何總司令指定之國軍接受前，為「股匪」所佔領，日軍應負責任，並應由日軍將其收復，再交還我接受部隊。」

什麼是「股匪」呢？前面敘述蔣介石在十年內戰時期的罪惡，我們已指出了：所謂「股匪」者，不是別的，乃是歷來中國反革命的統治者對於革命的人民所加的稱呼。太平天國受過這樣的稱呼，孫中山受過這樣的稱呼，在十年內戰時期，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受過這樣的稱呼，在抗日戰爭中，日寇這樣稱呼偉大的抗日人民解放軍——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而這時蔣介石的匪徒們又跟着日寇一樣，這樣來稱呼我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了。蔣家走狗何應欽這個通知，就是要日寇在中國領土內對抗日的中國人作「有效之防衛」，要日寇幫助偽軍防衛抗日的中國人對偽軍的襲擊，要日寇向中國人「收復」所退出的中國領土。愛國的同胞們想一想吧：這些蔣介石匪幫還能够算得上是中國人嗎？在歷史上，不是只有吳三桂這些很少數的人可以和他們相比擬嗎？由於蔣介石的申請，那已宣佈投降的日寇就敢於繼續在中國人民頭上逞兇了，就敢於繼續向人民解放軍作戰了。日寇居然和蔣軍一起站崗，而有些日寇居然揚言：「日軍將要加入中國，變成中央軍了。」

另一方面，蔣介石又很清楚：已宣佈了投降的日寇，寇心是不穩的，而且不方便公開大量地與長期地繼續在中國作戰，所以，蔣介石纔纔算定他最後的靠山是美國帝國主義。蔣介石認為：美國帝國主義可以利用「盟國」的名義，幫助他為所欲為。蔣介石要日寇守住佔領區，向人民解放軍無情作戰，這是一步，沒有這一步，蔣介石便毫無可爲了。利用這一步，蔣介石同時就緊接着另一步，即由美國帝國主義替他運兵，並由美軍儘可能去接替日軍所擔任的崗位。赫爾利和聯

特適這類美國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欽差，本來是在號令蔣介石走路的步伐的，他們用一切方法去求實現這類便利於美國帝國主義代替日寇獨佔中國的計劃。顯然，如果沒有日僞與美國帝國主義的協力援助，蔣介石在強大的中國人民力量面前，任何竊取抗戰果實的企圖，便將不可能。

(二) 一面談判，一面進兵，美軍也趕上來

蔣介石一切步驟，環繞着一個目標——就是反人民的內戰。保存敵僞的統治機構，這是內戰的一着棋子；要求日寇對抗日的中國人民作『有效之防衛』，這是內戰的一着棋子；歡迎美國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這又是內戰的一着棋子，而以最後這一着棋子對於蔣介石在這個新歷史時期爲最決定的棋子。蔣介石跟着這些棋子，一步一步地把他在那峨嵋山上所準備的武裝爪牙向着解放區進犯。同時，在各地方放出烟幕，說是『重慶、昆明、成都三個地方發生暴動，殺死美國人多人』，西安更藉此宣佈戒嚴，緊急動員軍事力量，防範所謂『共黨暴動』，監視八路軍辦事處。這都是準備全國大流血的薪殘忍陰謀。毛澤東與共產黨號召全國人民爲和平與民主而鬥爭。朱德代表人民解放軍向蔣介石提出了消滅敵僞制止內戰的完整計劃。蔣介石知道他的反革命內戰計劃是『犯天下之大不韙』。他知道中國人民的意圖乃是獨立、和平與民主，而蔣介石這一個內戰的計劃却完全相反。美國帝國主義者也很知道：中國人民不贊成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中國人民趕走了日本帝國主義，決不會歡迎美帝國主義經過蔣介石的內戰計劃來獨霸中國。於是，蔣介石與美帝國主義應用了遮眼法，由蔣介石三電邀請毛澤東到渝，『商討國家大計』。

蔣介石有他的一套想法：爲要進行反革命的內戰，先要僞裝得像是要和平的樣子。他計劃：三電邀請毛澤東，如果不來，那末，就宣佈共產黨應負內戰的責任；如果來呢，就可以利用談判

的時機加緊內戰的進兵。但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彌天大勇」的毛澤東到重慶了，這是出乎獨夫蔣介石的意料之外的。蔣管區的人民以最真摯最動人的熱情，歡迎了這位我國有史以來最傑出的人民代表和英雄人物。不顧一切苦難、獻身為我們祖國人民解放而奮鬥到底的毛澤東到重慶，感動了無量數的中國人。毛澤東和蔣介石的這一個會見，曾經使人回憶起孫中山和袁世凱會見的故事。可以稍比一比。那時，袁世凱正拿着一軍令政令之統一」的招牌，計劃大規模的內戰。孫中山和他會見，結果發表了一個通告，聲稱：「大總統勞心焦思，幾廢寢食，久欲聯合各政黨魁傑，捐人我之見，商榷救濟之方，適孫中山、黃克強兩先生先後蒞京，過從歡洽，從容討論，殆無虛日，因協定內政大綱八條……」。這時，蔣介石也正拿着「軍令政令之統一」的招牌，計劃大規模的內戰。毛澤東和他會見，結果發表了一個公報，就是在雙十節簽訂的「國共代表會談紀要」，有十二條，其中幾條是成立了協定，幾條沒有成立協定。協定的重要一條，叫做「堅決避免內戰」。蔣介石代表提出的一次修改稿，曾經企圖把共產黨代表提出的這個明確的綱領改成「永息內爭」的抽象與模糊的辭句，但沒有改成。蔣介石代表被迫簽訂這一條，並被迫承認召集政治協商會議以及其他等等。但是，一切最具體的「堅決避免內戰」的步驟，如受降問題，承認抗日的人民武力問題，承認解放區的民主政府問題，蔣介石嗜任袁世凱那塊「軍令政令之統一」的內戰、獨裁、賣國的臭招牌，不管共產黨代表提出如何委曲求全的辦法，一種方案不行，又一種方案也不行，再又一種方案也不行。蔣介石堅決拒絕對這些具體的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成立任何合理的協定。然而這個公報，却表示了代表人民的毛澤東在政治上的完全勝利，反人民的蔣介石在這個鬥爭中完全輸了。公報的內容，充分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是真正願意和平的，而要打內戰的乃是蔣介石和國民黨，因此，就說明了內戰的責任是屬於蔣介石。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代表的孫中山和獨夫袁世凱會見，曾存在了不少的幻想，結果吃了大虧；而中國工人階級

代表的毛澤東和獨夫蔣介石會見，並不受任何欺騙，因此，就在政治上孤立了蔣介石。

當然，蔣介石還是按照他的政治路線去辦事。蔣介石被迫在雙十協定上簽訂了的「堅決避免內戰」的條文，按照蔣介石的讀法，就是「堅決進行內戰」。正當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的時候，蔣介石把他那罪惡的「剿匪手本」送給各方面的蔣家軍和雜牌軍。十月八日，焦作附近落下了一架迷失方向的飛機，機上有「剿匪手本」兩冊及蔣家軍委會九月十七日的代電一封，代電的原文如下：

「吉縣第二戰區團長官勳鑒：茲附寄剿匪手本兩冊，請查收。中正申後（即九月十七日）」。

十月二十四日，胡宗南給高樹勳一電，有以下內容：

「即刻到、機密，高副長官機密：奉委座西元（按：十月十三日，即國共兩黨發表雙方「會談紀要」的次日）勇電開：「……此次剿匪爲人民幸福（按：讀爲人民災難）之所繫，務必本以往抗戰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訂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其功於國家（指蔣介石——四大家族的國家）者，必得膺賞，其遲滯貽誤（指內戰不力）者，必執法以罪，希即飭所屬剿匪部隊官兵一體悉遵爲要」。等因，除剿匪手本另行分發外，希轉所屬一體悉遵。」

八路軍新四軍向敵偽收復失地，而蔣介石則向八路軍新四軍收復失地，這本來是蔣介石與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拿手戲，現在就演得更起勁了。一直到十月間，蔣介石已動員了八十七萬軍隊進攻解放區，到十一月間，已動員到一百二十萬了。此外，還有偽軍三十五萬，日軍三十五萬。蔣日偽的槍口協同對着解放了的中國人。在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從外國買來的飛機不拿出來，大炮不拿出來，這時就都拿出來，向着解放區人民的頭上驕傲他有殺人的新式武器了。儘管江南的

新四軍遵照雙十協定退出原有解放區，老百姓聽到戰士們唱着『俺和我們過不去，不要傷害老百姓』的歌聲都感動得哭起來，但蔣介石匪徒們漠然無動於中，既那末無情地和解放軍戰士過不去，又那末殘忍地傷害老百姓，燒殺、搶掠、姦淫，總之，凡是敵寇應用過的方法，他們都仿倣應用得有過之無不及。

美國軍隊也趕上來了，九月三十日第一次在天津登陸，以後又在青島及其他地方登陸。美國帝國主義者認為抗日的中國八路軍不合格在中國領土內接受自己所包圍的日寇的投降，而倒是美國的軍隊跑到中國的領土上接受那為抗日的中國八路軍所包圍的日寇的投降，為更『合格』。並且，連已被八路軍解放了的煙台，美軍也竟然想在那裏登陸，覺得中國的領土要由美國的軍隊駐防，才是合乎美國的『國際公法』。雖然因為八路軍的嚴厲拒絕，美軍沒有登上煙台，但不久即強佔了一度為八路軍所解放了的秦皇島，並配合蔣軍進佔那已解放了的北戴河。美軍在華北各地登陸，就是為的接上日寇的任務，對抗日的中國人民『作有效之防衛』，美國帝國主義就又利用這些登陸的據點，經過美國的空軍與海軍，源源不絕把蔣軍從遙遠的南方運送到華北各地內戰前線，美軍並替蔣軍護路，直接協助蔣軍向解放區進攻。當時一個美國報紙會寫着：『在中國戰鬥當中，有着美國的部隊、船隻與飛機，且已對重慶方面負有義務』。至於由『中美合作所』所訓練的特務部隊變成為進攻華北解放區的先遣隊，則更不用說了。美國帝國主義者很熟練了偽善的工夫。例如：十月十日魏特邁在重慶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宣稱美國將不再運送國民黨軍隊到東北。可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又宣佈說美國第七艦隊把杜聿明的部隊送到葫蘆島去。除了運送原來所武裝的蔣軍到內戰前線之外，美國帝國主義同時又忙於從美國重新運來各種美式武器，以加強蔣軍內戰的武裝。但按照美國帝國主義軍閥魏特邁的說法，這些都不叫做干涉中國內政，更不叫做武裝干涉，例如美軍替蔣軍打先鋒進攻那已解放了的山海關，這個無恥的外國屠夫就叫做是：『美

軍僅僅去該地長城觀光」。十二月初，美軍炮轟冀東盧龍一個村落，美國一個駐華軍閥竟認為「完全符合保護美國人生命財產的美國政策」。美國帝國主義者已毫無忌憚地認為中國就是它的殖民地。而這正是蔣介石及四大家族的利益。

(三) 集中人民的仇恨

蔣介石進行反人民的內戰，向解放區進攻，如前所述，是為的要在全國保持封建奴隸主與大洋行買辦的統治，要在政治上經濟上達到其宰割全國人民的目的。蔣介石不只是和解放了的人民結仇，同時，是更進一步地與全國人民為敵。四大家族及其與黨在日本投降後，大批湧到原來的敵佔區，依靠日偽的保護，不但霸佔了本來是人民血汗結晶而又應該成為人民勝利品的全部敵偽財產，並且以新征服者的派頭，對於那裏人民還來一個大規模的新劫掠，而蔣家「法幣」對於偽幣的強制比價（一個蔣幣比兩百偽幣）更是一件普遍的大劫掠，變成財富的大轉移，使得連一個親蔣的報紙都不得不一度嘆息過：「無數千萬的人民都會為勝利狂歡過，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大家不得聊生」。同時，在原来的蔣管區，蔣介石的政治統制與經濟壓迫也更驕橫了。不論在新蔣管區，或在老蔣管區，工人、農民、獨立的工商業者、小資產階級，都更加不得聊生，而自由資產階級（即毛澤東在最近的大革命文告中所指的中等資產階級）曾經夢想在抗戰勝利後可以分點油水，現在也由四大家族的獨佔勝利果實與美貨的僚潮水一般湧進來，感到失望與破產的威脅。蔣介石的內戰政策，使蔣管區的所有人民痛苦又加上痛苦。而美國帝國主義的武裝援蔣內戰的政策，目的正是要把中國變成它獨佔的殖民地，新的民族危機，緊接着抗日的勝利，就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了。所有這種情況，就迫得中國人民重新團結起來，重新形成了一個包括工人、

農民、學界、獨立工商業者、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開明士紳、海外華僑和少數民族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進行生死的鬥爭，而蔣介石就在兩個戰線上和中國人民作戰；一個戰線和解放區人民作戰，一個戰線和蔣管區人民作戰。人民解放軍在華北華中與東北的收復失地的大進軍，在各個戰線上的大量殲滅敵偽抵抗，而著名的邯鄲大捷，更是標誌着這初期自衛戰爭的勝利。毫無疑問，美蔣原來的計劃已受了很大的打擊，他們遇到了強大的不可戰勝而且能够戰勝一切敵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另一方面，在蔣管區，則湧起了疾風暴雨般的反內戰運動。十一月間，重慶成立了反對內戰協會，呼籲各界以行動制止內戰，號召工人、學生、商人及納稅人舉行罷工、罷課、罷市及拒絕納稅，號召國民黨軍隊官兵拒絕內戰，反對美政府武裝干涉中國內政。蔣介石的黨徒無恥宣傳過：將借美國的原子弹來毀滅中國解放區；但在那會上，却表現了真正中國人的聲音：「中國人民反對外國干涉中國內政。美國政府不要因原子彈而自傲，中國人民的公意比原子彈力量更強」。昆明的學生們首先舉行了著名的反內戰的示威遊行。蔣介石的走狗關麟徵在那裏公然聲言：「學生有開會的自由，我也有開槍的自由」。『匪』的字號，也加在要求和平的學生們的頭上了。蔣介石的大批軍警公然闖入學校殺人。這就是著名的十二月一日的昆明慘案。蔣介石隨後即給了關麟徵一個『忠勤勳章』，以獎勵他的屠殺有功。但人民反內戰反美國干涉內政的怒火却因昆明慘案的爆發而更加到處燃燒了。

反對蔣介石的反革命內戰，與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武裝干涉，這是全體中國人民的鬥爭。毛澤東遠在日本投降之前，就已告訴全國人民必須堅決反對代表美國帝國主義的赫爾利政策。在「論聯合政府」上，毛澤東已警告了斯可比在中國出現的可能性，並準備堅定的鬥爭。毛澤東深信已覺悟了的並且久經戰鬥的中國人民一定能够戰勝任何帝國主義者。「我們堅決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者——赫爾利之流，因為這些老爺的目的，和中國獨夫民賊的目的完全一致，要在中國人民身

上喝取鮮血。這些帝國主義者如不早日縮手，敢於向中國人民頭上動一個指頭，那他們就將從中國人民獲得其應有的教訓」。事實很快地證明了：毛澤東堅定的正義的政策，鼓舞了中國人民鬥爭的勇氣，並獲得了美國人民的援助，結果就使得赫爾利、魏特邁獲得其應有的教訓。中國人民的鬥爭迫得臭名昭著的赫爾利、魏特邁從中國滾蛋。這是毛澤東正義的政策之勝利。於是，美國帝國主義在強大的中國人民運動面前，在世界正義人類的壓力面前，採取了新的策略，由馬歇爾代替赫爾利，裝着「中立」「調停」的面具出馬。硬的走不通，就來一個曲線。馬歇爾便與蔣介石唱了一齣新變奏。

(四) 公開的「停戰令」，秘密的作戰令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日，蔣介石向國民黨軍隊，毛澤東向解放區軍隊，分別下了停戰令。停戰——和平，這是全國人民的希望，也是中國共產黨不斷的呼籲。毛澤東的命令是眞下，但蔣介石呢？一月七日，即停戰令發表前三天，蔣介石的祕密命令（即所謂委座子陽電）如下：

「政治協商會日內開會，我軍應於停戰令未下前佔領有利地點。已下令前進至某地而尚未到達者，應催促其星夜前進。其尚未繳械地區，應速令當地駐軍施行繳械，免被奸算利用，行動務希祕密迅速，勿資共方藉口。」

一月十二日，孫運仲向所部轉達的蔣介石手令如下：

「馬歇爾、張羣、周恩來三人會議，商議在政治會議前舉行全面停戰，停戰令於（十日）晚即可下達，各部在停戰令未生效前應速搶佔戰略要點，尤其是熱河方面，最好於停戰前佔領承德，否則亦必迅速搶佔古北口、建平及凌源爲要」。

蔣介石一面下公開的停戰令，一面下祕密的作戰令。公開的叫中共領導下的部隊，祕密的依然是叫「好軍」。『佔領有利地點』、『搶佔戰略要點』、『星夜前進』、『祕密迅速』，一片殺氣騰騰，這就是蔣介石停戰令的真相。另外，人民解放軍後來繳獲的許多文件，也完全說明了：從停戰令發佈的那二天起，蔣軍在實際上所佈置的，乃是作戰，決不是停戰。例如：新四軍在如皋陳家莊戰鬥中所繳獲的蔣軍四九師一個營長的日記，在『六月十一日』項下所記就是這樣：『由團長處得悉七十一軍十五日攻如皋，二十一軍十五日攻天長，一百軍十五日攻姜堰，二十五軍十五日攻擊昭關……等消息』。蔣介石的所謂『停戰令』，乃是蔣介石作戰與馬歇爾援蔣的一種『政略』，停戰令的本身，就是作戰的一種新部署。蔣介石與美國帝國主義特別是要利用停戰令以便從西南輸送蔣軍更大的兵力到達東北與華北，去和人民解放軍作戰。人民解放軍於三十六年二月二日臺縣戰役繳獲蔣介石在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侍天字第七十號密令』中所謂『本年一年（即指三十五年一月起公布停戰令以來的一年）之剿匪軍事』，『足以配合政略之方針』等等，更把蔣介石所謂『停戰令』的把戲完全揭穿了。

（五）有開口供給諾言的自由，但重要的，是他隨時有開槍供給子彈的自由

蔣介石的另一個『政略』是政治協商會議。如前所述，這是蔣介石在和毛澤東談判時被迫承認的一條。蔣介石本來想避免它實現，一拖再拖，連蔣介石元旦演說還只專門替袁世凱的『軍令政令之統一』作註解，一個字都沒有提到這會議，但是，人民迫得太緊了，蔣介石與他的主子馬歇爾配合蔣軍的新調度，也就來這末一個『將計就計』的『政略』，就在這一月十日，同時宣布

了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

包括左中右三個方面社會階級的政治代表組成了這一個會議。以無產階級為首的人民大眾的政治代表，綱領是革命的民主；自由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綱領在基本上是改良的民主；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綱領是法西斯獨裁。基本政治集團是三個，左的共產黨，中的民主同盟，右的國民黨。民主同盟這時已發生了分化：日本投降之前，代表四川一部份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政黨——青年黨曾經參雜在民主同盟裏面，日本投降之後，那個爲汪精衛食客並與南京一批偽道賊詩唱和的該黨頭目會琦回到重慶，就引領該黨一批嘍囉公開附屬於蔣介石的國民黨集團，脫離民主同盟。共產黨與國民黨之外的所謂第三方面，包括有民主同盟、青年黨、和所謂「社會賢達」，除了右翼青年黨是蔣介石公開的御用黨外，當時民主同盟的代表與所謂「社會賢達」，事實上也都有左中右：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或站在左的方面，或站在中間偏左，自由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站在中間，但也有右翼份子站在中間偏右。和大地主及財閥密切聯繫的（例如：當時還留在民主同盟裏面的、與政學系財閥之一張嘉璈是同胞兄弟的張君勱，又例如：所謂「社會賢達」、與政學系財閥之一吳鼎昌在歷史上密切合作的胡霖，又例如：冒稱無黨無派而實際和CC集團有關的傅斯年）或者本身就是大資產階級的一員的（例如：冒稱無黨無派而實際是國民黨員的錢永銘，素來擁蔣親蔣的王雲五）政治代表，則站在右的方面，爲蔣介石國民黨集團各種形式的同盟者或直接助手。

代表各階級的一切政治集團在政治協商會議上都力求自己佔上風。全國人民於停戰令公佈之後，聚精會神，注意這會議內的階級角鬥。各黨派除了在會議內鬥爭外，並各於會議外企圖組織聲援。和平民主既爲全國人民的要求，因此，國民黨及其附屬品青年黨也都努力想在辭句上擦些「民主」的脂粉，希望有人喝采。素來標榜反對自由平等的蔣介石，在會議開幕時，忽然宣佈了

關於自由平等的四項諾言。國民黨本來不願準備政治協商會議真開，可是會議真開了，那些CC及復興的頭目忽然異想天開，想玩弄一次學生遊行來替他們喊叫幾個對他們有利的口號，不料弄巧反拙，重慶一萬多學生和民主教授的遊行，唱着民主進行曲，高呼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的口號，變成爲反對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和內戰的示威。

在會論中，一共通過了關於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在各種程度上有利於人民而不利於蔣介石的五項決議。但根本的、本質的鬥爭，是關於軍隊的問題。這是蔣介石封建買辦法西斯獨裁與人民大眾新民主主義政治的生死問題的鬥爭。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已把共產黨的原則和方案，充分說明白；第一，所謂「軍隊國家化」的「國家」，必須不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的國家，乃是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軍隊」則必須不是國民黨軍閥與黨閥的反人民的武力，乃是人民的武力。什麼樣的軍隊——是人民民主的軍隊，或是反人民軍閥的軍隊，這就決定了那國家的根本性質——是民主的國家，或是專制的國家。在我們這裏「軍隊國家化」的根本問題，乃是把國民黨軍閥反人民的軍隊，變爲人民的民主的軍隊。概括說來，「軍隊國家化」的根本原則，是國家民主化與軍隊民主化。第二，解決「軍隊國家化」的根本方案，就是：「什麼時候中國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出現了，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將立即交給它。但是一切國民黨的軍隊也必須同時交給它」，就是說：我們所謂「軍隊國家化」的前提必須是國家民主化，同時，軍隊民主化的問題又正決定了國家民主化的問題。但蔣介石的原則和方案和毛澤東完全相反：蔣介石的所謂「國家」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的國家，而他所謂「軍隊國家化」，就是要把人民的軍隊化到他所代表的這末一個反人民的國家裏面，而他的反人民的軍隊不但不能變，反而還要加強。蔣介石的方案是：「你先交出軍隊給我，我就給你以民主」。而他這所謂「民主」恰不是別

的，就是「絞殺」。把人民軍隊交給他，他當然就有絞殺人民的絕對自由。所以，蔣介石什麼頭項諾言，承認和平建國綱領及其他，一方面是由於被迫，一方面也是爲的「請君入甕」，以求釣出這人民的武力。蔣介石的御用囁嚅——青年黨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也就特別賣了氣力，他們的提案最重要的一句話，叫做「軍隊國家化實爲政治民主化之必要條件」，就是把他們的主子蔣介石的話重說一遍。

蔣介石決不會把他那反革命的封建買辦軍閥的軍隊交出給人民，而自動結束他那大地主大買辦的王朝；同樣地，對人民負責任的共產黨也決不會把由人民犧牲無數血肉而凝成的人民武力自動向蔣介石交槍，而使蔣介石得以對人民繼續自由屠殺。小資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擁護和平與民主，但自由資產階級的少數右翼份子，以至有些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少數右翼份子，他們不分別國家與軍隊的各種不同的階級性質，而宣佈一種抽象的超階級的「國家」觀念，但實際上他們正是有他們自己階級的具體的國家觀念。他們當中的對蔣介石所計劃的「你交出軍隊，我給你民主」的欺騙抱有幻想，因爲他們也戒懼人民的武力。有的抱有一種極端錯誤的想法，好像如果他們有幾個代表到蔣家政府裏面去，不問蔣介石的反人民的軍閥軍隊變不變，那蔣政府也就算是由獨裁到民主了。事實上，爲蔣介石封建買辦獨裁的根本工具——反人民的軍閥軍隊如果不變，蔣介石封建買辦獨裁的政權性質就必定絕對不變，因爲不可能有變。有的還想得更天真：最好經過他們一陣雄辯之後，就由他們來代表「國家」，接受蔣介石的軍閥軍隊，歸他們統率，但同時人民的軍隊亦交給他們，這樣，也就算是「軍隊國家化」了。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上早就警告過：「爲創造中國人民的軍隊而奮鬥，是全國人民及一切民主黨派的責任。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於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毛澤東這個嚴正原則的堅定政策，使得蔣介石的陰謀無所用其技，而自由資產階級的少數右翼代表與某些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少數右

裏代表的有害空論，確在實際上就很快地完全破產了。

蔣介石結束自己關於自由平等的諾言，先於政治協商會議的結束。蔣介石的早已封建買辦「國家化」了的反人民武力隨時有開槍供給子彈的「自由」，和蔣介石隨時有開口供給諾言的「自由」，並不相矛盾。在政治協商會議過程中，蔣介石這兩種「自由」是同時並進的。前面已說到蔣介石在停戰令的背後方面，也是真實方面，是加緊佈置向解放區的人民作戰。同樣地，蔣介石在政治協商會議的背後，也是加緊佈置向解放區的人民作戰。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當中，蔣介石衆養的武力之一種——特務已在「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上，對於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的發言與羣衆的聽講，實行鎮壓的「自由」。後來，協進會選徒講演會址（即滄白堂）「以避其鋒」，可是蔣介石特務們的「自由」却再接再厲了。他們狂呼「擁護國民黨」，「打倒異黨」，「打倒各黨各派」，「打倒民主」……但這不過是口叫的自由而已。拳頭的自由接着來了，刀子也自由出鞘了。協進會的記者在路上遇到特務綁架，特務口稱：「奉命逮捕，請值價點」。在毒打一頓之後，特務又揚言了：「奉有命令，警察不得干涉」。有些政協代表的寓所也來一個被搜查的「自由」了。但是，照蔣介石自己說來，這一切是否就是不實現「諾言」呢？蔣介石的「民主代表」邵力子當時答覆人，說得很明白。他「斷然否認那些搗亂會場的是國民黨特務」。同時，他給他們辯護：「他們喊的口號，也是申述『民意』呀。」他勸協進會同人不要再開會了。他說：「聯合國大會也沒有看見有『聯合國大會協進會』呀！你們還是休息幾天好」。蔣介石原來「諾言」的實際內容，這不就很明白的嗎？蔣介石原來允許的，只是蔣介石的軍隊與特務有自由，而蔣介石黨徒上述的行動，就是實現蔣介石所謂「民意」的自由呀！

蔣介石的政協閉幕辭，否定了蔣介石的開幕辭。蔣介石的閉幕辭，是他的諾言的「閉幕」，並且是他認為政協一切有利於和平民主方面的決議也應該同時「閉幕」。最重要的是以下幾句

語：「我們要知道：必須有確實的統一，才有真正民主可言。我相信：我們國內，此後不會再有「私有」（按：指人民所有）的武裝軍隊，「分立」的地方政權（按：指解放區的人民民主政權），來妨礙政令與軍令的統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蔣介石在政協會的「政略」，是企圖取消人民的武力與人民的政權，以達到他那反人民的專制的統一，寥寥幾句，已肺肝如見。

袁世凱總說他「私衷抱斐灌口，長爲老農以沒世」。蔣介石又撫撿了袁世凱的牙慧，在閉塞辭裏面，也說他「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呢？他實際是說，他對於政治解決問題並不感興趣，他有興趣的，是軍事解決。不錯，不少人總還是好心善意地向好轉方向去想的，這是很難得的，中國人民飽受了憂患，很想過一下太平的日子，這是一種人情，而且對於蔣介石含有極寬大的容忍。所以，停戰令與政治協商會議諸決議對於人民簡直有意外的歡喜，有點像「過屠門而大嚼」的情景。雖然已有協進會滄白堂這類事件出現，人們總還免不了慶祝一下。蔣介石說：好！我是弄假，你們竟要當真？於是就當人們慶祝時候，來了一個狠狠的打擊，這就是較場口血案，連參加政協的代表都負了重傷。時間是二月十日，離開政協閉幕不過十天。爲什麼蔣管區的人民不能自由去把蔣介石看管起來，審判他背叛政協的罪惡呢？沒有別的，就是因爲蔣介石在那裏有反人民的武力，而人民在那裏却没有自己的武力。歷史寫得無情得很：蔣介石反人民的軍隊並沒有化到政治協商會議所擬議的「國家」裏面，而是蔣介石要把政治協商會議化到他那反人民的軍隊的槍口裏面。根本的問題，是蔣介石這個大買辦大地主的全部統治機器——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龐大機構沒有因政協起了變化，更說不到有什麼破壞。蔣介石馬上指揮他這全套在抗戰中有新的增補、並且和敵僞合流起來的統治機器加緊轉動起來，背叛政協，和人民作戰，是駕輕就熟，毫不費事的。

政治協商會議的幾項決議，在實質上，否定了蔣介石的反革命內戰政策與以國民黨一黨專政為形式的法西斯獨裁，否定了蔣介石的封建買辦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訓政「法統」，因此，這是人民的政治勝利，蔣介石國民黨的政治失敗。但另一方面，政協及其決議，同時是代表各階級在政治上的一種妥協。例如：承認國民黨十年前「機變戰道」的所謂「國大」代表，便是人民一種委曲求全的妥協。中國人民那時希望有還末一種妥協，以便取得抗戰之後某些程度的休息。自由資產階級的右翼分子幻想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的並在人民中散佈影響。所以，共產黨參加政協與擁護政協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經常說過：蔣介石是一個極端狡猾的反革命傢伙。在普通羣衆中暴露蔣介石賣國、獨裁、內戰的陰險野心，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人民如果沒有再經過一番實際的教育，便不可能消除許多的幻想，而政協會議對於人民便是一種有益的教育。在政協決議通過和公布之後，各階級對於這個結果的看法，顯然是很不相同的。毛澤東與共產黨認為如果沒有人民的強大力量與人民百折不撓的奮鬥，那末，這些決議是不可能有效用的。自由資產階級右翼分子則以為如此可以不用人民的革命，是合乎他們改良的民主的「理想」。以獨夫蔣介石為首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則在被迫承認這種與人民的妥協之後，馬上覺得這種妥協是上了人民的當，覺得這次「政略」不但沒有打到人民頭上，反而打到他們自己頭上。蔣介石很懊悔自己承認政協決議的孟浪，他曉得人民想利用政協去對抗蔣介石封建買辦的統治，而且政協有利於人民的各項決議對於蔣介石統治確實帶有危險性。於是蔣介石的一批孤羣狗黨就着急得發瘋，進行翻案工作。這就是蔣介石在國民黨二中全會所公開號召的：「就其學學大端，妥籌補救」。

自由資產階級關於自上而下的改革幻想，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幻想，很快地就受到了蔣介石粉碎的打擊。在清末戊戌政變時候，有人告訴光緒皇帝：「開議會要不得，因為那樣就民有權，

「君無權了」。光緒回答說：「我只要救中國，民有權，君無權，有什麼害處呢？」當時大地主大賈辦的集中權力是在慈禧太后手裏，並不在光緒手裏，所以光緒也樂得如此說。但反人民的最兇暴的大獨裁者——蔣介石可就不那末說了。自由資產階級容納君主蔣介石，可是君主蔣介石容納不了自由資產階級。蔣介石是說：嚇！救什麼中國？我即是中國，中國即是我，民有權，我無權，那成什麼話？趕快把那些主張民有權君無權的人，也都殺了吧！

（六）最後地撕碎了停戰協定與政協決議，發動了 冒險的戰爭

蔣介石在政協閉幕辭裏面說過：「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議一切的決議，確保和平團結的一貫精誠……」。蔣介石的「遵守」，就是叫做背叛。什麼是蔣介石「遵守政協決議」的「在朝」方法？這裏「就其犖犖大端」，舉出若干，而且還只是「遵守」的開始：

第一，法西斯的恐怖：上述鞍場口血案不過是第一回的「示範」。接着是二月三十日，北平的蔣介石特務匪徒公開狂叫反共口號，搗亂軍事調處執行部；又接着二月二十二日，重慶的蔣介石特務匪徒組織反蘇反共示威，搗毀新華日報及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報的營業部；又接着三月九日，哈爾濱的蔣介石特務匪徒暗殺民族英雄李兆麟；……諸如此類的大小恐怖事件，層出不窮地在各地方表演出來。

第二，法西斯的煽惑：蔣介石的「邏輯」，仍然是只准蔣介石的匪徒動手，不准人民動口。人民對於鞍場口血案剛表示抗議的時候，蔣介石的匪徒們在國民黨中央日報的社論上即對人民的

抗議表示『憤慨』，並號召他們那般匪徒『化憤慨爲意志』，公開了他們對人民新的大殺機，並宣稱這種殺機就是他們的『黨的新生之機』。爲着對抗政協的和平建國綱領，蔣介石的匪徒們重新提出他們的法西斯綱領：一個是以反蘇爲口號，挑撥第三次世界大戰，叫做『民族主義』；又一個是以反共反一切民主黨派爲口號，繼續掀起第二次長期的國內戰爭，叫做『民主主義』。蔣介石的匪徒們覺得他們拿出這種偽『民族主義』與偽『民主主義』的『宣傳』，便可以一手遮天，而第一個口號的實際，便是變賣中國爲美國的附屬國和殖民地，第二個口號的實際，便是繼續擴大與全國人民爲敵的封建買辦法西斯獨裁。

第三，法西斯的商員會議：政協的會議是一個，蔣介石爲的要壓倒它，推翻政協的動員會議；就來兩個：一個就是『國民黨二中全会』，一個就是國民黨包辦的、共產黨拒絕出席的所謂『國民參政會』。國民黨二中全会集中目標推翻政協憲草決議的國會制、內閣制和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則，堅持總統個人的法西斯獨裁與中央專制集權，同時，蔣介石的特務匪徒在美國帝國主義的鼓勵之下，於會中極力煽動反蘇的叫囂。在所謂『參政會』上，蔣介石親自出面，聲稱民國二十年五月間蔣介石的傀儡會議——『國民會議』（也就是蔣介石的代表會議）所製定的法西斯訓政約法的『法統』爲神聖不可侵犯，並捏造了一大篇所謂國民黨堅持東北抗戰的神話。但是蔣介石很不幸，他的活動和神話，却被解放日報一篇『駁蔣介石』的社論，揭穿得妖形畢露了。

這就是蔣介石的『忠實』、『堅決』、『遵守政協決議』的所表現的『在朝』方法的方面。其實何止『忠實』與『堅決』？而且是第一個積極！至於蔣介石『遵守政協決議』的『在野』方法又是什麼呢？實際上，這是主要的方面。這個『在野』的野，就是『戰野』的野，就是『殺人盈野』的野。蔣介石的所謂『停戰令』、『政治協商會議』，與馬歇爾的所謂『調停』，原來會圖的重心就是在準備這一個『野』字。

在停戰令公佈之後與政協期間，美帝國主義者加緊替蔣介石運兵。三月間，蔣介石經過美國海軍運三個軍到東北。在停戰協定裏面，蔣介石與馬歇爾把東北除外的用心，就是爲的作爲一個缺口，以便蔣介石一定兵力到達時，好從那裏打起。等到蔣介石的軍事部署得差不多的時候，馬歇爾就走開了，回到華盛頓，以便讓蔣介石出手，同時也準備新的方略。蔣介石覺得他和馬歇爾這個雙簧唱得不錯，四月九日，他就向美國記者表示「決心要消滅共產黨」了。從一月停戰令起到四月底五月初，蔣介石違反協定，已秘密調動了百餘萬的兵力，佈置新的全國性的大內戰，至於偽軍及非正規軍的調動數目還不算在裏面。又從華盛頓來到中國的馬歇爾在四月間不顧共產黨的抗議，幫助蔣介石繼續運送兩個軍到東北之後，又再提出，要再運蔣介石兩個軍到秦皇島青島，名義叫做：「接替防務，以便美海軍陸戰隊撤退」。中共抗議，可是結果是運去了三個軍，而美國的陸戰隊當然還繼續留在那裏幫戰爭的大忙。是的，關於東北，也有過一度的停戰協議，但事實上這依然是蔣介石在東北大戰的一種「政略」，很快就將蔣介石撕碎在地上了。五月間，四平街、長春作戰時候，馬歇爾一方面繼續由美國海軍運送蔣軍到東北（三月的下半月，代理美軍駐華總司令吉倫宣稱美軍助蔣運輸赴東北將不超過五個軍，但到六月，美軍已運送八個國民黨軍和十二個機械團到東北），一方面表示中共不退出長春，則他也不進行「調停」，但到了中共表示願意以退出長春換取東北停戰的時候，馬歇爾就又表示他沒有能力「調停」了。馬歇爾「調停」的第一步，是在主張「關內停戰」的掩蔽下，讓蔣介石在關外大打，而後第二步，再以蔣介石的關內大打去配合關外大打。五月十五日，蔣介石背叛了政協關於國防部組織的決議，委任了反共好戰派白崇禧與陳誠分任所謂「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以便計劃作戰。六月六日蔣介石所下的十五天休戰命令，一方面是全國人民反戰和蔣軍失利而被迫發出的，一方面却正是蔣介石準備即將舉行全國性內戰的信號。六月十四日，美國國務院由著名的帝國主義代表人員納斯以軍事援蔣

的法案提交美國國會，並比擬中國為美國附庸的拉丁美洲。蔣介石——這個美國帝國主義的狗奴才很乖覺，六月十七日，經過馬歇爾，他就不僅提出關外要幾乎全部九省；並提出關內要蘇皖邊區，熱察兩省，隨海津浦兩路，威海衛煙台兩港；而且公開承認馬歇爾是他的太上皇，提出要把中國內政的最後決定權交給馬歇爾。這就是所謂六月的「休戰談判」。這是指明：蔣介石佈置的關內大打已到了氣候了。利用談判，擴大進攻，到這時，蔣介石調到內戰戰線的兵力已達到兩百萬，比馬歇爾來華之前多了一倍，這是馬歇爾「調停」的標誌之一。馬歇爾「調停」的另一個標誌，就是：在馬歇爾來華以前，蔣軍用美械裝備的為三十九個師，這時則為五十七個師，而且全部用在前線，此外還有由美機編成的空軍與美艦編成的海軍。美國不但已完全恢復了赫爾利政策，並且援蔣內戰的實際行動，比起赫爾利在中國時已經有過無不及。於是，從七月間起，蔣介石的匪軍，一方面圍攻中原解放區，一方面進攻蘇皖解放區。當然，馬歇爾的「調停」手法也還是有的，正如上海一個雜誌上所說：「當宣化店（按：指中原解放軍指揮部所在地）岌岌可危之時，馬歇爾沒有說一句話；但當中原解放軍衝到襄樊可能入川入陝之際，馬歇爾趕忙派執行小組來調處阻止了。割掉一塊中共基地，馬歇爾不會出面說話；但倘若因割這塊基地而化了太多的時間，或會引起別的問題，或會叫國民黨反而吃虧，那馬歇爾是立刻便要「調停」的。不過，圖窮匕首見，已是很明顯的了。七月二十九日，美軍且直接和蔣軍聯合襲擊香河安平鎮的八路軍陣地了。八月二日，蔣介石的美製飛機公然轟炸民主聖地的延安。到了八月十日，這個美帝國主義的大騙子馬歇爾和另一個大騙子司徒雷登，因為自己的馬蹄已在中國人民面前暴露無遺，就索性發表一個聲明：「戰爭日益擴大，且有席捲全國……的威脅。國共兩方都願終止戰事，但仍若有若干立須解決的問題，尚未獲得任何協議。對於各該問題，雙方似已不可能獲得解決……」。這就是說：他們不準備再以「調停者」的面目出現了。正在這末一個期間，美蔣之間，進行了實質

大宗戰爭物資的談判，於九月一日，美蔣協同正式宣佈讓售八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之美國剩餘物資與設備（據說原值爲二十億美元，對蔣以低價出賣），以便蔣介石獲得屠殺中國人的工具。

蔣介石「遵守政協決議」的「在野」方法完全展開了。本來政協決議是給蔣介石留一個「自新」的道路的。但這個以四大家族爲主體的大封建奴隸主與大洋行買辦的蔣介石反革命王朝，不能夠接受這種「自新」的辦法。正如毛澤東指出：「他們將日本投降以後一個長時間內，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願望，力爭和平反對內戰的一切努力，看作是阻撓與力量薄弱的表現」。他們堆積的大財富，首先是從內戰與買辦軍火起家的。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封建買辦家族已經嗜殺成性，是決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獨立、和平與民主——這是違反四大家族發財的規律，爲着保護大封建奴隸主與大洋行買辦特別是其新主子美帝國主義者的利益，他們一定要進行與全國人民爲敵的反革命內戰與法西斯獨裁。當然，蔣介石和他的夥伴，曉得他們是處在全國人民的四面楚歌之中，因爲廢除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統治，實行獨立和平與民主，乃是全國人民普遍的要求，不論用任何方式，都決是不達到目的不止的。同時，蔣介石這個罪惡貫盈、人所共諱的最後反革命王朝，業已腐爛透頂，不管採取何種手段，是決不能挽救其覆滅的命運的。所以，蔣介石的妻舅宋子文會說：「打也是垮，拖也是垮，萬一實現聯合政府，國民黨也將被共產黨整垮，反正都是垮，無路可走，如再不拚命，不打自垮」。

但是，正如毛澤東壓很多人說過的，一打便注定蔣介石及其反革命王朝要死亡得更快。毛澤東深知蔣介石的外強中乾，他形容蔣介石不過是一隻紙老虎。和一個美國記者（史特蘭）談話，毛澤東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在長遠的觀點上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毛澤東舉出中外遠近反動派的例子，而斬釘截鐵地指出：「蔣介石也是一隻紙老虎」。毛澤東又指出：「

美國反動派也是紙老虎」。毛澤東充滿了人民的信心，說：「世界各國共產黨是真正有力量的，我們不過只有小米加步槍，但是終將被證明，這些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我們和中國人民前面存在着許多困難，我們和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與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一切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我們代表進步。」蔣介石這一隻紙老虎願意早一點在內戰的火線中被人民燒死，那是他的「自由」。有些自由資產階級的人物（特別是其中的右翼）還在那裏夢想改良主義，夢想避免民衆的革命，而惋惜蔣介石堅決走上這末一條死路為「不智」，但蔣介石並不理會他們的勸告。

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各界十萬羣衆舉行了反內戰的愛國大遊行，並送出到南京請願的代表團。「禮義廉恥」的蔣介石迎接代表團的禮物，便是大批特務匪棍的拳打足踢，板蕩與瓦片齊飛。老人也吧，青年也吧，男的也吧，女的也吧，都受到蔣介石狼心的禮物，鮮血沾染了下關的車站。一個偶然走過的弱女子，衣服竟被特務野獸們剝得精光，以表現蔣介石的統治有力。全國人民爲着這個下關血案而悲憤，但獸性的蔣介石却在那裏得意地竊笑。過了幾天，蔣介石只見了一個代表。蔣介石說：「就是這次談判（按：指前述的六月談判）不行，我也不打。請回去告訴上海人民好了！」你看，蔣介石是慈悲又慈悲的。不過，一切是「惟打論」，而對人又說「不打」，這正是蔣介石必輸必亡的一個記號。有一個代表問過蔣介石的「文官長」——四大家族附庸、政學系的財閥之一——吳鼎昌：「爲什麼要打內戰？武力能解決問題嗎？」吳鼎昌回答：「我們也知道武力不能解決問題，可是現在不打，將來又怎麼辦呢？」有一個女代表告訴蔣介石的老婆宋美齡：「蔣家政府這樣的做法，必然引起人民的流血革命」。宋美齡說：「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這些回答，都和宋子文前面所說的同一意思，曉得他們已臨到末

日；不遑又進一步地說明：打只是加速蔣介石王朝末日的到來罷了。但是，一不作，二不休。袁世凱是這樣，蔣介石更是這樣。從全國大內戰的計劃已部署好之後，在整個蔣管區，捕人、殺人、壓迫言論、封閉報紙，都更加窮兇極惡，肆無忌憚。聞一多李公樸都因奔走和平民主而倒臥在血泊裏面，他們所受的子彈，且是美國帝國主義所交給國民黨特務的無聲手槍所射出的。被綁架去的人，如果被社會所發現，蔣介石的匪徒們就說是「失蹤」或被「親友請去」。被殺的人，如果是名人，蔣介石的匪徒們就宣佈是蔣介石的異己所殺死的。蔣介石這個強盜的陰毒，照例經常有新創作出來。不過蔣介石的「八一三」文告是這樣聲明的：「戰時限制人民自由之法令，已撤消或修改了」。

(七)『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蔣介石加速準備由「訓政」的法西斯獨裁與內戰的「法統」，轉到「憲政」的法西斯獨裁與內戰的「法統」。袁世凱是由「總統」高陞為「皇帝」，蔣介石則急於由「主席」高陞為「總統」。按照政協決議，國民大會的召集，必須經過政協會議的協議。而且，按照政協，國民大會應由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召集，而不能由國民黨政府自己召集。但蔣介石在他的「八一三」文告裏面，自己宣佈召集他的豬仔「國民」大會。蔣介石完成了他最後推翻政協的手續，同時也即準備完成他走進棺材的一個手續。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早就警告了蔣介石：

「……不願廣大人民及一切民主黨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開一個由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在這個會上通過一個實際上維持獨裁反對民主的所謂「憲法」，使那個僅僅由幾十個國民黨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強安在人民頭上的不合

法的所謂「國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裝模作樣地「還政於民」，實際上，依然是「還政」於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誰要不贊成，就說他是破壞「民主」，破壞「統一」，就有「理由」向他宣佈討伐令。這是一個分裂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這個方針的。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據這種分裂方針所準備採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性。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並且讓它永遠也解不開，這條繩索的名稱就叫做「國民大會」。他們的原意是想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寶，祭起來一則抵制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的，可是歷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但蔣介石尋死的規律，畢竟無法制止。佔領張家口更成為蔣介石把這條繩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催命符。十月十一日，午前，蔣介石還放出空氣，說是他雖然已聲明了「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開國民大會」，但還沒有發出通知，還可以談判，但一到下午二時得到佔領張家口的消息之後，蔣介石馬上召集了一個嘍囉會議，再過兩點鐘，即下午四時就正式公布了召集「國大」的通知，第二天便又正式下了命令。毛澤東和毛澤東的戰友們在這個保衛祖國自由的愛國自衛戰爭初期，仍然運用了那依靠人民解放的基礎、誘敵深入，以便在運動中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絕妙戰略，而蔣介石從七月起大舉進攻解放區，發動全國性的內戰，到十月，他的正規軍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殲滅了二十三萬五千人，他的非正規軍則被殲滅了六萬四千人；蔣介石付了這樣大的代價暫時佔得了若干城市，可是，發昏章第十一，蔣介石竟然以為張家口一佔領，就可以保住他那個賣國獨裁的寶座，並方便向他的主子美國帝國主義報賬，一切就更放手地幹了。當時還有些中間人士，熱心奔走，想使蔣介石從死路回頭，可是蔣介石却以玩弄中間人士的奔走為取樂，等到十月二十一日，各黨派人物從上海到南京的時候，蔣介石馬上就從南京飛到台灣去遊山玩水，以表示蔣介

石對於談判的「誠心」。

蔣介石果然如期開他的「國大」，當然是蔣介石自己的代表並且也只代表蔣介石自己的「國大」。可憐得很，正如解放日報的社論所說的：「他是沒有料到這齣戲演出來竟至如此難堪：隨破鐵鞋，無處覓到一個喝彩的看客」。重慶民主報稱：「這幕獨脚戲將是國民黨最醜惡的一幕歷史」。甚至一個親蔣的報紙都把蔣介石關於「國大」和「制憲」的計劃比之爲秦始皇的計劃：「集權力於一人，集思想於一個腦袋……這種思想專制在主觀上是無比的兇暴，在客觀上是迫使國家分裂，天下大亂」。一個外國報紙這樣評論過：「國民黨企圖以「國大」爲國民黨統治粉飾，懷有此項故弄玄虛企圖之人，威信「或至少希望」他國係易於欺瞞者。此項僞裝將無濟於事，其騙局亦極明顯」。一個平日爲蔣介石捧場的美國報紙也不得不承認：「國大在陰暗而失望之氣氛中閉幕，蓋僅爲一僞裝之團結也」。『國大』正是蔣介石極端孤立的記號。拒絕參加這個蔣記『國大』的，不僅有共產黨，而且有民主同盟及許多正義的人士。除了蔣黨——國民黨以外，參加這齣『國大』的，只有兩個政治乞丐黨，一個就是汪精衛食客會琦的『青年黨』，另一個就是無恥政客張君勱的『民社黨』。由於人民與人民的鬥爭步步深入與擴大，在政協時期，民主同盟分化出去一個極右翼的『青年黨』，在這時期，民主同盟又分化出去另一個極右翼的民社黨；但民社黨中也有不願意和張君勱同流合污的，聲明脫離了張君勱的民社黨。參加蔣記『國大』與否，被輿論界認爲是任何黨派與個人的考試，參加『國大』的，就被人民叫做『落水』，叫做『墮入妓院的火坑』。可是蔣介石的『國大』竟醜惡到如此地步，就連那個『墮入妓院火坑』而爲蔣介石僞憲劃策的張君勱，也竟然如時人的刻薄：『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遮半面』。也有些落水的人，在會後就向人說明其『苦衷』。普通人民都能够分別這是忠奸善惡的分界，蔣介石的欺騙完全白費心思。就連被國民黨當局認爲是『黨化教育』最成功的北平第四中學在其回答『你

對國大有何感想」的測驗時，學生們的答案却是：「這是要把戲」。『與曹錕豬仔國會無異』。『與敵人時代的汪記政權有何不同？』『國大』是蔣介石統治危機尖刻的表現，也從上海金融市場上反映出來，例如，當時報載：『國大』開幕後，滬金融市場以人心憂鬱不安，華股大跌，美鈔則急昇直漲。那些燈迷酒醉的豬仔們曉得蔣介石所給的冥鈔靠不住，也在那裏大撈黃金；據當時報載：『近日各大都市之金價，以南京為最高。……聽說『國大』代表在京大買黃金，所以首都的金價竟一馬當先，扶搖直上了』。特別是在蔣記『國大』中間，十二月一日上海攤販生死鬥爭的事件，據外國通訊社所稱：『這次騷動為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當時一些報紙曾有以下的評論，『上海攤販事件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它乃是中國（按：指蔣管區）經濟危機日趨深化的必然表現』。其實，這不只是蔣介石統治的經濟危機日趨深化的必然表現；平日沒有組織的攤販竟然組織起來，在蔣介石統治的中心買辦市場作頑強不顧一切的鬥爭，這正是蔣介石統治的政治危機日趨深化的必然表現。

近代中國大地主大買辦的統治，兩次正式公布過兩部『憲法』：一次是曹錕豬仔國會的『憲法』，又一次便是蔣介石豬仔國大的憲法，真可以在歷史上比醜了。蔣介石這個偽憲，照一個參加串演的國民黨員所說：『其實與五五憲草（即蔣介石原擬的法西斯憲草）是換湯不換藥』，同時，又經過張君勱之手，抄襲了曹錕憲法的一部分。蔣介石以為有這末一個『憲法』的名義，一方面就更方便去進行法西斯獨裁的恐怖和反人民的內戰，一方面就更方便去向他的主子美國帝國主義取得內戰的貸款。他現在這個憲法的『法統』，便是繼承了和擴大了他原來的那個訓政約法的『法統』，也即是法西斯獨裁法，是內戰法，是賣國法。

不是蔣介石的『憲法』決定蔣介石的行爲，而是蔣介石的行爲決定蔣介石的憲法。不是蔣介石的憲法給出了蔣介石的什麼東西，而是蔣介石給出了蔣介石的憲法。重要的事情，不在蔣介石

憲法的條文如何寫法，而在蔣介石王朝的實際。不過，蔣介石急於想從這「憲法」去取得新的名義——由「主席」名義的法西斯獨裁，到「總統」名義的法西斯獨裁，好像如此，就可以更加證明他那封建買辦法西斯獨裁的名貴，這是真的。所以，那時，蔣介石的黨徒們曾經活動過，就由這個豬仔「國大」制憲同時又「行憲」，而所謂「行憲」云者，便是給蔣介石加上「總統」的黃袍。只因爲蔣介石既然踏破鐵鞋無處覓得一個喝彩的看客，此時黃袍加身，也就會顯得更加無趣，因此，「行憲」也只好暫時擱起了。但另一方面，蔣介石的「集權力於一人，集思想於一個腦袋……」在主觀上是無比的兇暴，在客觀上是使國家分裂，天下大亂的憲法，本來就是他的行爲的概括，而且在「制憲」中也絲毫沒有鬆懈過他的行憲。在「制憲」中，蔣介石正佈置了進攻延安的內戰，而且曾經宣稱要以佔領延安作爲豬仔們制憲的禮物，這當然是「行憲」。在「制憲」中，蔣介石對於爲求生存而鬥爭的上海攤販，下令「格殺勿論」，這當然是「行憲」。在「制憲」中，蔣介石的匪徒在香港行刺那拒絕參加「國大」的勞動協會理事長，篡奪勞協領導機構，這當然是「行憲」。在蔣記「國大」閉幕的前一晚上，發生了那駐平美軍強姦的暴行，這當然是蔣介石「行憲」必然發生的無數事件當中的一個事件。

每個中國人民對於蔣記「憲法」都嗤之以鼻，但歡呼的人是有的，一個是美國特使——馬歇爾，一個是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因爲他們正是蔣記國大的舞場監督和蔣記憲法的幕後牽線人。司徒雷登宣稱蔣記憲法「既符合政協決議，尤充滿民主精神」。馬歇爾在導演蔣介石這齣醜劇之後，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發表離華聲明，稱說蔣記「國民大會業已訂制一項民主之憲法」。這個杜魯門的特使，美帝國主義的騙子，在離華聲明中，還指示蔣介石，要把國民黨中的偽「自由分子」和所謂「少數黨」（也即指政治乞丐黨——青年黨與民社黨）納入蔣家朝廷裏面，表示「進行重要之改組」，以求迷惑中國人的視聽。可憐的很，這個美帝國主義的騙子，他

知道中國的專制畢竟太少。他也可能知道一些事情，但中國人民將再無人被他欺騙，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下，一定將團結起來，依靠自己力量，打倒蔣介石，建設新中國，這却是他所不了解的，或者是他們故意裝做不知道的。而這一點正是中國事情最基本的。可是，「國大」的「制憲」的戲已演過了，不演這個「改組政府」的戲，蔣介石還有什麼新戲可演呢？那導演的主人——美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在這方面想主意，於是，一個馬歇爾聲明之後，又補充一個范登堡一月十二日的演說，公開命令蔣介石組織一個「共產黨在外的黨派聯盟」和一個「沒有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於是，蔣介石——這個血腥的大劍子手選擇他在二十年前叛賣革命、屠殺人民、在南京篡竊政權的一個可恥日子，即四月十八日，宣佈他這個戲的演出。蔣介石與由這個「政府」主持「大選」，召開「選舉總統」的「國大」，以便蔣介石坐上「總統」的金鑲寶殿。不過，拆開毛廁蓋看來，就知馬歇爾聲明所謂「優秀人物之集合」者，原來都不過是糞坑裏面的一些蛆蟲。新華社有一個評蔣政府改組的社論，對此會做了很好的以下分析：

「蔣介石政府裏集合的一羣，據說是『有進步思想的』『自由主義分子』，其中美國特別喜愛張羣。中國人民對於張羣並不生疏，他原來就是北伐時期進行『政治南伐』的北方反動派的主要角色，就是與黃郛、楊永泰齊名的老親日派，就是財閥與官僚集團政學系的頭子，現在做了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寵兒。除了張羣等國民黨一大羣法西斯代理人以外，加入政府的還有這樣一批人物：漢奸狗子狗會琦等，一小羣從保皇黨研究系一脈相承下來的北洋軍閥走狗們所組成的民社黨，一小羣急於做官慌不擇路背叛政協的無恥漏網客王雲五等幾個所謂『社會賢達』。所有這些封建餘孽、賣國老手、無恥政客、政治販子，就是美國代理國務卿亞瑟遜慌忙出來表示滿意的人物，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代言人紐約時報所稱贊的『有進步思想的分子』。

一切高等權力都掌握在美國人手裏，蔣介石只是工具，會竊不過是從美國人手裏討飯吃的叫化子；蔣介石一擊中握有次等權力，真能替美國服務的是個大家族的財力，復興系的武力，與CC系的特務；其他人物也都不過是叫化子之類。叫化子可用以跑龍套，却不會真正得到什麼權力。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原來都是吝嗇鬼。

這個政府是否還有欺騙作用呢？很小，很小，這一類的所謂「政府」，太醜惡了，充其量只能利用一部份人們記性不好的弱點；當人們記起了這些所謂「新人物」就是古老的反動派的時候，當人們從經驗中再一次證明這個所謂三黨政府只是美國政府剝削中國人民與屠殺中國人民的工具的時候，他是一點也欺騙不了中國人民的。

真的，一點也欺騙不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對於蔣介石的所謂「三黨政府」，最多只嘲笑了蔣介石的窮極無聊。那不過是在蔣家朝廷裏面新增加一批人民的吸血鬼，賣國的寄生蟲。投機無恥的青年黨政客左舜生曾經公開對記者們這末說過：「說穿了，這完全是個飯碗問題。」取得「飯碗」，取得坐火車的免費證，和國民黨官僚作貪污的競賽，在美帝國主義面前表示有充當奴隸管理人的能力，等等，這就是青年黨、民社黨參加國民黨政府的目的。這批新登台的吸血鬼，貪污的本事，着實也不弱於老國民黨官僚，沒有幾個月，據說一個經濟部的左舜生和一個農林部的陳啓天兩個人已瓜分了所聯合貪污的九百億蔣幣了。

（八）盜賣中國的新二十一條

蔣介石進行內戰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在外面不在內。如果沒有美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的援助，中國人民早就可以輕快地掃除了蔣家朝廷這一堆垃圾。爲着維持大封建奴隸主與大洋行買辦這個

搖欲墜的最後王朝，以便美國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美帝國主義者援助蔣介石的內戰，用了一切的方法。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日本投降之後，杜魯門宣稱一切租借法案的契約不再繼續，可是，爲着支持蔣介石反人民的戰爭，杜魯門就自食其言，於十一月十五日宣稱：對國民黨的租借法案將再延長。上海密勒氏評論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社論介紹過美國「民主的遠東政策促進會」暴露美帝在華活動的一個小冊子，其中有些概括的材料：

「該會對戰後租借法案的總結是：

「根據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載，印緬戰區美國剩餘戰爭物資總量五億美金，悉數售與中國，其中一億五千萬美金之軍火，包括七百架飛機，已經移交清楚。

「根據杜魯門關於租借法案的報告，自日本投降起至一九四五年底止，國民政府共收到租借物資六億〇二百萬美金，包括價值六千八百萬美金的車輛和五千萬美金的軍火。

「此外，美國還幾次允許將剩餘的物資售與中國。一項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售與的一億五千萬美金。一九四六年八月卅一日出售太平洋島嶼的剩餘的戰爭物資，計八億二千五百萬美金。由於低估價值之故，這兩筆讓售物資實際價值至少各爲二億美金及二十億美金。

「進出口銀行已做兩筆貸款。一筆爲五億六千萬美金。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華爾街日報」所載，這筆貸款到一九四六年底將用去三分之二。另一筆爲六億七千萬美金的美棉貸款，這是美國新聞處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公告上發表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中，送給國民政府軍艦二百七十一艘。

「以上所述是美國在軍事上，財政上，援助國民政府的不完全的「個估計。」「民族週刊」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在一篇社論中估計，日本投降後，美國援華總數達四十億美金」。

「要把這四十億美金的援助內容，列單表示，那是寫不勝寫。然而，有一些特殊項目是

值得注意的。有一張表記載了全部美國所裝備及訓練的中國軍隊數字計五十七師，共七十萬零七千人。那些美國裝備但未經美國訓練的軍隊不在這數字中。還有已經訓練或正在訓練中的空軍和海軍數字亦不包括在內。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巴貝海軍上將宣稱，青島已成立一海軍訓練所，已畢業了三班，每班一千人。自日本投降起一九四六年七月止，海軍士官有一千人在美受訓。此項計劃正在推進中。根據周至柔說，自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二月止，政府保送空軍三千人赴美。他說所有費用由租借法案中償付之。

據該會宣稱：自從日本投降起美國政府設立了一個海軍訓練學校在青島，一個汽車訓練學校在南京，一個信號部隊訓練學校在昆明，若干降落傘部隊學校在昆明、南京、廣州和衡陽，一個特別技師訓練學校在重慶，一個空軍訓練學校在杭州，一個空軍學校在成都。

那些日本投降以前的學校還在繼續辦下去，包括一個參謀訓練學校，步兵學校，炮兵學校，中美混合空軍學校，兩個中美聯合陸軍訓練學校和五個中美特別訓練班。

這一個很不完全的、而且只說到一九四六年的賬單，說明了人所共知的蔣介石舉行大內戰的動力。但蔣介石則付給了美帝國主義以什麼代價呢？

第一，支出中國的領土權，讓美國軍隊駐在中國，給美國以陸軍基地。

第二，支出中國的領空權，讓美國飛機自由巡邏全中國，給美國以空軍基地。

第三，支出中國的領海權，讓美國海軍自由遊弋中國的領海，自由駐防中國的海港，給美國以海軍基地。

第四，支出中國的政權，讓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承認美國對中國內政的最後決定權，由美國決定蔣家朝廷對內的各種政策，把蔣家朝廷各種政治機構放在美國顧問或其他名義的監督之下。

第五，支出中國的軍權，以軍隊美國化代替「軍隊國家化」，把蔣家朝廷的陸空海軍放在美

國軍事顧問團的支配之下。

第六，支出中國的財權，由美國監督蔣家朝廷的財政，並把中國的金融系統變成美國金融系統的附屬品。

第七，支出中國的外交權，對外政策一切聽命於華盛頓，破壞在聯合國中保衛中國獨立外交的否決權，擁護美國帝國主義保護日本侵略者的政策，允許日本漁船在中國沿海捕魚，在對日和約之前恢復對日貿易，執行日本侵略者原來「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計劃。充當美國戰爭販子的助手，挑撥第三次世界大戰。

第八，支出中國的警察權，讓美國憲兵駐在中國巡邏，有地方實行「中美警憲聯合勤務」，組織「中美警憲聯絡室」；與美國合作訓練特務，合辦所謂「中美合作所」與所謂「中美聯合特務訓練班」，以便美國控制蔣家朝廷統治下的警察、憲兵與特務。

第九，支出中國的司法權，復活治外法權（例如與美國協定「一切美國軍事人員在華如犯罪事件，皆交由其本國軍事法庭軍事專局單獨裁判」）和變相的領事裁判權（例如組織所謂「中美商務公斷委員會」）。

第十，支出中國的人權，讓美軍在中國領土內以自由屠殺、恣淫、侮辱中國人為取樂。

第十一，承認美國向中國移民的普遍自由權，許其在中國領土全境內，自由居住、旅行、經商以及經營其他一切事業，不僅與中國人同等待遇，並且享有中國人民所沒有的特權，即把中國變成美國人的中國。

第十二，承認美國在中國的自由偵察權與空中攝影權，供給美國全部國家秘密。

第十三，支出中國的工礦權，允許美國投資一切工業，以便美國金融資本自由在中國進行獨佔和「開發」，特別是經營軍事基地工業。

第十四，支出中國的農業權，準備由所謂「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進行「中美一起管制農產品生產」的計劃。

第十五，支出中國的漁業權，由美國經營壟斷中國漁業的生產。

第十六，支出中國的商業權，讓美國商品經過「合法貿易」與走私的各種形式，在中國進行獨佔的傾銷。

第十七，支出中國的海關權，放棄保護稅，並同意美帝國主義的要求，將海關作為向美國借款的抵押。

第十八，支出中國的內河航行權，讓外輪摧毀本國的航業。

第十九，支出中國的鐵路交通權，由「中美合辦」粵漢路和川滇路開始。

第二十，支出中國的文化教育權，由美國經過對華文化教育的自由活動和教育基金的形式控制中國的教育。

第二十一，承認美國對於中國的惟一「宗主權」，所謂「其所享受之待遇，無論如何，不得低於現在或將來所給予任何第三國之待遇」，即係公開把中國變為美國帝國主義獨佔的附屬國與殖民地。

一切愛國的同胞們！這是驚心動魄的亡國滅種的新二十一條！這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拍賣！看中國的主權，從陸上到海上，從天上到地下，從政治到經濟，從物質到文化，從現在到將來，還沒有被蔣介石拍賣在內的嗎？這二十一條絕大部分已公開表現在分別的或比較集中的成文的條約，有的雖則還沒有經過公開的成文的條約表現出來，但事實上，在蔣管區都條條步步實現了！絕大部分都是事實在先，條約在後，蔣美所陸續公布的條約，差不多都是對於業已存在的事實加以條約上的肯定而已。美蔣所以沒有把這二十一條完全集中公開在一個條約上，因為他們所認為

重要的，是事實的實現，並有待於事實的步步推進，而且完全集中在一個條約上，就容易引起中國人民的驚覺。但比較集中表現的條約也是有的，例如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簽訂的『中美商約』，即所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真是一把尖刀刺入中國人的心臟！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的英國『新政治家與民族』週刊上這樣解釋過『中美商約』的締結：『就是一個大而強的國家，摧毀一個經濟上落後的國家的每道國防線，而且這就是支援寶國的和反動的政府從事內戰，以達到掌握這個國家經濟命脈的代價』。事實上，這還估計得不完全。中美商約乃是美國帝國主義經過蔣介石的手，業已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經濟上控制了中國所表現的一種形式，一個方面的形式。美國帝國主義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經濟上控制中國的事實是因，中美商約是果，不過，果又變成因，中美商約必然又加強了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這是中國從來沒有的奴隸契約。試拿民國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單和這一個『中美商約』相比吧，日本的二十一條所規定的特權，還有相當的範圍。又再試拿日本與汪精衛的密約單和這一個『中美商約』相比吧，日本帝國主義在那密約裏面，所規定的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特權，也還指出一定的地帶。但中美商約所包括的美國在中國的特權，却是包括了『中國領土全境內』；而其所反映的，並不只是經濟的特權，實際上，是反映了美國帝國主義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經濟上文化教育上享有一切特權。因為任何人都能够清楚：美國帝國主義如果沒有在中國取得軍事上政治上與財政上控制的特權，要取得那種經濟的特權，便是不可能的。在『中美商約』後不久，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蔣介石又簽訂了出賣全部中國領空權的『中美航空協定』了。一個協定接着一個協定，而每一個協定都使蔣介石盜賣中國的新二十一條補充了新的內容。公開的協定不夠，加之以秘密的協定；秘密的協定不夠，又輔之以公開的協定。大協定不夠，補充之以小協定；小協定不夠，又來一個大協定。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蔣賊政府同意美軍駐在中國

的照會，十月二十七日簽訂所謂「中美救濟協定」，十一月十日，簽訂的「美國對華教育基金協定」，十二月八日正式宣布的「中美海軍協定」，以及關於以海關抵押借款的祕密談判……等等，都是對於上述新二十一條的充實和更具體化。總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就是一切蔣美協定的一切，而在實際上，美軍在中國的屠殺姦淫，已把中國人連比魚肉都不如。一九四六年初天津的美軍當局規定過中國人的價格，即美軍殺死一個中國人，一律賠償蔣幣十萬元，死驢子一條，則賠償十三萬五千元。因此聯合社記者說：「美軍發覺，在這多產的國家裏，人命是非常便宜的」。其實，不知多少中國人，僅僅因為美軍要取藥，或被殺死，或被碾死，或被拋擲水裏而死，或被姦淫而死……那裏有什麼「價格」？窮兇極惡的蔣介石是把中國人無價出賣的！

人們都知道袁世凱是賣國的大奸惡。日本二十一條的第五號裏面的條文，主要是規定由日本掌握整個中國政治、財政、軍警、鐵道交通與文化的大權，但袁世凱的答應還有所顧忌，而日本帝國主義也因為怕一下子惹出亂子，結果對這第五號，只寫成了「日後協商」。不管袁世凱如何奸險，作偽日拙，也還知道他簽訂二十一條，是得罪於天下及後世子孫，在所謂「密諭」裏面，還寫出那是「敵國外患」，又寫出「心所謂危，涕泣而道，其毋忘五月七日之事」。而且，當袁世凱在日及北洋軍閥執政時代，二十一條是沒有真正實現的。可是，蔣介石又如何？蔣介石的新二十一條賣盡了一切。孟子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蔣介石却是一點羞惡之心也沒有，他賣得很「慷慨」。和袁世凱不同，蔣介石絲毫不認為美國帝國主義獨佔中國是什麼「敵國外患」。按照蔣介石的「中央日報」社論，蔣介石認為「反美即是反祖國」。在蔣介石的字典中，「中國」早已不成為獨立的地理名詞了。

愛國的同胞們！這就是蔣介石發動大內戰的實際內容！蔣介石是為誰而向中國人民作戰？一九四六年英國輿論界會稱：「杜魯門是指揮蔣介石集團進行內戰的最高統帥」。一九四六年七

月，白崇禧在新加坡召開高級軍官會議，說：「馬帥會責備我們國外沒有打好仗，國民黨軍隊太無用，所以這次大家必須爭一口氣，否則馬帥又將罵我們無用了」。這真是活現了蔣介石賣國集團發動內戰的奴才相。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蔣記中央社紐約電，報導美國侵略者所組織的「美國對華政策協會」致魏特邁一個函件，內稱：「中國國民政府今日正爲吾人而戰」，「蔣賊的通訊社以卑鄙感謝的心情報導美國侵略者這個赤裸裸的宣言，而這個宣言從蔣介石這方面說來，就是宣佈蔣介石乃是爲美國帝國主義而戰。美國雲華德系報紙說：『從美國之觀點而言，有一重要甚爲正確者——蔣介石乃在美國陣線之內』。蔣介石已不能算做『中國人』，要算，只能算是中國的最大漢奸賣國賊，這從美國帝國主義者與蔣介石自己所宣佈的，是說得完全明白的了。

然而，蔣介石能够盜竊中國，中國人民却有充分的力量能够恢復中國。蔣介石比袁世凱是不可比擬的更大的賣國大盜，但中國人民的力量比袁世凱時代却更大得不可比擬。袁世凱王朝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被中國人民的力量所打碎，蔣介石王朝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更一定將被中國人民更大的力量所打碎，並且一定將被打碎得澈頭澈尾。而美國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計劃也一定將很快地被中國人民所完全打碎，並且中國人民一定即將由此完全終結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

當馬歇爾在華僑裝「調處」，而蔣介石正公開堅決主張把中國內政的最後決定權交給蔣介石這個「太上皇」的時候，毛澤東代表中國人民，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堅決反對美國軍事援助蔣法案的聲明，即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有名聲明，在那聲明中，毛澤東以斬釘截鐵的語氣告訴美國帝國主義者：

「……美國實行所謂軍事援助，實際上只是武裝干涉中國內政，只是以強力支持國民黨獨裁政府繼續陷中國於內戰、分裂、混亂、恐怖和貧困，只是使中國不能實現軍事復員和服

行其對聯合國的義務，只是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獨立與領土主權完整……。中國人民今天所急需的並不是美國的槍炮及美軍留駐中國領土，相反，中國人民痛感美國運來中國的軍火已經太多，美國在中國的軍隊已經駐的太久，它們已經構成中國的和平和安定與中國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嚴重巨大威脅。在此種現實情況之下，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堅決反對美國政府繼續以出售、交換、租借、贈送或讓渡等方式將軍火交給中國的國民黨獨裁政府，堅決反對美國派遣軍事使團來華，並堅決要求美國立即停止與收回對華的一切所謂軍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華的美國軍隊」。

毛澤東這個聲明，說明了蔣介石內戰的背後動力，並表現了中國人民保衛祖國獨立自由的決心。毛澤東的黨表示：「中國的反動派如果依靠外力援助堅持內戰與獨裁，將現在的國民黨政府公開直接變為秦檜、張邦昌、劉豫政府，將現在的國民黨政府主席變為向外國稱臣的兒皇帝，那末，可以斷言，中國人民必將抵抗至最後一滴血」。

(九) 蔣介石匪軍落入毛澤東所佈置的天羅地網， 在蔣管區也遭受人民的圍攻

毛澤東把中國人民這個保衛祖國獨立、自由、民主、和平的戰爭，叫做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戰爭。解放區在日本投降後由減租減息過渡到平分土地的農村大革命，正是這個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戰爭的勝利基礎。蔣介石動員了蔣家王朝下面所有的軍事力量，集合了蔣家王朝歷年的軍事積蓄，加上美國四十萬萬美元的撥助，還加上日寇投降後所被蔣家王朝劫收去的軍火物資，而向解放區人民作戰，他的神氣有點像曹操八十萬八馬下江南和蒼豎百萬之衆進攻東晉的樣子。可是

人民解放軍爲祖國的正義進行了英勇的保衛戰，而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偉大的人民戰略家毛澤東指揮的本事，則遠遠賽過那當時把曹操打敗得落花流水的諸葛亮、周瑜和謝安、謝玄，而且完全不是諸葛、周、謝等人所可比擬。至於蔣介石則不但沒有曹操的本事，並且也沒有蔣堅的本事。毛澤東朱德的統帥部以及掌握毛澤東戰略的人民解放軍各路將領不慌不忙，佈置了天羅地網，動員了那解放了的農民的獅子撲兔的力量，等着蔣介石的匪軍向解放區突狼狽奔，使來的就不能得脫。毛澤東的口號是：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一切蔣介石進犯軍！毛澤東的神勇無敵的隊伍是軍隊與人民一致、指揮員與戰鬥員一致的隊伍，把竄來的蔣介石匪軍一個一個地捕捉起來，而後向蔣管區舉行大規模的進攻。人類史上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外，幾乎沒有那一次比得上這次蔣介石發動的中國內戰的規模。蔣介石的正規軍二百萬，非正規軍一百餘萬，後方軍事機關及部隊一百餘萬，共有軍力四百餘萬人。蔣介石這幾百萬兵力陸續投到內戰的前線。還有美軍行動的各種直接實際的援助。可是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解放軍大進攻的前夜，十二個月的戰鬥，蔣介石匪軍被毛澤東的偉大人民解放軍所殲滅的，已達一百二十萬人，蔣介石的將級軍官被俘虜和被擊斃的，達二百零二人（連人民解放軍大進攻後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蔣家匪軍被殲滅的，已達一百九十五萬八千人，蔣介石的將級軍官被俘虜和被擊斃的達二百七十八人）。蔣軍越戰越弱越小，而解放軍却越戰越強越大，這便是戰爭的特點。蔣介石將級軍官被俘之多，這是蔣介石在世界戰爭史上所創造的惟一供人談笑的「奇蹟」。蔣介石無聊之極，要蔣軍軍官在失敗時自殺，又常拿了張靈甫做「例子」自吹自擂，可是蔣介石「御林軍」師長張靈甫却不是什麼「自殺」，而是向解放軍簽署投降書後，在戰場上被亂槍打死的，所謂「自殺」不過是蔣介石製造的神話。一個在陝北被人民解放軍解放了的蔣軍旅長說：「沒有人願意執行蔣介石自殺的命令，要自殺，就讓蔣介石胡宗南去自殺吧」。一個在冀魯豫前線被人民解

將軍解放了的蔣軍師長說了蔣軍絕望的情緒：「……今天爲了什麼，明天是個什麼樣子，眼前一片漆黑，那裏有勇氣流血犧牲，怎麼能不打敗仗？」這個蔣軍師長又對新華社記者說：「現在是你們當了當時的北伐軍，我們成了當時的北洋軍閥。我們要想打敗你們是絕對不可能的了，現在只有希望你們的勝利快點！」是的，人民解放軍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之外，勝利得很快，並且將更缺點在全國勝利。

和解放區的人民一致，蔣管區的廣大人民同樣地以極大的英雄氣概，與蔣介石王朝及美國帝國主義繼續不斷作你死我活的鬥爭。一九四六年九月間，上海各界人民發起了「美軍退出中國運動」。在十二月一日上海發生攤販鬥爭的事件之後，沒有多少時間，十二月底起全國學生爲北一個女生被美軍強姦的事件，引起了愛國運動的高潮，抗議美軍暴行，並提出要求立即撤退全部駐華美軍，嚴懲美軍兇手，向中國人民公開道歉，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要求美國停止以軍火援蔣內戰，廢除中美商約及空運協定，反對蔣介石小朝廷的媚外賣國等等。捲入這一鬥爭的學生，在五十萬以上，遍及蔣管區數十個大中城市，受了一切愛國的社會的同情與歡呼。

蔣介石爲了進行反人民的內戰，徵兵徵糧，屠殺搜括，已使蔣管區人民在恐怖與飢餓中走到山窮水盡。蔣管區的人民已經公開被當成四大家族的牲畜，各地並流行着販運壯丁的機關，例如在蘭南，這種販運壯丁的大組織，就叫做「人牛公司」，被雇壯丁叫「牛」；介紹人叫「牛販」（見「觀察」三卷五期）。中小資產階級繼續受四大家族的損害與壓迫。由於四大家族以及國民黨的黨棍、軍閥、官僚和土豪劣紳的瘋狂劫奪，蔣管區的生產越破產，通貨越惡性膨脹，物價如不羈之馬狂飛，經濟大崩潰，人民更不能生活下去；同時，又反轉過來，四大家族以及國民黨的黨棍、軍閥、官僚和土豪劣紳，就又劫奪的更狠，他們的財富就堆積得更高，生活也就更窮華極侈（例如：有一個刊物的讀者在二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所投的信中，會說他偶然看到一個貴婦

人以七億五千萬元蔣幣之代價購買一件貂皮大衣，如果該讀者想買那件大衣，按照他得的薪水來說，就要『餓着肚皮，得過四十一年零八個月才湊足這數目』。中國人民在蔣管區所受生活的悲慘壓迫與痛苦，是從來沒有的，是歷史空前的。中國人民在滿清朝廷的統治下，生活比現在蔣管區好得很多，在袁世凱及北洋軍閥的統治下，生活也比現在蔣管區好得很多。單就生活的遭遇到來說，蔣介石的四大家族王朝，也和中國人民結下無比的深仇。中國人民不能忍受滿清朝廷，不能忍受袁世凱及北洋軍閥，如何能忍受蔣介石？所以，連蔣家王朝的走狗也不能不承認『人心波動，情形嚴重』。五月間，蔣管區的學生們就在反飢餓、反內戰、反壓迫的口號下，當蔣管區人民的先導，出來戰鬥了。這個戰鬥同樣地贏得了幾乎整個社會的同情與聲援。

有一個刊物這末概括蔣家統治的末日：『戰場上連打敗仗，一片下坡路。看經濟，赤地千里，災民萬萬，中華民國以來老百姓沒有這樣窮苦過，跟着連棒子麵也吃不上了。看社會，學潮如火，工潮米潮遍天下，反戰消息，有如水銀瀉地。看政治，則軍心不振，人心動搖，中下級垂頭喪氣，有錢的準備出洋』。實際的情形是這樣，並且比這一個描寫更無比的深刻。

正如毛澤東的黨在五月三十日所分析：『與全民為敵的蔣介石政府，現在業已發現它自己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無論是在軍事戰線上或者是在政治戰線上，蔣介石政府都打了敗仗，都被它所宣布為敵人的力量所包圍，並且想不出逃脫的方法』。『不論在什麼地方與在什麼戰線上，它的前途必然是衆叛親離，全軍覆滅。一切事變都已經證明這些估計的正確性……中國事變的發展比人們預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一方面是蔣管區人民鬥爭的前進，其速度都是很快的』。蔣介石急得手忙足亂。或如蔣記參政會一個參政員所形容的：『方寸已亂』。他說蔣介石忽而這樣，忽而那樣，正是『喪失了最後一點信心，完全是神經變態』。這時就又出現了『蔣介石神經變態』的一連串陰謀。

(十) 「在睡夢中跑到大街上狂呼救命」

在五月初間，蔣家王朝的駐美大使顧維鈞會來過一個電報，內容是：「杜魯門將赴加拿大演說，宣布對華政策，最好中國能在該演說之前製造一個反蘇運動，那將對美國援華貸款上有極大的幫助」。於是，有所謂「蘇聯接濟中共」了。於是，有所謂「新疆北塔山事件」了。還說那裏「事件的發生」是因為有製造原子彈的「蝕蝕」。於是，有所謂「蘇聯訓練的韓共參加東北戰爭」了。於是，又有所謂接收旅大的問題了。於是，由蔣介石發動的中國內戰就宣布為「國際性的戰爭」了。各種鬼話，不一而足。一個刊物寫道：「政府（按：指蔣家王朝）原想索性公開，宣布為國際性的戰爭，以待國際反響。這一炮，決定由孫科放。孫科放炮最恰當，一因他是副主席兼立法院長，說話大有分寸，二因他是知名的「親蘇分子」，以故此言論自更有力。但同時孫科的炮，不是官方的正式聲明，並不影響正常外交關係，所以是「很妙」的一炮」。又另一個刊物寫道：「據最上一人（按：即獨夫蔣介石）語張繼：「此人向親蘇，由他出來，天下人必不疑我為宣傳」。這是「很妙」的第一「妙」。對於反蘇宣傳，「據說本有兩個中心：韓共參戰與蘇聯軍火支援。結果最上一人（即獨夫蔣介石）批准，以後者為主，因為韓共問題不易引起重視」。這是「很妙」的第二「妙」。如是「副主席」便應「妙」而出，他按照蔣介石的指示，作了一陣反蘇的「妙語」之後，毫不羞恥地宣稱中國乃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中國，即所謂：「美國應有表示。美國反響冷淡，即等於放棄中國」。並撒嬌耍賴地說：「如果那樣，則在中國之外國勢力惟有蘇聯，政府將重新考慮外交態度」。他的意思是說：你不再疼我這個兒子，我就要認旁人做老子了。對於蔣介石這個「妙劇」，新華社的評論說到了它真正的「妙處」：「孫科的醜態，表

示蔣介石小朝廷已經着了火，而在睡夢中跑到大街上狂呼救命的人，常常是顧不得穿褲子的」。蔣介石還動員了若干對於蔣介石這個沒有穿褲子的跳舞感有興趣的人，直至包括胡適在內，也出來幫腔，說孫科「向來親蘇」，說的話該是「可靠的，並且出來大寫其拜美反蘇的『文章』」。可是蔣介石所企圖掀起的「反蘇軒然大波」，是寂寞又寂寞。沒有任何中國人相信「副蔣介石」的謊言，那些幫腔人物的裝模作樣也沒有打動起任何中國人。上海CC系的「華美晚報」做出絕望的長嘆息：「以素來關懷國事之大學生，竟對此喋若寒蟬，漠然置之，……而尤對此『國難』如此嚴重緊張之一幕，所謂過去愛國狂熱之大學教授，態度消極，更致其莫名之猜疑」。蔣介石虛妄的幻想變成蔣介石幻想的虛妄。

至於在國外，蔣介石想：他這一手原來是他的美國主子所導演，既有他的主子撐腰，總會有什麼「輿論」替他吹噓的吧。在孫科發表「很妙」的談話之後，蔣介石會接連三天問他的侍從：「怎麼還不把美國報紙社論譯出來？」美國報紙的「社論」有是有的，不過蔣介石企圖一手遮天的愚蠢，就使美國那些原來支持蔣介石的報紙也要搖頭嘆息，覺得「愛莫能助」。向來支持蔣介石的共和黨機關報紐約前鋒論壇報的社論這樣寫道：「南京所受之敗績與其歸咎於蘇聯，不如歸罪於國民政府（即蔣家王朝）之不孚衆望及腐敗與無能」。該報駐瀋陽記者報導：他不能證實任何一件蘇聯供給中共武器的說法。該記者嘲笑所謂「俄國控制東北共產黨活動」的宣傳。紐約下午報編輯有文章指出：沒有一個記者能够證實蘇聯供給中共武器之謠言，雖然作這樣證實是能獲得最高的報酬。四個有能力有經驗的美國記者，其中包括芝加哥太陽報的記者，宣稱：他們無論如何：沒有具體的證據去證實國民黨的反蘇謠言。這真使得蔣介石悲哀了。

但日暮途窮的蔣介石，狂呼救命只得一次又一次。蔣介石頒布了所謂「戡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這也是他佈置反蘇謠言「攻勢」的時候，業已佈置下的次一個步驟。實際上這是蔣介石的催

命符。蔣介石這個所謂「總動員」僅僅是標誌蔣介石的「總崩潰」。『副蔣介石』孫科的興趣仍濃，蔣介石宣布這個「總崩潰」的命令之後，同時也命令這個代表蔣介石的「自由主義」的「副主席」向全國人民宣布：「反內戰即是反政府」。即向全國人民公開宣戰。蔣介石這個所謂「動員令」，正是要加深和加速蔣管區人民所受蔣介石徵兵、徵糧、徵稅、派款、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破產和飢餓的災難，加強和擴大蔣管區人民所受蔣介石各種法西斯暴政和政治恐怖的災難。蔣介石命令不夠，還加上一番「遊行」，想藉此「助威」。但這個「遊行」，更顯出了蔣家王朝的淒涼暗淡。雖然按照蔣家中央社和蔣家報紙的記載，是頗有「熱鬧」的，但根據一個刊物內的讀者通訊，却寫得完全兩樣：

『此次首都截亂遊行大會，據報載參加者有十萬之衆，情緒激昂，熱烈空前。讀者未親臨其盛，未知其詳，街上標語亦如一往慣例，由發動機關擬定，千篇一律，雖無「和平」字樣，確已做到「統一」。本機關爲事先派定十人參加，並每人以五千元爲酬，結果相互不前，臨時只有五人前往，故每人獲大票一張。其他各機關是否依此辦理，不得而知，而本機關素以漠視職員福利，錙銖必較著稱者』。

這個通訊最後一句話的意思是說：該機關從來吝嗇得很，這次算很「慷慨」，開出每人五千元蔣幣的價格，才僱得五個人參加一次「截亂遊行」，其他機關出的價格可能更高，但願意被僱的一定也是寥寥可數。這真給蔣介石大殺風景了。

其實，蔣介石很知道他是國人皆欲殺的獨夫。蔣介石這個反革命的內戰總動員令，實際上所得的結果，是加緊動員人民起來打倒蔣介石四大家族的王朝。蔣介石的所謂「總動員令」當然還是要做給他的主子——美國帝國主義看的。所謂「總動員令」的救命呼聲，當然還是要唱給他的主子美國帝國主義聽的。美國一個保守的報紙叫做「華盛頓郵報」在以「蔣介石與中國」爲題的

文章內，說穿了蔣介石這個內幕：「蔣介石要求中國爲求生存（按須讀爲：蔣介石要求中國爲求滅亡）而與中共作戰，其實乃向美國呼籲，意圖煽惑吾人之仇共心理，而希望獲得美國對蔣之全面援助」。蔣介石爲決戰到底而發表之文告內容，乃一堆無謂之言詞，以及挑起美國親蔣情緒之企圖，他欲使我們相信他的所謂敵人都是共產黨人，而共產黨都直接由莫斯科所領導」。該報聲稱：「對於此種說法，我們決不能囫圇吞棗」。該報結論說道：「當他（指蔣介石）說中國之生存在垂危中，其意乃指其自身之生存而言。我們相信：不論他的呼籲對於我國主張全面援蔣之輩具有何等影響，但在中國欲爲他掀起廣大人民之支援，實已無多大作用」。但蔣介石匪幫惟一的指望，既是他的主子美國帝國主義繼續加緊「全面援助」，而美國帝國主義也正極端恐懼蔣介石王朝的滅亡，因爲中國人民結束蔣介石王朝，便將結束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所以，美國帝國主義原來在幕後和蔣介石約定的「援助」，也跟着蔣介石的滅一場接着一場上來。在蔣介石發動了反蘇的謠言沒有幾天，美國政府即宣布以價值六百五十六萬多美元的一萬萬三千萬發子彈供給蔣介石，以「對抗中共」，叫做給蔣介石政府以「道義」及物資之支持，其售價約爲原價十分之一。（愛國的同胞們聽！輸送射殺中國人民的子彈給蔣介石，這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道義」！）在蔣介石發佈了內戰總動員令後沒有幾天，美國政府馬上宣布派遣那首先一手佈置蔣介石內戰的魏特邁負特別使命來巡查蔣家王朝屠殺中國人民的事業，並進一步地實施奴役中國的計劃。

（十一）奴顏婢膝，繼續大廉價拍賣

蔣介石和他的王朝大小喽囉對於美帝國主義遣出這個欽差大臣，都受寵若驚，誠惶誠恐，奴

顏婢膝，用一切方法，以求博他們主子的歡喜。蔣介石召集了他統治下的文武官僚聚集南京，聽候這個主子使喚，或則充任跟班，如陳誠之流跟從主子僕僕風塵。南京的奴才們則忙得滿頭大汗，不分日夜趕製文件和圖表，堆積如山，聽候他們的主子查閱。照一個刊物所寫：『每當魏特邁走到一處，大小官員都把他當欽差大臣看待』。又另一刊物的篇通訊則寫出：『蔣家王朝的嘍囉』幾乎到處有人在他們前排隊。總之，在歷史上所見過那類漢奸賣國賊在他們外國主子面前稱臣稱子稱孫的卑鄙下賤的奴才醜態，蔣家王朝都一一表演了，窮盡無所不至地表演了。而這個外國臭流氓在蔣介石及其大小嘍囉面前，也活現了一副主人的醜架子，『儼然執行檢查官職務，板着面孔，搜着各種證據』。中國人民對這個臭流氓的行爲，引起普遍的憎恨，蔣介石和他的嘍囉則但恐孝敬不周，而且都以能够得他交談一次或賜一顏色爲無上『榮耀』，無恥之極，真是民族極大的恥辱。許多令人作嘔的奴才故事，蔣家王朝的嘍囉做得出來，這裏却不便來污我們的筆墨了。這個美國帝國主義的流氓與屠夫，在蔣管區巡遊之後，顯然發現了蔣家王朝的情勢已經受不起人民的襲擊了。他沒有想到中國人民的力量是這樣強大，而蔣家王朝已是氣息奄奄。他感到失望，於是，在八月二十三日，出席了蔣家王朝的『國務會議』，呵責了那些臣僕的不中用，臨走時還發表了聲明，對於蔣家朝廷的『失敗主義』，說是『言之令人喪氣』。但同時，這也正是美國帝國主義援助它的奴才和大舉侵略中國的一種作態。正如一個刊物的記載：九月九日紐約廣播稱：華盛頓一般人士認爲魏特邁罵『中國政府』（按：指蔣家王朝）的文告，只是一種『遮眼法』。

魏特邁來華一個月，根據美帝國主義的世界帝國計劃以及對蔣實行『監督』的援助的條件，和蔣介石所作的罪惡的買賣，是範圍極寬廣的。新華社會作了以下的綜合報導：

『在這一箇月中，……在軍事上，美國已自蔣介石手中取得了台北、基隆、青島、遼

化、蘭州、天水、西安、成都八個軍事基地，另外蔣介石還答應將台灣高雄附近的左營作爲美國海空軍基地，廣州亦可能作爲美國軍事基地之一。台灣基地已在動手建立，盛傳美超空堡壘已在該地起落。據可靠消息，美國已將過去日本的台灣通、台灣總督、軍事家、海軍大將，都盡情搬到台灣來，做興築基地訓練蔣軍的高級參議。如果打開地圖一看，我們發現美國已獲得了三個有整套系統的基地網。第一個是貫通膠濟隴海西幹線而延伸西北的基地網，由青島算起，直達西安、天水、蘭州、迪化；第二個是海上基地網，也由青島算起，到台北、基隆、廣州、黃埔（美國正在此大事投資），直達海南島上美帝國主義垂涎三尺的榆林港。第三個是貫通西南的不公開的美其名曰馬歇爾鐵路的，由廣州直達迪化，而以成都爲其心臟。這樣，全中國便實際上成了美國的軍略據點。

除這種軍事基地的控制外，美軍事顧問團將大事擴充，參加蔣記國防部的各方面工作，直接與全面控制蔣介石的軍隊。在政治上，美方即將派遣「顧問」及「專家」以「監督」蔣介石政府各部門。在經濟上，魏特邁已取得了美國對蔣管區中從事進一步經濟壟斷的保證，包括對縱貫中國西南腹地的川滇越鐵路的建立和管理權，投資開發兩廣及湖南，而逐出法國特別是英國的傳統勢力。美方三億五千萬美元投資兩廣的計劃，已獲得蔣政府同意，張羣已正式聲明歡迎美方對中國一切工業部門大量投資。蔣政府行政院亦已適應美方要求放棄對外匯及貿易的管制，並宣佈「準備實行」規定解除中國民族工業最後保障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除了上述軍事、政治、經濟的全面的直接的監督和控制之外，魏特邁還完成了「使中國（指蔣介石）在對日政策上和美國一致」的任務，悍然開放對日貿易，並決定參加美國主子單獨召集的對日和約預備會議。」

據美聯社十一月四日新加坡電，南僑日報駐平記者與中外各方會談並根據魏特邁攜回華盛頓

確鑿報告之綱要的報導，進一步地證實了新華社所得的這一切消息，而且甯僑日報有的還更周到，比如：關於修築廣州到廈門的公路的計劃，關於進行反中國人民的戰爭的具體計劃等等。

美帝國主義援蔣滅華的計劃，是要以台灣和廣東爲出發點和中心根據地，而魏特邁呵責蔣家嘍囉的不中用，就是爲的要將蔣家朝廷所有軍事的、行政的、財政的各種機構都直接放在美國「顧問」的監督之下。

和魏特邁差不多同時來到中國的布立特，即爲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所指名的戰爭販子之一，他留在中國比魏特邁有更多的時間，被接待在宋子文的公館裏面，也到過東北，計劃反共滅華的工作。因爲魏特邁的報告不便公開發表，於是就由布立特出面，在美國反動派的「生活」雜誌發表文章，提議美國政府在三年內以十三億五千萬美元援助快進墳墓的蔣介石。布立特寫道：「防止任一國家統治中國而動員其四億五千萬人民來對抗我們，這是最關美國切身利益的事情」。前一句話正是「做賊喊賊」的筆法。這個戰爭販子在實際上是說：由美國統治中國而動員其四億五千萬人民去爲美國作戰，這是最關美國利益的事情。這個兇惡的貪婪的帝國主義者，因爲中國出了蔣介石這樣無恥的賣國賊，就竟敢於這樣妄想，覺得可以十三億五千萬美元僱傭四億五千萬中國人爲美國作戰，而且公然狂妄聲稱：「實爲一低廉之代價」。爲實現這個美帝國主義的計劃，布立特提議把那個保護日本法西斯復起的麥克阿瑟抬到中國來，做蔣介石的太上監護人，由這個臭名遠揚的法西斯惡棍來直接指揮蔣介石進行屠殺中國人民的戰爭。不知人類羞恥爲何物的蔣介石賣國匪幫，原來準備新出賣的價格要比布立特提議的價格還更低，所以他們對於布立特這個狂妄計劃簡直喜出望外，感激涕零，並準備歡迎太上監護人的到任。

事實上，蔣介石正在以更低的價格繼續拍賣中國。自從魏特邁走了以後，在短短期間，蔣賊就繼續新訂了幾個出賣中國主權的協定。例如在前面論述新二十一條已提到了的：十月十七日，

蔣賊的政府用照會形式，正式通知美國，同意美國在中國駐兵，即正式承認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
的駐兵權。十月二十七日，簽訂的所謂『中美救濟協定』，蔣賊政府正式承認美國帝國主義對於救
濟物資以及中國生產和由外國輸入的同類物資的監督權。十一月十日，簽訂所謂『美國對華教育
基金協定』，蔣賊政府正式承認美國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文化教育的監督權。十二月八日宣佈的『
中美海軍協定』，蔣賊政府正式承認美國帝國主義對於國民黨海軍陸隊和海軍人員的監督權，並
取得在中國建立海軍根據地的權利。至於美國帝國主義監督蔣賊政府各機構的所謂『顧問』，就
更大量湧進了。九月六日，美人楊格就任平準基金委員會顧問，他和他帶來的一批美國人實行了
對於蔣賊政府的金融監督權。據十二月聯合社訊，監督蔣介石匪軍的美國顧問團即將擴大，『陸
海空軍顧問人員總數將增至五千六百人。陸軍至少三千六百人（目前為三百人）。空軍一千六百
人（目前為三百人），海軍四百人（目前為一百六十六人）』。幾個月之間，蔣介石繼續拍賣的
範圍是這樣的廣大，而他所到手的的美國借款，僅是二千七百七十萬元的所謂『糧食救濟』；尙未
到手而可能到手的只有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簽訂的美棉貸款六千七百萬美元，十一月十一日馬
歇爾所宣佈的三萬萬美元，以及美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所提出的『臨時援助』六千萬美元而結果
通通削減的三千八百萬美元。正如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發言人所分析的：『在蔣介石匪幫形勢更加
危險的時候，貪婪而吝嗇的金元帝國主義者，就提出日益苛刻的條件，用更少的錢，使蔣介石匪
幫出賣更多的國家主權』。但是，中國人民『最後清算竊國大盜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十二) 人民解放軍叱咤風雲大進攻，四大家族置

身在全國人民的革命火海裏，人民的完全勝利已成定局

正當蔣介石頒佈所謂「總動員令」，美國帝國主義的血腥屠夫魏特邁來華鼓勵蔣介石匪幫放棄「可鄙的失敗主義」加強屠殺中國人民的內戰，以及蔣介石匪幫和美帝國主義進行新的血腥大買賣的時候，人民解放軍給他們的答覆，就是向蔣管區舉行大規模的進攻。偉大的毛澤東把人民解放軍這種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稱做：「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又稱做：「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毛澤東在他的劃時代的文件「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開頭做了這樣的分析：

「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美國走狗蔣介石的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轉入了進攻。還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戰爭第一個年頭內，人民解放軍即在幾個戰場上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迫使蔣介石轉入防禦地位，而從戰爭第二年的第一季，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間，人民解放軍即已轉入了全國規模的進攻，破壞了蔣介石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企圖徹底破壞解放區的反革命計劃。現在，戰爭主要地已經不是在解放區裏進行，而是在國民黨統治區裏進行了，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已經打到國民黨統治區域裏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扭轉了美國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推進了自己的革命車輪，使之走向勝利的道路。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衰

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所以帶着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一個具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內，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這個事變所以帶着偉大性，還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世界的東方，在這裏，共有十萬萬以上人口（佔人類的一半）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由防禦轉到進攻，不能不引起這些被壓迫民族的歡欣鼓舞。同時對於正在鬥爭的歐洲與美洲各國的被壓迫人民也是一種援助。

人民解放軍就像雷霆萬鈞的威力，打進蔣介石統治區的心臟。照蔣管區一個刊物的通訊所形容：『南下的人民解放軍『真是叱咤風雲，要什麼地方就拿什麼地方』。蔣管區的情況都是人心思變，蔣介石匪幫則恐慌萬狀，混亂一團，據該刊另一篇通訊所寫：『戰場雖遠在二兩百里外，已是滿城風雨，草木皆兵了』。人民解放軍向蔣管區大進攻，另一方面，蔣管區各省的民變則日益擴大。毛澤東在抗日後期指出蔣介石所實行的『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蠶起』的『三民主義』，這時正在向着頂點發展。蔣管區的情況早已經好像是一堆乾柴，挨到一點火星，就會很快成爲燎原之火。蔣介石和四大家族王朝正置身在四萬萬五千萬人的革命大火海裏面。就連中國人民的敵人都已不能不認定：蔣家王朝必然滅亡，而且滅亡的時間已經很快。

一九四七年三月間，有一個英國保守黨議員這末承認：『我認爲無論在政治經濟方面，中國蔣介石政府局勢已在大崩潰中』。同時，這個保守黨議員承認：中國共產黨『對農民及苦力能滿足其生活的要求，能獲得人民的積極支持』。這個保守黨雖然說得很不完全，但他的話顯然也說明了：蔣介石獨夫的統治正在大崩潰，而中國共產黨必然贏得勝利。

由於蔣介石在反對人民鬥爭中的不斷失敗，蔣介石的老闆——美國帝國主義者也已經看出蔣介石是一條扶不起的癩狗。魏特邁來華的時候，據美聯社北平七月十七日的電訊：這個親自組織

蔣介石反人民內戰的兇惡帝國主義者所嬰「調查」的問題。『其中當少不了有南京政府一旦崩潰，華盛頓所應採取的方針的問題——北平一部分觀察家曾預言，此種崩潰當不在遠』。美國共和黨的先驅論壇報於魏特邁離華聲明之後，很喪氣地說到：『共產黨將贏得中國』。『無限期的維持蔣政權，則必須萬萬又萬萬的美元，那怎辦呢？可能的後果是令人沮喪的』。『美國就必須準備應付今後的不幸』。就是說：美帝國主義者自己已經感到任何援助都救不了蔣介石，要趕快準備蔣介石的後事了。

至於蔣介石在政治上，對於他自己的看法呢？一九四七年九月間，蔣賊在國民黨四中全會上，已宣布他的『最後關頭』，而發出哀鳴說：『危險困難較之過去任何時期為甚』。紐約一個報紙的社論稱：『據來自南京的消息，蔣介石曾向國民黨執行委員會說：他二十年來挽救「中國」(按：指四大家族的罪惡統治)危局的努力，已經失敗了。』該報以幽默口吻譏諷着說：『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任何「政治家」(按：蔣賊不過是一個反動政治的小丑)大聲承認他什麼事情都失敗了，這種卓越的創作力應使你永遠不朽』。蔣介石的姻親宋子文在某次的蔣家「國防」會議上說：『去年(指一九四六年)我們還可以有辦法，現在我知道沒有辦法，真的沒有辦法了』。窮兇極惡的四大家族都已感到他們業已真正臨到末日了。

從軍事上，同樣地，連中國人民的敵人也都承認蔣賊的敗局。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美聯社西雅圖電稱：『遠東貿易商』出版人在太平洋學會上稱：『南京政府正因中國共產黨的戰鬥力而完全崩潰中』。

同年十一月十七日，美聯社上海電稱：『中共力量已愈打愈強』。中外軍事觀察家均同意『……中共地位已較戰爭開始時更堅強鞏固』。

十一月二十九日，美聯社南京電引所謂觀察家的評論稱：『在廣闊內戰的各個戰場上，共產

黨軍隊都已握有對國民黨軍隊的主動權。戰爭主動權顯然已由蔣介石戰略家們的手中，轉移到共產黨軍隊將領們的手中了」。

十一月三十日，合衆社南京電引所謂「有資格的軍事觀察家」的評論稱：「儘管打了兩年仗，蔣介石政府的地位，今天看起來，比以前更黑暗了」。並稱：蔣介石在各個主要戰場上「耗盡了進攻力量，喪失了主動權」。

十二月十五日，合衆社濟南電稱：「華北國民黨指揮部絕望情緒與神經緊張日增。某「軍事權威」稱：共產黨軍隊不僅在數量上與國民黨軍隊相等，且擁有較國民黨軍隊爲大之攻擊力與進攻力。會與共產黨軍隊作激烈戰鬥之將領，對前途均表悲觀，此與南京軍事發言人所描繪之樂觀圖畫適成對比」。

十二月十八日，美聯社南京電稱：「在面臨中國共產黨強大軍力下，南京高級官吏不隱瞞蔣政府之日趨衰弱。國民黨不但未能驅逐馳騁於長江北岸之中國共產黨三員大將，相反，共產黨軍隊力量更強大，較其勝利南下時更具威脅性」。『多數軍事專家均同意共產黨軍隊力量日增之說』。

承認蔣家軍敗局的，也包括了蔣介石匪幫自己。

蔣賊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的某地軍事會議上，總結了他所進行的反革命戰爭的經驗，他說：「從去年（指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一月這四個月當中，我們（蔣介石匪幫自稱，下同）團長、旅長、師長等高級軍官被俘之多，爲數驚人，……如不急圖補救，……那對我們將來的軍事影響何堪設想」。可是從蔣賊這個演講起，蔣賊將校被解放軍俘虜的，就越來越多，成羣結隊。這正是蔣賊軍事走向大崩潰的重要標誌。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蔣賊的另一篇講話，說這是蔣軍「最大的生死問題」。就是說，只從軍事上看來，蔣賊也知道自己的死亡不遠了。

蔣賊的走狗胡宗南去年有一個被洩露的電報會着急地說：「戰爭之失策，如不迅予補救，則一年之後將無可戰之兵」。蔣介石匪幫罪惡滔天，「民欲汝償亡」，那會有什麼「策」可「補救」呢？胡宗南說的話到現在快一年了。胡宗南替自己匪幫算命是算得很不錯的，「將無可戰之兵」，眼很快就很快將變成蔣家王朝的現實了。

毛澤東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這個遠東空前偉大的人民革命戰爭，勝利已完全成爲定局，事實證明了他關於蔣介石與美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的科學預見。這一個偉大的人民戰略家在抗日戰爭初期，便一點都不差錯地計算了抗日戰爭發展及其結果的各種行程，同樣地在這人民的革命戰爭初期，也便一點都不差錯地計算了這革命戰爭發展及其結果的各種行程。毛澤東回顧說：

「那時我們說，敵人軍事力量的優勢，這只是暫時的現象，這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也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而蔣介石戰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佔着優勢。人民解放軍的戰爭所具有的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這就是戰勝蔣介石的政治基礎。十八個月戰爭的經驗，充分地證明了我們的論斷」。毛澤東指出了十八個月戰爭的經驗：

「……十八個月中，蔣介石的前線高級指揮官，大部份因爲戰敗被撤換。這裏有鄧州的劉峙，徐州的薛岳，蘇北的吳奇偉，魯南的湯恩伯，豫北的王仲廉，瀋陽的杜聿明、熊式輝，北平的孫連仲等人。負責指揮全部作戰責任的蔣介石的參謀總長陳誠，亦被取消此種指揮職權，降爲東北一個戰場的指揮官。而在蔣介石自己代替陳誠擔任全局指揮的期間，却發生了蔣軍由進攻轉入防禦，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進攻這樣一個局面。蔣介石反動集團和其美國主子，現在應當感覺到他們自己的錯誤了。他們將日本投降以後一個長時間內，中國共

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願望，力爭和平反對內戰的一切努力，看作是膽怯與力量薄弱的表現。他們過高估計了自己力量，過低估計了革命力量，冒險地發動戰爭，因而落在他們自己佈置的陷阱裏。我們敵人的戰略打算是徹底地輸了。

蔣介石的戰略打算是徹底地輸了。這便是毛澤東根據十八個月戰爭經驗而作出的斬釘斷鐵的論斷。十八個月戰爭的考驗，斷定了人民與反人民、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誰將得到全部勝利與誰將得到全部失敗。而引導着蔣介石王朝的必然全部顛覆的大動力，便是偉大人民解放軍的進軍。

當然，歷史教訓我們：任何獨夫賣國賊，任何人民公敵，決不會不打自倒的。一切反動階級即使已曉得死亡的命運已經不可避免，但決不會自己繳槍，決不會自甘瞑目。據解放軍俘虜的蔣匪軍將領說：蔣介石最近時常向他的部下宣傳一種口號，叫做「打完亦完，打不完亦完，甯可打完了完，不可打不完亦完」。這個獨夫賣國賊曉得他是快完的了，但是他是決心「打完了完」。另一方面，這個窮兇極惡而又狡猾萬端的蔣介石及其一夥和他們的美國主子同謀，也正在計劃「以退爲進」的方法。蔣管區有一個刊物說道：「目前文武兩反動派都似乎贊成和平了，可是還不敢提出來，看情形早晚會提出來的。他們企圖隱藏實力，他們還想保有江南，還想在江南維持他們的專制」。當然，他們還想：「江南保不住怎樣呢？那就保兩廣好了。」宋子文做廣東主席，便是這個陰謀促成的。這本來是公開的祕密。蔣管區另一個刊物這麼說出過：蔣介石「此次把廣東交給他實有厚望，希望……好好經營一番。萬一大局（指蔣家王朝的大局）過份惡化，大家亦可有一退路。果真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蔣賊還仍然妄想「第三次世界大戰」救命），恐怕首都南移之可能性遠較西移之可能性爲大，則將來廣東之重要，自非今日所能想像（可憐得很，即使果然有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按照蔣賊的妄想出現，蔣賊也不過只能想到試往廣東暫時托命，但

中國人民是要追你到天涯海角呵。同時內戰雖然打得起勁，然而間或有和諒。要和總得先有和的線索，李任潮就是一條好線索（你看蔣賊居然要找「和平」的線索了）（見「觀察」三卷六期的通信）。因此，宋子文的到廣東，是和美帝國主義的「開發」兩廣，以及在台灣訓練蔣軍、建立台灣軍事基地這一連串事件相配合的。美蔣企圖在這些地方建立最後根據地，以便對中國人民作最後的掙扎，而所謂找尋「和平」的線索，便是企圖讓中國人民上當，以便蔣介石王朝找機會捲土重來。

和蔣介石佈置的這個「和平」的陰謀同時開內，蔣介石匪幫在蔣管區佈置了大規模的絞殺。據蔣管區一個刊物的通訊：在四川省政府一次專員會議裏面，蔣介石匪幫的「特殊人物」宣佈蔣家「政府的意向」是「消滅異黨」。「除共產黨之外，另舉了三個黨派：民主同盟，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會……只要發現，不問其情由如何，一律格殺勿論，格殺後再加以「匪」的名義，以掩人之耳目」。另一個蔣介石匪徒繼起說明前面「談話是完全代表政府的，你們（各專員）儘管殺，就是殺錯了，本人負全部責任」。蔣賊宣佈了民主同盟為「非法組織」，並且在以前一些日子，公開槍殺了民主同盟裏面的愛國民主戰士杜斌丞。愛國的智識分子青年學生繼續被蔣家警犬追捕與槍殺。蔣賊王朝在蔣管區發揮了全部的恐怖之自由，這正是蔣賊垂死的極度瘋狂。但人民的革命熱潮却繼續洶湧澎湃，波瀾壯闊。浙大千子三的被慘殺，重新敲起了蔣管區青年為自由的鬥爭。「反動政府馬上就要垮台」，變成青年們前進的歌曲了。

（十三）很想穿上「總統」的壽衣，好到棺材中

抖點威風

袁世凱臨死之前，想過一過「皇帝」的癮，以便帶一套皇帝的壽衣進棺材，覺得他雖然在陽

世被人民打敗，但有了一套龍袍，或許還可以到陰間去作威作福。汪精衛臨死之前，想過一遍「主席」的癮，也是這樣想法。蔣介石想過一遍的，却是「總統」癮，現在他覺得死亡就在眼前，因此就更加着急，他想，無論如何，總得穿一下「總統」的壽衣，才好在棺材中抖點威風。於是，在蔣管區，就大鬧了一番偽選。這番偽選，從蔣管區各種刊物所報導的形形色色看來，比起袁世凱準備做皇帝的「國民代表大會」偽選的醜玩意兒，真是青勝於藍了。這裏就手頭有的材料，大略集合列舉幾條：第一，蔣介石匪幫「中央的圈定辦法規定了下來，無論是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都要絕對的控制」。「一切指定，不但不能選擇黨，連在黨內亦不許選擇人」。這種圈定「又稱欽定」。第二，因此，「競選」首先要「競圈」，「奔走權門，相當辛苦」，「圈中者都為奴才」。第三，「選舉全都是豪門操縱，土劣捧場」。第四，「包票每票五萬元，一手交選票，一手交鈔票」。第五，「上海我送你五百票，南京你要還我三百票」。第六，「南京專有一批人以拉票為職業的，名為之為票販子，這真是三百六十行以外的三百六十一行了。票販子，分子複雜，組織龐大，他們自己已要參加「競選」，是十拿九穩的。大多數的鄉長保長都有做票販子的資格，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七，「一張選舉權證可換一塊西湖毛巾，某保則換十斤白米」。第八，「各縣的人民十之六七未取得公民資格」。第九，「競選四法：（1）居高臨下法，（2）坐享其成法，（3）公平交易法，（4）以大吃小法」。第十，「大半數女立委候選人為姨太太」。第十一，「據估計，每個「候選人」所花的活動費，平均有五億元（蔣幣）之多，滬市一百二十個「候選人」，總數是六百億」。「國大」和立委的名額約在二千左右，每名額若干「競選人」所耗費的活動費，假定最保守地以十億計，則合算起來，耗費當在兩萬億以上，再加上「政府」（蔣家小朝廷）這次核定的六百億，一共就有兩萬零六百億了」（其實這是最最低最低的估計）。第十二，「「職業團體」裏，一夜之間，增加數百會員，選舉證拿到手

後，忙壞了刻圖章的師傅」。第十三，黨官把工會的選舉權證繳械後……各單位主管人負責湊出會寫字的工人或雜役五十名，分別在兩天投完三千一百五十張選×××的票。這五十名投票專家要吃飯……，因此要派，用錢「投票事務費」共是四百萬，攤到每一個員工的身上」。第十四，「豬仔們分贓不均，就索性狗打狗，互相火拚，發生暗殺」。……一切光怪陸離的醜態，簡直描寫不完，袁世凱有靈，也要「感觀止」了。至於費用，前面所述的最低估計，雖則「在民生凋敝的今日中國，確是駭人聽聞，關乎其闊」，但也不過是偽選中的一個部分，蔣賊黨徒少不了還要計劃一大筆蔣賊準備粉墨登場的開銷。袁世凱籌備帝制的費用，比起來也真是瞠乎其後了。

中國人民痛恨蔣介石這個僞選所加給人民的災難，同時嘲笑蔣賊的日暮途窮，心勞日拙，沒有什麼人有興趣去看他這一套大出喪的準備。袁世凱是被人民的反袁運動迫進了棺材的，但那時八民的革命運動的規模究竟還是較弱較小的，所以，袁世凱還僥倖得到「壽終正寢」的便宜。現在大不相同了，蔣介石的罪惡既遠非袁世凱可比，而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革命又如此強大，中國人民便不可能讓蔣介石享受袁世凱得過的僥倖的便宜。

中國人民所準備的，正是活捉蔣賊，最後結束這個大地主大買辦的反革命王朝，審判這個中國史上最大的竊國大盜與賣國大盜。

六 消滅蔣介石，打碎蔣家小朝廷的全部統治 機構

毛澤東最近劃時代的大革命文告指出來：「一九四七年十月，人民解放軍發表宣言，其中說：『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及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就是人民解放軍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基本的綱領」。這也就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所說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民主專政，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必須以各革命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代替大地主大買辦的法西斯獨裁政權。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要消滅蔣介石，同時就是要消滅蔣介石這個大封建奴隸主與大洋行買辦的法西斯王朝的全部基礎，正如毛澤東所分析，這個反革命王朝的經濟基礎，是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與封建買辦的官僚壟斷資本制度；而它的政治基礎，便是那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全部統治機器。

由於蔣介石反革命王朝處在中國人民經常不斷的革命襲擊之中，它在社會中極端孤立，所以它那一套繼承滿清皇朝與北洋軍閥而來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吸血機構不斷擴充到極端驚人的龐大，並與四大家族的財富成正比例的發展。蔣介石反革命的軍事機構的人數龐大到四百多萬，還有其他形式的或公開的或秘密的如警察、憲兵與特務的武裝。蔣介石反革命的官僚機構，就蔣家「中央」小朝廷來說，據一九四六年四月間西安報載，情形如下：「『中央』公務員，在滿清末年不過一萬人，民國初元，亦不過二萬人，抗戰前八萬人，在三十五年一月已達二十七萬

人，公役十三萬人，近月以來，添設機關不少，如西北武漢等行營，各級靖公署，物資局等，截至四月十日上，中央公務員將達三十萬人，公役十五萬人。養官役五十萬，足等於養兵二百萬。就蔣家朝廷的地方政府來說，據一九四七年十月間北平報載：『目前地方政府的組織和編制比較八年前的確已擴大了很多。例如省政府在二十八年秋季以前有民、財、教、建四廳和秘書、保安二處，職員合計四五百人，但現在的省政府則除上述四廳二處外，尚有警務、會計、田糧、社會、農林、衛生、合作、新聞、人事等處；地政、水利、考核等局，再加上在省政府合署辦公以外的十餘機關，總計有三十餘單位，職員多至三四千人。又如甲等縣的縣政府，在二十八年秋季以前只有三科一室，職員二十餘人，現在則有七科八室，職員增至二百餘人。縣以下的組織自新縣制實行後，區署以下有鄉鎮公所，每所有正副鄉鎮長各一及幹事、書記等十餘人，鄉鎮以下有保公所，每所有正副保長各一及幹事若干人。在東南某省在半年內增添了縣政府職員約萬餘人，區長、指導員、正副鄉鎮長、幹事、書記等二萬餘人，正副保長和幹事十幾萬人，真算洋洋大觀了。這裏所列舉的數字，是還沒包括甲長在內的。據一九四六年有的報紙載，蔣政府的官員比一九三七年已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但按照各種材料看來，增加的數字比這個估計大得多了。大體上，蔣家的官僚機構從偽『中央』到保甲所有的官僚，包括有一千數百萬人，是一個最低的數字。至於蔣介石的反革命特務機構，這是蔣介石在中國一切封建買辦王朝中的罪大惡極的新作品，是蔣介石封建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特別記號，至少也包括有百數十萬人，還有許多國民黨員及三青团員雖然不就是職業的特務，但是也被脅迫做些特務的工作。蔣介石反革命王朝就是依靠這樣古今中外特出龐大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器，並聯繫各種城狐社鼠和土豪劣紳，以便和人民作戰，掠奪人民，保護四大家族的財富，把中國人民壓得喘不過氣來，同時也把人民的仇恨步步地與大量地集中起來，以便打倒蔣介石王朝。當然，蔣介石一切反革命的統治機

槽內，除了那些軍閥、反動政客、貪官污吏、以及死心塌地的特務之外，很多人是被迫爲四大家族服役的。蔣介石反革命軍隊內的兵士都是窮苦老百姓被綁去當的。各級官僚機構內，很多人也僅是爲的混飯吃，並不一定存心做壞事，也有不少真正存心良善還沒有做過壞事的。由於四大家族殘暴的壓迫和剝削，並當蔣介石反革命王朝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走上大崩潰這個時候，不僅蔣軍士兵們更加飢寒交迫，而蔣家政府及蔣家軍內很多中下級官員的家族也陷在飢寒交迫的境遇裏面，而求謀自己的出路與生路，所以，在蔣介石王朝一切反革命機構內，也正在醞釀着對於蔣介石王朝的大反叛。

完全打碎蔣介石那全套反革命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器，而由人民及人民的代表直接掌握全部國家統治的權力，這就是消滅蔣介石反民族反人民的反革命政治制度。這樣，就不但消滅了蔣介石王朝，而且使蔣介石倒了之後，永遠再沒有可以繼起之人。辛亥革命時候，滿清朝廷雖然倒了，但袁世凱却利用了滿清朝廷的軍閥的、官僚的統治機器再起反革命；大革命時候，北洋軍閥雖然失敗了，但蔣介石却利用了北洋軍閥的統治機器再起反革命。這是革命的大教訓。所以，如果沒有根本打碎蔣介石反革命的全部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器，如果沒有在全國建立中國人民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權力，我們的革命就決不能停止，決不能有最後的勝利。而消滅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和消滅封建買辦的官僚壟斷資本制度，乃是打碎蔣介石全套反革命統治機器的經濟基礎。

政治協商會議的失敗，加重說明了：只要蔣介石那一套反革命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構一日存在的話，那末，所謂『和平』、所謂『民主』的決議，都只能是白紙寫黑字的東西，而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定是和那反革命的統治機器聯結在一起的。那一套反革命的統治機器依靠帝國主義的援助而存在，同時，帝國主義的侵略也就經過那一套反革命的統治機器，而向中國擴

張。適應於大地主大買辦的經濟基礎而形成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上層政治機構，並不一定要由一個固定的人來代表，它可以由慈禧太后來代表，可以由袁世凱來代表，可以由段祺瑞來代表，可以由曹錕、吳佩孚來代表，也可以由蔣介石來代表，總之，任何流氓混蛋，烏龜王八，只要有個適當的機會，都可能被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提拔起來，或叫「皇帝」，或叫「總統」，或在昨天叫「總統」，今天叫「皇帝」；或在今天叫「國民政府主席」，明天叫「總統」。問題是制度。有那種封建的與半封建的、殖民地的或半殖民地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存在，便有了那種制度相適合的人出來，但是由那一個人出來，便是偶然的東西。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像蔣介石那樣殺人越貨的無賴流氓和陰狠險毒的交易所經紀人，竟然能夠變成竊國大盜與賣國大盜，高壓在中國人民頭上達二十年之久。同時，那種制度不但不一定由一個固定的人來代表，並且也不一定由一個人來代表。只要那種制度繼續存在，集中的袁世凱死了，也可以由分散的袁世凱來代表。而現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奴隸主與大洋行買辦當蔣介石這個末日的時候，也正在尋找空隙，進行陰謀，企圖在保存蔣介石的全套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構的前提下，準備於最不得已時，暫時叫蔣介石下野，用幾個分散的蔣介石以代替集中的蔣介石，以求迷惑視聽，和緩中國人民衝天的革命進攻，而後再看情形，叫集中的蔣介石在明天再登基復辟，蔣介石玩弄過兩次所謂「下野」的把戲，一次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第二次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現在正想玩弄第三次。但中國人民已有百年來的經驗，特別是第一次大革命、十年內戰、抗日戰爭、以及日本投降以後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這幾個偉大時期的經驗，所有這些經驗已在毛澤東極端堅定的理論與政策集中起來，中國人民將不再上當了。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必須把革命進行到底。

蔣介石的政治觀念是擴大了的與法西斯化了的袁世凱的政治觀念，這種政治觀念就是：依靠

帝國主義的、反人民的無限獨裁權力與武裝的反革命。這種政治觀念，是反映了中國封建的與半封建的、殖民地的或半殖民地的經濟制度，又是反映了在這種經濟制度上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政治制度。要消滅這種反革命的、政治觀念，首先要消滅這種反動的經濟制度與反革命的政治制度，而要消滅這種反動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根本的動力就是以農土地改革為基礎的武裝的革命。這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的特點同時又是優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毛澤東每天寤寐不忘地把握着這個偉大的真理。蔣介石反革命制度的中心力量是他那反革命的武裝；撲滅蔣介石武裝的反革命，才可能消滅蔣介石所代表的制度。因此，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乃是武裝的鬥爭；以人民的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把反革命的武裝打碎到底。如果沒有達到完全打碎蔣介石反革命的武裝的目的，就無法完全打碎蔣介石那全套的軍閥的、官僚的、特務的統治機器。

孫中山的北上宣言說：『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進國民革命進行者無不勝』。事實證明孫中山這個論斷的完全中肯。蔣介石所領導的反革命軍隊是與美國帝國主義結合，結果無不敗；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軍隊是與人民結合、為人民自己的軍隊，結果無不勝。現在中國人民的任務就是加緊援助和配合前進中的偉大人民解放軍。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活捉人民公敵蔣介石，最後打碎蔣介石的反革命王朝，已到了時候了。

二十年來，在中國的兩條道路——毛澤東的道路與蔣介石的道路的生死鬥爭，誰勝誰敗的問題，已完全確定了：勝利者是毛澤東的道路，失敗者是蔣介石的道路。毛澤東的道路是中國的獨立自由和富強，蔣介石的道路是中國的滅亡。這兩條道路是百年來中國人民與反人民、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兩條道路，而集中於二十年來一個以毛澤東為首的革命營壘、一個以蔣介石為首的反革命營壘之間的鬥爭。毛澤東道路的勝利，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完全勝利，這就是中國殖民地的或



半殖民地、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經濟政治制度的完全終結，這就是蔣介石政治觀念的完全終結。毛澤東所說的人民解放軍向國民黨統治區的大進攻乃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也就是說：為全世界帝國主義二十年來所扶植——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數年來所一手盡力扶植的在中國而走狗——蔣介石的敗亡，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奴役也將一去而不復返了。

毛澤東號召：「現在是全世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全世界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走向勝利的歷史時代，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是的，經過中國人民流灑無量數的赤血，犧牲無量數的生命，經過中國人民舵手毛澤東智勇無雙的啓發，中國大陸上正在放射光芒無邊的曙光，中國民族正在新生。全體中國人民必須再接再厲，迎接毛澤東的號召，把革命進行到底，

（一九四八年一月底完稿）

1948

12

8781